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六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六篇 文革（下）

六、红卫兵

（一）承传

毛泽东办事，通常都是坚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两手，即为文武。文韬武略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无往不利。毛泽东的两只手，文的一只手即为中央文革那帮秀才，靠嘴皮和笔杆子攻击别人；武的那只手则是，非常熟悉的三个字——红卫兵。

到今天为止，红卫兵——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破坏性，另一面则是对腐朽制度的冲击。两面的特点同样鲜明，争议极大。

就红卫兵本身来讲，就是一帮热血的年轻人冲击社会现实而已。他们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各类人，或者是专家，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罪犯，甚至可能成为国家的叛徒。但当时，他们是红卫兵，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冲击社会现实。

在整个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一道风景。

在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知识分子指那些脑力劳动者。这些脑力劳动者中，不包括那些一门心思啃老、以及一门心思啃异性（如白面先生和第三位女士）这类人。知识分子主要指那种受过教育，在各个领域中，能够传播科学啊、文化啊什么的，能够自食其力，人格独立，且懂得生活或者说人生的人。如果把概念延伸一下，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头脑去改变社会现状的人。按照这个理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很久。比方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学说代表人物，很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创建了各种观念，并试图用这些观念去影响和改造社会，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

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凑，知识分子也在改变，无论如何改变，命运无外乎三种，要么敢于表露个性而被杀掉，这种人很少，例如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要么隐藏个性，装糊涂保命，如阮籍，如各位隐士；大多数都选择了第三种：当奴才，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办事。

在中华文明强势之际，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政治同化了。得志的去当官，杀别人或被杀掉；不得志的去隐居，有时写点诗歌留名，如读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知那是隐士林和靖写的。

从汉代之后，知识分子冲击现实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就是在战乱年代支持一个英明的人改朝换代，如李世民的十八学士；要么就是在和平年代为了某些事跪在皇帝的门前请愿，如明朝那些请皇

帝上朝的文官。

两种途径只能算常规，算不上深刻，因为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根基——社会制度。

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偶尔看见隐藏着的铮铮傲骨，比方说文天祥。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们都在细心修补着中华文明。代表性群体就是唐朝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如宋明理学。一直修补到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才开始思索改变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东方文明，随着传统的华夏文明的没落，东方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试图在真正意义上冲击社会现实的根基——政治制度——如同两千年前的前辈、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那般，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代表事件就是他们整出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脚步没有停下。随后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跟着孙中山推广“三民主义”，一直推广到国民党离开大陆。包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只是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多半从国外寻找政治体制，思考层次不及百家诸子的原创性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于书本，时不时跑到街上宣扬各种理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标志性事件当然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它诞生在传统的中华文明最为低谷耻辱的时刻：军阀混战、列强入侵，身为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要割让主权。

所谓五四运动，从狭义上讲，就是一帮学生不想念书了上街瞎折腾；从广义上讲，则是传统华夏文明孕育的精英，不堪传统文明没落的屈辱，要斩断传统文明走向新生。其意义已经诸多宣传，这里不再累述。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冲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潮流。每当社会动荡，总会有学生跑上街去爱国，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前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些年轻人一直运动，运动到新中国的诞生，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积弱百年的国家得到新生，年轻人把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即使共产党搞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忍了。然而随着大饥荒的到来，随着高层之间的矛盾分化，社会再一次出现混乱，混乱的社会状况刺激了潜伏在年轻人血液中的不确定因子。

——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他们决定再一次冲击社会现实。

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历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卖国、反独裁；建国之后的学生运动的目标则是反官僚主义、反修正主义等等，他们反对的正是当年的五四运动精神熏陶出

来的人。学生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只是学生运动的土壤变了。

客观意义上讲，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继承了学生们面临社会混乱时便会运动的传统。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砸了曹汝霖等人的家，那是爱国。红卫兵抄了彭真等人的家，那是搞破坏。原因无他，客观现实变了而已。理解了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历史，有助于解释红卫兵的行为。迄今为止，红卫兵并不是最后一起学生冲击社会现状的事件。学生最后一次冲击社会现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冲击到中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史称八九学潮。

为啥要勾勒这个呢，因为这也是一种承传，属于文明范畴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承传，将会老化、腐朽、衰弱、死去。这个地球上出现过许多文明系统，绝大多数都衰亡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知的衰亡了的文明中，它们有过辉煌（如古埃及文明）、有过伟大的帝国（如古波斯帝国）、有过先进的创造（如玛雅文化体系），但就是看不见这种承传——即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不断冲击，或许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看看如今最为强势的欧美文明，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容忍度最高的。

——尽管这种承传有时候会表现为反作用。

提起红卫兵运动，有人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还可能掉几滴眼泪；更有人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做愤怒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于呻吟者要同情（对他人的人道），对愤怒者要无视（对自己的人道）。在这里不需要别的，需要的只是理解。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困难或者说变故，依然会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阶层、冲击社会现状的局面。

（二）起源和结构

说起红卫兵的起源，资料记载非常简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那天，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帮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遗迹聚会，激动玩乐之余，他们决定搞点花样，说咱们成立一个保护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咱们是红卫兵。

三天之后，他们在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一种传统，是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的一种宣传方式。但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署名是——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这几个字迅速成为一个流行元素，短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从北大附中，到整个海淀区，到整个北京城，再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从中学到大学，红卫兵组织迅速涌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增加的速度绝对是光速。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群中学生想要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卫兵？是他们自发组织还是有高人指点已经无从考察，但是这件事透露一个事实：就是经过建国十几年的广泛宣传，毛主席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符号，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分量已经非常重大。

年轻人容易崇拜偶像，周杰伦的粉丝、刘德华的粉丝、科比的粉丝、梅西的粉丝、乔布斯的粉丝、韩粉、哈日派等等都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有部分人相当狂热。如果把这些粉丝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当然现在没人有这个魅力。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没有这么多“天王”、“天后”、“巨星”去崇拜，只能崇拜伟大领袖，都是毛泽东的粉丝。而且他们在长辈的革命精神的熏陶下，远比如今天的年轻人狂热。

在那个相对单调的年代，在那个如火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去诠释一代人的梦想。一个由狂热的年轻人组成的巨大群体，在结构上必然是复杂的，红卫兵群体也是一样。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派别：血统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红卫兵起于血统派，也就是老红卫兵。说起红卫兵的构造，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最早的红卫兵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正统红二代，比如毛泽东的闺女，比如贺龙的儿子，比如刘少奇的孩子，比如叶剑英的女儿必然，比如等等等。他们号称老红卫兵，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之前诞生的红卫兵。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老红卫兵绝对是衣食住行有保障，看病有医生，不愁找不到对象的群体。

他们为啥这么干呢，是有原因的。人嘛，到了一定年龄段，自我意识就会崛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观点和使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代人的使命就是革命、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将有自己的定位。

他们的红一代父辈们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身经百战而不死。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家庭教育自然是红色的：要学习伟大领袖和你老爸、不要忘记革命传统、防止坏人窃取国家领导权等等。孩子们本来就是诞生于战火之中，长于炮火连天的世界，比较懂事早熟，性格比较强悍。一九六六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家庭教育加上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节，自然而然地选择类似于英雄的父辈们走过的路，即搞革命。

恰好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搞革命的理由：经济建设不景气，政坛风起云涌，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两派人马各自摆出了自己的建国思路。年轻一代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仿照父辈们走过的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拿出自己的纲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宣称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批判学校、领导、老师、基层组织，一句话，就是要“造反”。

这种自发的造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在英雄主义面纱下的青春冲动。他们的造反行为有严重的血统论倾向，比如当时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血统论也算数，那

么中国现在还是应该由秦始皇的后人领导呢，那胡亥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那林立果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可能么？所以说这种行为比较幼稚，但这种幼稚的行为揭开了更为广泛的红卫兵运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把这群激进的年轻人消化溶解掉。具体办法就是派遣工作组去校园，首先承认红卫兵的“左派”、“革命派”地位，一步一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扶持愿意接受领导的学生为领袖。对个别不听话的顽固派分子则予以打击。说白了就是，各位小爷们，不要闹了，即使要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闹。

工作组颁发了很多共青团委员、文化革命化委员等证书之后，红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愿服从领导听指挥。答案很简单，贺龙、林彪的儿子有必要听公安局的领导么？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有必要去听校党委的啰嗦么？都是高干子弟，没必要依靠基层组织。相反，基层却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层是好的，出了问题自然在基层。一方要管，一方不服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僵局并没有持续很久。

七月十八号，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实践自己的决定了。七月二十号，他找中央负责人谈话，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谈话之后，工作小组被迫撤出校园。

红卫兵们赢得了“革命”的一个胜利，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抄起笔墨和口水，继续战斗了。很快他们又收获另一个更大的令人鼓舞的胜利。八月一号，建军节，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革命小将们乐颠了。他们的胜利在十七天后达到巅峰。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接见红卫兵。然而很快，老红卫兵们就惊奇地发现革命没路了，因为更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不仅仅要打倒黑五类，还要打倒高干们，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父母，红一代。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生于一九四一年，文革爆发时二十五岁，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叶剑英本人对运动非常谨慎，而年轻单纯的叶向真被卷了进去，成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小头头，可谓热血燃烧、激情澎湃、斗志激昂。当时“彭真、

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刚刚诞生，批斗会还没有开。中央文革一帮人才刚四处宣扬说那几个老家伙是反党的，是牛鬼蛇神，不能让反党的牛鬼蛇神好过。中戏的红卫兵决定响应号召，把四位牛鬼蛇神拉出来一起开批斗会。

在指哪打哪的精神作用下，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两辆卡车驶向彭真的大门。红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把一封重要的信交给门卫，趁门卫看信之际冲进去，直接把热被窝里的彭真给抓走。同时抓走的还有陆定一和罗瑞卿。因为没有找到杨尚昆的住宅，四个人没有凑齐。为此，江青还把叶向真等人请到中南海吃一顿，表扬一番，大意说：你们干得好，革命后继有人了。

周恩来很快知道是叶向真干的。这事肯定瞒不过周恩来，也难不倒他。叶向真那小丫头，眼皮下面长大的嘛，好办。就把叶向真等人叫过去，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见了周叔叔，小丫头当然要乖一点，但又不能把到手的“革命成果”送出去，只能半真半假说：“藏在一个安全地方啦。”周恩来对时局和红卫兵的心思了如指掌，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曰：“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就这样，首次出现了“中央一级”的批斗大会，轰动全国。

但是很快，叶剑英元帅也深陷二月逆流，遭到冲击。叶向真也受到牵连，她被关押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开始觉得没事，两三个月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叶向真明白了，并不是要关她，而是要对叶剑英动手。

这样叶向真就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弄不倒叶剑英，就不会放叶向真出去；弄倒了叶剑英，更不会放叶向真出去。总之是出不去。她曾想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也没意思。幸好她没死，因为她找到了事情干：在牢中钻研起中医，试验针灸。操作过程：趁提审时，在桌子上偷偷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双城记》里那位老医生，在巴士底狱呆了二十年之后，出来时人都傻了。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四年之后，叶向真从单人牢房里出来时，几乎不会说话了，人也迟钝了很多，直到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惹得叶剑英元帅老泪纵横。

叶向真出狱之后，真的成了一名外科医师。若干年后才拾起儿时的梦想，干起了导演，改编的曹禺戏剧《原野》成为第一部走进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在香港放映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在大陆放映。叶向真晚年，吃斋念佛。

八月十八号之前，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天下，之后他们随着父辈们的失势而退出历史舞台。工作组撤出校园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政府机构的各位大人们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们组织、扶持了自己的红卫兵，也就是保守派红卫兵。

和老红卫兵不一样，保守派只是跟风派的墙头草。他们的特色是：没有家庭背景，想干革命又不敢拼命去干，就是凑热闹的。大串联时代到处游览观光的就是这些人。

这派人要想存活，必须依靠基层组织。需要政府给提供火车、汽车，提供食物。这一派的门槛很低，只要爹妈不是反革命分子，都能加入。因此这部分人数量惊人，全国各地都有。

红卫兵运动本来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本质上是搞革命破坏的。如果红卫兵听基层政府的话，也就丧失了造反的功能。但是这些红卫兵也不能说就是保守派，本身也会批判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公认的右派啥的，也会冲击一下机关单位，前提是政府和基层部门允许。就好比搞游行，先请示好政府，走在政府划定的路线上。

所谓保守派，就是相对听话的一派。等到造反派兴起，政府组织瘫痪，这群跟风派又成了造反派的跟屁虫，去批斗大会上凑人数；游行时喊口号；屁颠屁颠地跟着人家去抄家，偶尔顺手牵羊，拿点黄金塞在口袋里。据叶向真回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每一次接见之后都能捡到金子。都是红卫兵抄家时顺手塞到口袋里，到天安门打坐时挤掉的。掉了也不敢捡起来，以至于白白丢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负责安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非常愤怒曰：“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评：保守派不是头头，因为没有冲锋陷阵、推波助澜而不承担责任。之后上山下乡，回到城里之后，又下海经商。他们一直隐藏着，等到文革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成了所谓文革的受害者，满身伤痕之人，哭哭啼啼，样子很不好看。

真正有惊人破坏力的是造反派。

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老红卫兵是一致的，都是以冲击基层政府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但出身和保守派一样。要加入这一派没啥门槛，只需要胆子大，敢闯敢干。这帮人由于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造反事业，却没有家庭背景，经常被领导拉去批评教育。特别是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他们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工作组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管不了高干子弟也就算了，还管不了你们这些瘪三？当然要管。比方说蒯大富同学，曾经在工作组的指挥下，遭受上千人围攻。工作组挖出很多右派学生，搞阶级斗争，有人当场被斗昏，有人被迫自杀。工作组撤销之后，这些所谓的右派学生又成了造反派的中坚。

他们不仅被领导打压，还被老高干子弟们看不起，成为不让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虽然出身低

微，血液里却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渴望打破束缚、渴望造反、渴望被认可、渴望功成名就。他们是有才的，突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早期的大学生。他们视红一代领导人为奋斗目标，渴望像他们一样，通过革命和自身的努力走向成功。一句话，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死。他们的父母清清白白，不涉及政治和利益，全无后顾之忧。一旦失去束缚，打、砸、抢自然不在话下。

开批斗会少不了他们，抄家少不了他们，砸文物少不了他们，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们是毛泽东真正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要借红卫兵的火去烧烤行政系统。老红卫们有革命精神，但也有致命缺点，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在行政系统内部，属于需要烧烤的对象。干起事来会有顾虑，而且他们数量有限，集中在北京地区，远远达不到需求。

造反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只需要发动起来，天南地北的官僚机构统统的，统统的别想有好日子过。凡是当官的，别想安稳。别说搞腐败、贪污、包二奶，当孙子不像样也要烧一烧，烧到服气为止。那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们就出现在这一派中，如蒯大富同学，就是造反派中的杰出代表。

造反派固然牛叉，还有一个更为牛叉的派系，叫做极左派。这个派别的门槛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加入的。如果说老红卫兵讲血统，造反派需要胆气，极左派需要另一个词——思想。这个世界一旦涉及到思想，门路就会很窄。因为能思想的人历来都是稀有品种。权贵年年有，有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看看代表人物杨曦光同志。

杨曦光，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号，死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号，享年五十六岁。

外表：斯文，腼腆。

性格：深思。

人生经历：传奇。

一九九八年，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经济学原理》，作者杨曦光，该书被誉为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对于该书有一段经典的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该书让杨曦光成为当时最牛叉的经济学家之一，成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就获奖了。总之，这是一个脑细胞极为活跃的人。文化大革命之际，杨曦光的身份是红卫兵思想家。

文革开始之际，腼腆的杨曦光倾听了伟大领袖的号召，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为此他付出了

精神、思想，还有身体。当时两派都很厉害，经常有军人抓红卫兵。比方说武汉，比方说甘肃，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人镇压红卫兵事件。杨曦光所在的湖南也发生过军人镇压红卫兵的事件。当时军队镇压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组织。杨曦光虽然也是造反派，却不是抓捕对象。

此情此景让十九岁的杨曦光愤怒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刺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很混蛋。

结果很容易想到：杨曦光也被抓了，平生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虽然坐牢，却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两个月后，这个英雄人物出狱了。当时正是运动的高潮之际，按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大有可为。然而杨曦光是与众不同的，他在思考背后的思想因素。思考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该往何处去？》。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大胆出位，到什么程度呢？——超出了造反策划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承受极限。

康生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当时位居中央文革组组长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受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江青更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据说后来杨曦光在长沙得知大家的反应，怅然曰：“想不到康生的水平竟然这么低！”

周恩来更是亲自批判这本书，说他的毒害和蒋介石当年的大作《论中国之命运》相当。这个比较绝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的大作是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杨曦光的书绝对是自己写的，而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事表明了一个事实：杨曦光的脑细胞非常发达！

闹出这么大动静，结果已经注定，再次进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之后，三十岁的杨曦光出狱，成了一名技术工人，三十二岁考入社科院，三十三岁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四十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十二岁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四十五岁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士，四十六岁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五十岁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五十二岁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曦光，典型的深思型人物，牛。

这就是极左派的门槛，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三）八日定乾坤

走上革命之后，毛泽东一生有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跟蒋介石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四年之后，共产党一统天下，决定顺利实现。第二个决定抗美援朝，三年之后，决定基本实现。第三个决定，文化大革命，要砸烂行政系统，这个决定用了多久呢，十年？不是，实际上只有八天！

八天之后，所有要打倒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干部，全部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同待宰羔羊那般，战战兢兢地等待命运的裁决。然而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解放战争用了四年打垮了敌人，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抗美援朝三年实现战略目的，敌人退了，退了也就退了。文化大革命只用了八天就决定了“敌人”的命运，清扫工作却一直结束不了，整整持续了十年！

十年之后，当事人都尘归尘、土归土了，问题还悬在哪里！

从六月二号红卫兵诞生开始，他们就和领袖紧紧连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很幸运，诞生在一个领袖需要的年代；也可以说很可悲，因为他们诞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并为此付出代价。说幸运，是因为在年轻时代他们狂欢过，毫无节制地狂欢过。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受过如此巨大的狂欢派对。说可悲，是因为狂欢的时间是短暂的，曲终人散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比方说杨曦光。

从八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五号，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量超过千万人次。每次接见，人数从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不等。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安排一个人和上百万人见面、互动、喊口号，绝对不是简单的事。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治安压力多大？吃饭睡觉怎么办？最关键的是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一旦发生点意外，就可能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难度不低于指挥一场战役。八次接见均由周恩来直接指挥。当时周恩来六十八岁，常常为准备工作而通宵加班。毛泽东更为年长，七十三岁。

八月十八号夜晚，毛泽东整夜未眠，因为天亮时他要去看红卫兵小将们。天亮之前，他决定穿上军装出现在革命群众中，增加会见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五五年评军衔，曾打算给他定制一套大元帅服，他不要。没有军服，就从一个魁梧的军舞团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服凑合一下。

早晨五点钟，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领袖的出现，使广场沸腾起来。在《东方红》的乐声中，八十万年轻人手持小红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高呼毛主席万岁。除了挥手、喊口号，还有感情互动：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亲切会面。核心部分则是双方讲话，政府方面由林彪讲话，学生方面由红卫兵代表讲话。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盛大的“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从第四次开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均在一百万以上。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太小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比方说第五次接见，也就是十月十八号，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一百五十万万名红卫兵，全程五十里。毛泽东乘坐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两边的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

十月份之后，北京的深秋很凉。许多外地的红卫兵没有衣服，吃住也困难。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城就超载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肯定不能和现在比，一下子涌入几百万人口进去，衣食住行肯定是个大问题。中央决定疏散他们回原地，但年轻的红卫兵也有种：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宁愿在京城喝西北风也不愿意回家。没办法，接下来又组织三次接见，接见人数超过五百万。

接见这么多人，对毛泽东而言，总共也就用了八天时间。

八天的时间，八场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所谓无产阶级狂欢大会，狂热的氛围中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好好干吧，不会有人管你们，没有人敢管你们；谁敢管你们，我就去管谁。

八场狂欢大会之后，年轻人回到全国各地，化热情为战斗力，把整个政府基层砸个稀巴烂。也就是说，毛泽东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系统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此效率可谓空前绝后！

（四）狂欢时间

这么说吧，放任一个人，不去管，看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按照某些规律，人，首先要吃饱喝足，吃饱喝足之后就会追求其它消遣。

如果市井之辈失去有效约束，如西门庆同志，如当今各种极品二代，找良家妇女调戏一下。因为资源超过智商，饱暖之后脑袋里基本上只能容得下——淫欲——二字了，充其量再加一个——赌——字，个别极品的，还能再装得下一个字——毒。这种人的功能就是为某些人提供创造素材，比方说兰陵笑笑生先生让西门庆名垂千古——可惜笑笑生之后再无笑笑生。

如果失去约束的是艺人，那么又会怎么样呢？可能会脱光衣服制造新闻，可能会留下个什么“门”给大家欣赏欣赏，通过高科技手段记录下来，如照片和摄影。某些人兴致高昂，还会拉其他人垫背。因为他们需要话题、新闻、人气，再用这些玩意兑换金钱。这种人的功能就是考验国人道德的底线，推动世风下沉。世风下沉就能生产更多二杆子。

商人失去控制，那么诚信将失去，古有仙丹、还魂丹等高档货，今有地沟油、毒胶囊等等低档

货，造假走私就会满天飞。当商人造假走私之际，就会拉动官僚搞贪腐，制造低智商二杆子。造假走私足够多之后，还会推动艺人进一步考验国人底线。因为商人背离诚信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奸。它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恶心、顽强的病毒之一。

官员失去控制会怎么样？就会疯狂地搞腐败，正如明朝末年的官僚，正如当今某些官僚。腐败二字，相信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如果是封疆大吏那就更不得了了，唐代的安禄山，一念之差把繁华的大唐盛世推入低谷；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把中国人口减少千百万。

如果是相对单纯的年轻人失去控制呢？他们会说，小爷告诉你们，当官不能搞腐败，做生意不能奸诈，当艺人不能脱裤子，有牛逼的老爹也不能出来显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然而道德总归是道德，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子，拿来切割现实世界，会杀伤一大片。如果手握刀子的人足够强大，会血流成河。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告诉年轻人，单纯的孩子，用你们的世界观去清理现实世界吧，不用担心保安会拦你们，不用担心警察会抓你们。去改造这世界，去清理这世界的垃圾、蛀虫、堕落者，努力干吧。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人贪污千百万，没人走私千百亿，没有各种艳照，没有多少二奶或妓女；依然有足够多的问题，比方说谁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谁是美帝的特务？谁是苏修的走狗？谁是恶霸、汉奸、军阀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等。

客观上讲，这些人都有。先不说这些人应不应该清理。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辩论课题。但说清理的手段，如何清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按道理说，说一位将军叛国，必须给出证据。话说回来，即使某位将军叛国，那一定是秘密行事，那些天天在教室里念书，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少爷、姑奶奶们如何懂得侦查技巧？同理，说一个政治家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也许更要足够的理由。找理由，恰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因为他们没有搞过实践，也就不知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年轻人的思想相对单纯（好事），感情相对容易冲动（正常），行动相对激烈（可以理解），但是集体行动起来，就显得粗暴而幼稚。正是他们粗暴和幼稚的作风推动了文革的最高潮。在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中，许多人的生迎来了高潮，许多人的生迎来了低谷，许多人的生高潮后又跌入低谷，许多人的生跌入低谷后又被推向高潮。

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反反复复，无穷尽也。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年轻人的狂欢节之中，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狂欢和灾难交织的过程中，大概有这样几个节目。

第一个项目，大串联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大串联好在哪儿。大伙儿挤上绿皮车，很多人挤在一起，头靠头，脚靠脚，挤得喘不过气，有人蜷缩在座位下面或行李架上，有人在靠背上练金鸡独立，比春运还要拥挤。而当时恰好是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满身臭汗；更无法供应饮料或茶水，渴个半死；甚至连上厕所都困难。那玩意搞不好还要停车熄火，活人可以被尿憋个半死。最困难的是女生，挤在一帮男生中间，极为不便。作家赵长天回忆云：“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算狂欢么？好像是遭罪吧。这只是今天的观点，再过半个世纪回头看今天，大巴或火车也是效率低得惊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新中国，刚刚从历史的最低谷中站起来，除了一股劲啥也没有。可惜的是，那一股劲又憋出了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北京城只是现代北京的一小块，上海也仅仅是现在的上海的一小块，省份城市跟现在的县级城市差不多，县级城市当时就是一个丁点大的乡镇。市民的生活怎么样呢？私家车、电话、空调之类的玩意就不用想了，能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文件和几分报纸，都是领导非常英明伟大；买点东西还需要票票。至于农民，除非打过仗、逃过荒的，基本上很少外出，一辈子进不了几次城，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但偏偏在那个年头民族再一次崛起，国人都很强悍。

如此家庭出来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电子产品是没有的，各种书籍是没有的，各种零食是没有的，各种精神颓废也是没有的，强悍是有的，理想也是有的。即使是高干子弟、享受特供的家庭，物质也有限。高干子弟毕竟有限，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百姓家。民风还算淳朴，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孩子们自然是单纯的，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绿皮车也是新奇的，体验一下，如同现代的乡村孩子坐飞机一般新奇。

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新奇的世界打动。在那新奇的体验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在某些接待站，还能借点零用钱。这样的待遇相当有吸引力。

——不用念那些该死的书了，路上还能逛一逛，看看风景，而且他们不用为此愧疚，因为目的不是看风景——而是去实现自身的使命。比方说要写大字报批判校长，红卫兵要去校长的家乡调查一下，看看校长是不是说的那么坏。校长是福建人，红卫兵是河北人，到了福建之后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方言，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指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把调查进行彻底也是不现实的。调查不彻底无所谓，玩一玩也不错，有时候还能发生点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不像现在有机会接触性知识和异性。

对当年那些年轻人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北京，当然是伟大领袖。在他们单纯的心里只有

两个词：北京，领袖。这两个词浓缩了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忍着酷热跑到北京，喝稀饭、吃馒头、咸菜（待遇已经不错了），一直等到夏天过去才有机会见到领袖。然后是几十万人坐在天安门前远远看领袖一眼。

——所有的冲动、激情、梦想，只为在人海中看望领袖一眼。

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当年轻人来整顿现实世界时，问题就来了。有年轻人认为，女孩子就应该保守一点，非但穿衣服不能露肉，而且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留长头发。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红卫兵在街头拔掉女孩子的鞋跟，减去她们飘逸的长发，美其名曰减去资产阶级尾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政策宣传，而是不少男孩子在青春期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的对女孩子的仇视心理在作祟。当然这些只是小事。

红卫兵的主要工作是写大字报、辩论会、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

按照之前的设想，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净化现实社会。方式就是通过底层群众斗争上层的权贵、名流，把那些脑子不太洁净的大官贵人们洗洗脑，身体不太干净的洗洗身体。这些通过当时的法律是办不到的。法律办不到的事，只好由人民去办了。人民之中，活动积极、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是最佳选择。那些被洗脑洗身的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牛鬼蛇神。

第一步当然是写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就不说了，遍地都是，内容的激烈性、战斗性、犀利性远比网路上最职业的骂人专家牛叉。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揭盖子。要批判市长，就写大字报宣传，某某领导的工资和他拥有的财产数目不对，患了资产阶级病，成了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虫，现在要求他对我们人民群众交心交底。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革命小将要根据毛主席思想，对他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成了牛鬼蛇神的市长先生重新变回人。

如何救人呢？就让市长先生过来参加批斗会。如果市长先生恰好很忙，不想参加不要紧，红卫兵可以直接去市长先生的家里或办公室，把市长先生扭到事先约定的地方，让市长先生交代自己的罪恶。罪恶是啥呢？就是市长先生的言行。通过揭发，很容易在市长先生的言行里找到一些句子，再采取断章取义、引申推理的方式加工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自己的主子（人民大众）不敬的言词。市长先生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

能混到市长的位置，自身的修为自然不低，基本上都打过仗、办过公，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嘴上功夫自然也不差。但再好的嘴上功夫也不行，因为市长先生只有一个人、一张嘴，红卫兵却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红卫兵当中，也不缺能言善辩的，这是第一波；实在辩不过，还有无理取闹的（爱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多得是），可以胡搅蛮缠；还有专门捣乱的等等。

市长先生毕竟不是诸葛孔明，不能以一敌百。诸葛孔明在江东遇见的辩论对手，基本上都是斯斯文文，而且当时地位比较高的人物。位高权重的市长先生面对的则是一群儿孙辈分的小屁孩，能不能吃得起馒头都是问题。要不是时事所迫，市长大人才懒得理那帮家伙呢。一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市长，被一群小年轻审问，情绪就会波动，可能动气、发火，进而火上浇油。革命小将本来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代表伟大领袖清扫牛鬼蛇神的。牛鬼蛇神竟然敢不配合，真是岂有此理！那就给点颜色看看，让牛鬼蛇神们知道何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给颜色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是戴高帽。所谓戴高帽，就是用纸篓子当帽子，上面写上标语或画个王八等等，戴在牛鬼蛇的神脑袋上，主要功能是精神羞辱。想一想，一个几十岁、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立正站好，脑门上套一个有王八的纸篓子，被如此羞辱，情何以堪！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是所有程序中最轻微的一种惩罚。第二个基本方式是开飞机。所谓开飞机，就是低头、弯腰、撅屁股、双手最大限度往侧后方伸，这是一种体罚加精神惩罚。一般对年轻人而言，保持这个姿势一刻钟，那也是头昏腰酸腿打颤，而年事已高、可能还有三高症状的市长大人可能要被迫站几个小时，而且不得喝水、喊冤、甚至昏倒。因为他成了牛鬼蛇神嘛，这是他应该享受到的革命教育。

过了这两关之后，成为牛鬼蛇神的市长大人就面临着困局：招还是不招？

不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批斗，拉出去游街关禁闭都是小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愤怒，革命小将们可能做如下选择，就是每人拔掉市长先生的一根毫毛，如胡须或头发。一人拔一根头发不算多，如果人数多、次数多呢？结论很明显，市长大人的理发钱可以省了。

所谓招，就是承认思想有错误，表示要改；因为本人不小心，占了公共资源，要改；本人不小心向牛鬼蛇神靠近了，但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些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革命小将需要的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招得不够，也要面对进一步的惩罚。

招或者不招，市长大人都要面临下一步的教育，即抄家。抄家没啥好说的，相当于老母猪进菜地，但方式有效。凡被抄的，均为显赫大家族。黄金、钞票、古玩字画自然少不了，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证据。不管你是谁，在当时整个国家贫穷，国人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抄到这些玩意就注定要完蛋了，注定要沦为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批斗会、关牛棚、劳动学习。如果市长不堪忍受，可以现在自杀，背负一个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罪名而死。

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人要抄家，国家主席以下，达官贵人、社会贤达、豪门公子哥均要批判，他们的家也得抄。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到十月份，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小将们的战绩如下：收缴的现金、存款

和公债券四百多亿元，黄金百万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多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多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数万人。

在被抄的古董文物中，很多价值连城。比方说四件套的宋代钧窑洗子，也就是碗，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国家一级国宝，当时市场价一百万（如今过亿），可以买八十八辆解放牌大卡车。

最典型的的就是北京宣武区一个豪门世家，红卫兵抄到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十七辆大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三卡车。据说其家族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近代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没有进行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彭真的罪状之一），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还抄出三眼顶戴花翎，这玩意就不用介绍了吧？

所有古玩中最重要的一件玩意是一份地图。这本地图本身不值钱，对整个中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地图标定的中印边界上，该死的英国佬弄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西藏领土弄走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中国当然不承认那玩意，但证据难寻，之前有过原始地图，但是不见了。这份地图是原始地图的副本，明显标注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很操蛋。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特地寻找有关中印边境的资料。地图本应由清政府保存的，不知怎样落到那家去了。没想到这次被红卫兵给抄到了，歪打正着。可惜的是，家族族谱被毁灭了，如此豪门世家，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贵族的活样板。

后来根据中央文革和林办指示，红卫兵把抄家成果搞一个展览。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琳琅满目，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熠熠生辉。某位古董专家先后前往参观，感叹曰：可不得了！都是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撤展之后，枪支送往公安部门处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

第三项，砸文物

红卫兵抄家无数，在他们单纯幼稚的心里，每一次抄家都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当时的革命理论，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革命的，无疑是对国家有利的，无疑是合乎伟大领袖的指导思想的。所以越干越起劲，不仅中国的要批，外国的也要批，比方说伟大的爱因斯坦同志，因为名气太大了，也成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好在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

身在中国的各位名人就悲催了，活着的不能免，死去的也不能免。在红卫兵幼嫩狂躁的心中，红色革命的之外，一律要扫除。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主要针对才子、佳人、将相、

帝王，所有的一切都要统统的清除。

佳人的代表人物——虞姬。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之一，她对爱情的忠贞感动无数人，和项羽的故事流传千古。虞姬墓前，每年一度的虞姬花是为胜景。千百年来，无数人前去凭吊。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把虞姬庙和虞姬墓照顾得很好。然而红卫兵去把它们砸个稀巴烂。理由：英雄美人是旧社会的大毒草，不能留下来害人。仿佛中国近代的积弱是项羽、虞姬造成的！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中国男人如项羽那般豪勇，女人如虞姬那般刚毅，中国人将无人能欺。

再看看才子这一栏，代表人物：吴承恩、蒲松龄、苏东坡、王羲之。

吴承恩的故居并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没值钱东西。几百年来，曾有无数人来此凭吊。不行，封建毒草，要清理。于是吴承恩故居没了。

蒲松龄是个教书匠，很穷，死后更穷，没有故居，墓地被挖。墓里除了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挖墓人竟然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更恶劣的是他们竟然把蒲松龄的尸体捣毁。就因为没有挖到金银珠宝么？

大文豪欧阳修在滁州做太守时写下的千古名牌《醉翁亭记》。苏东坡看望欧阳修时，把文章亲手刻成石碑立于滁县琅王牙山，已经存世近千年，属于书法家至宝。红卫兵不仅将碑砸倒，还本着造反到底的精神，认真仔细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估计是凿累了，才把另一半保持下来。如果是抢金银珠宝，也能理解。——如此愚昧的学生，只能说是教育的悲哀。与此相似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也被毁于一旦。王羲之的字啊，在那个时候真是价值连城。和王羲之、苏东坡的字相比，什么康生、陈伯达这些党内书法家恐怕连浮云都算不上。

再来看看“将相”这一栏。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大力，帮了共产党大忙，并且因此而失去一切，全家被国民党处决。可是在红卫兵的眼中：一日国民党，终生国民党，依然砸烂杨将军的墓。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也被毁了。连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肯定的戴安澜将军的墓都没能幸免！可见运动之疯狂。理由：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说他们和国民党有关，那么两千年前，为汉帝国版图开疆辟土的名将霍去病呢？他的墓地竟然也给破坏了。难道说理由是霍将军扩大了中国的地盘？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岳飞的墓竟然也被掘了。岳飞一生为国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被挖，理由竟然是为封建帝王服务。人家岳飞也就是血肉之躯，又不能穿越到千年之后看看人民民主专政是啥样。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大明帝国最后的支柱——名将袁崇焕的墓地也给毁了。

“名臣”这一栏也差不多。

中国最有名的宰相大概要数诸葛亮，号称千古人龙，被膜拜千年。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个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管理者。正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南阳诸葛庐、汉中定军山一直保存下来。红卫兵有了发挥空间，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诸葛亮怎么得罪红卫兵同志了，只因为人家没有念书便出将入相？理由是有的：他是地主分子。

张居正大概是后宰相时代权力最大的大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帝国经过荒唐的正德、嘉靖、隆庆三个祖宗折腾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短暂中兴。张居正也成了红卫兵的目标。红卫兵砸烂他的墓，毁了他的尸骨。可怜一代名臣，一代人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中国人是一个有清官情结的民族。历史上有名的两个清官便是包拯和海瑞。在人治时代，他们两个老古董就是官吏的楷模。虽然法制社会不应该想念青天大老爷，就从为官的节操而言，包拯和海瑞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的墓地也成了红卫兵的挖掘对象。他们跑到合肥去毁了包拯的衣冠冢，又去海南掘了海瑞的墓地。破坏包拯和海瑞的墓，在民间，尤其是法制思想比较淡薄的时代，影响之坏不次于毁岳飞和袁崇焕的墓地。

“帝王”这一栏最为诡异。

红卫兵虽然革命情绪很高，破坏力很大，但是去破坏巨型的帝王陵墓还是不现实的。比方说武则天的乾陵，比方说秦皇陵，他们只能干瞪眼，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表面文章还是可以做的。比方说朱元璋的墓，挖不开他的墓，可以把巨大的墓碑给挖掉。可怜的朱元璋，怎么说也重新建立了汉人帝国。在他之后，再也没有过汉人的开国皇帝。

虽然挖不了帝王陵墓，却可以挖比帝王影响力更大的墓地。比方说炎帝，炎帝的陵墓被破坏了，仓颉的墓园被毁了，山西舜帝陵被破坏了，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破坏了，这些人是谁啊？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却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炎帝是谁啊，中华始祖，和黄帝并列。仓颉是谁啊，传说中的造字者。这些墓地或许是假的，或许是空的，或许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不应该动。需要原因么，需要理由么，不需要。这世界是个讲理由的世界，凡事还是清晰一点好。但也有一些事不需要理由，比方说挖墓，尤其是文明象征的墓穴，因为那是道德的底线。

红卫兵运动过火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有过火的理由。但是在挖墓这一项上，可以说是人品败坏，是不可原谅的。批判活人，虽然也过火，但每一个活人都犯过错，也不是不可以批。那些被批判的呻吟者，本就有各种问题，大饥荒中绝不是清白的婴儿。但是挖墓，那是自掘坟墓。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更为年轻的初中生，喊着“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的口号走向康有为的墓穴，然后把康氏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有人拖着骨头游街，有人鞭挞那骨头，好像康有为的灵魂真的附着在骨头上那样。游街结束，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民族的精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者，春秋诸子之后第一个敢于伸手去触碰政治体制的人。

那么多被破坏的墓地中，对时局走势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女人的墓地。

那个女人很平凡，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她有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叫蒋介石。上海的一帮大学生领导宁波一帮中学生去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旧居破坏了蒋介石生母的墓。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金门炮战帮了蒋介石一把。同时又派双方老友章士钊带信给蒋介石致以亲切的问候，把两党关系描述为：我们同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如果国共和谈成功，那么今天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乃至钓鱼岛问题都不是问题。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两岸关系中断了。蒋介石对生母感情极好。生母的墓地被破坏，也破坏了蒋介石对大陆的那一点信任。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想红卫兵去破坏蒋介石生母的墓地，然而他们都顾及不到。直到今天，还在期盼两岸和谈、拉关系、统一。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主干，其它问题是枝叶。

（五）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破坏是无止境的。千年的爱惜抵不上一朝的冲动。世界佛界至宝，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八岁等身像为佛界三圣像之一，不容易被毁灭，却被糊弄得面目不堪。

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有个千佛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国的无耻之徒盗割，贩卖到西方。成为国外博物馆是珍品，想来每每义愤填膺。还有一部分壁画仍在，却遭到更为残酷的破坏：造反派将剩下的壁画中是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这大概是史上最恶心、下流、无耻的破坏。

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山东曲阜。红卫兵砸了孔庙，挖了孔坟。说这事之前，先介绍一个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

谭厚兰，女，湖南望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五八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六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六六年名扬天下时，年仅二十九岁。

红卫兵的狂潮到来之前，谁也想不到那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带着一副小眼镜、生活简朴的大龄未婚女青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当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名扬天下的大字报时，北师大的谭厚兰立马跟上，矛头直指校领导。也就是说，谭厚兰女士是早期红卫兵之中的出头鸟。出头鸟都要付出代价，谭厚兰也一样，当刘邓的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后，像她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暂时的批判斗争没有降低谭厚兰的战斗力和。

工作组被领袖撤消之后，谭厚兰来个华丽转身，成为北师大的左派代表，成了造反派领袖。随后以弱小女流之身，组建“井冈山战斗团”，又成功联合群众，大大扩展了人员和规模。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剩女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山头，如同大兵团司令一般神奇。地位和名声扩展之快，远胜任何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帅。

此时的谭厚兰，这个多少祖辈都默默无闻的女人飘飘然了，在胜利的光环中，她觉得仿佛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无所畏惧的勇士。正因如此，谭厚兰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内。中央文革那帮人打算利用谭厚兰干一票大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孔老二的反。“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自己画的图交给谭厚兰，阴险地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从此，谭厚兰迎来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人生之中，总是机遇和陷阱并存，能否识别就看个人的造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陷入历史罪人的陷阱；谭厚兰却认为是一个机会，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

于是谭厚兰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两百人，又经过一番串联游说，在曲阜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号到十二月九号，前后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战绩如下：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在孔林中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掉下三代坟（安葬在孔林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父亲祖父），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鞭尸批判，曝尸示众。

这些还没完，由于从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满了一箱子。它们触动了潜伏在人心那黑暗的欲望，以致半个月后，引发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把孔林的三千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其恶劣程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拥有军阀、走狗、汉奸三重身份的石友三火焚少林寺堪与之相比。

——这是文革时代，中国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谭厚兰及其随从的疯狂行为，以及因为其疯狂行为引发的更为疯狂的行为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谭厚兰出名了，一时间轰动京城。

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脑袋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与姚文元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荣耀来得太快、太突然、太猛烈，超过那个来自乡野的大龄女青年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她能干的也就是顺应形势，在打砸抢的道路上走到黑。

然而辉煌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尽的黑暗。接着，红卫兵分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谭厚兰控制不了局面。随着工宣队进驻校园，谭厚兰失去了活动的空间，然后被隔离审查，痛苦忏悔。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一九八二年因癌症死去，年仅四十五岁，未婚。五大领袖中，谭厚兰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尽管轰轰烈烈过，历史证明，谭厚兰最终还是个可怜的女人。

再说一说破坏孔子墓造成的影响。

孔子是谁啊？是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整个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那个符号。孔子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不被理解的一生、甚至是失败的一生。许多人说四川漂泊的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主张在华夏走向统一之后开花结果，他后来被推上了神坛。

两千年的王朝，数百位皇帝，有雄才大略型的（如秦皇汉武），有风花雪月型的（如李后主、宋徽宗），有荒淫无度型的（如陈后主），有玩起来没有边际型的（如朱厚照），但孔子只有一个，孔子之后再无孔子。正因如此，孔子之于传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不仅仅具备简单的“人性”，还有附加的“神性”。中国人没有信仰，视皇帝为天子，那么比天子地位更高的孔子自然有某种“神性”。这玩意孔子自己不知道，是后人加上去的。

孔子给了这个世界一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一种秩序。后人可以拒绝孔子的秩序，可以批判孔子的思想，挖孔子的墓有啥用呢？当然，挖了孔子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除去后人强加在孔子身上的多余的“神性”。然而当时的人们恰好不明白，去除一个人身上不正常的“神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批判和教育，而不是去挖墓。

挖了孔子的墓，相当于直接羞辱了孔子，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尊敬崇拜孔子，大家不会认为孔子身上有超人一等的“神性”。但是大家心中对“神性”的崇敬没有消除。当年传统的国学大师、近

代最为坚定的东方主义者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同学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则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是的，国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对“神性”的依赖也是无形的。

破除了孔子身上的“神性”，却没有破除对“神性”的依赖，那么“神性”就会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正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登上神坛。就算他不想上、不愿上也得上。晚年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因为方式不对，必须承担结果。

这也是毛泽东如今被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晚年自嘲曰：本人一生不信有什么权威，到头来我自己成了权威。

（六）王大宾和韩爱晶的光辉业绩

在大饥荒的篇章里说过五虎上将，这里又要介绍五个人。他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牛叉的五个人，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有如下共同点：出身不怎么样，但敢闯敢干，都是闲不住的主；都被工作组批判教育过；都曾名扬天下，最后都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在文革初期有共同的经历：短时间内闹大事，短时间内出大名，短时间内掌大权。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进步，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想要脱颖而出很难。想要在一个班级里拿第一名都不容易，想要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就更难了。他们五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上面已经说了谭厚兰，接下来说说其他四个人。

那么先从王大宾开始。

王大宾，一九四五年出生，四川人，兼具汉族、彝族两种血统，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王大宾确实兴趣广泛、能言善辩，而且特别能混，是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混得很好的人。几个人中，王大宾最能混。就结果而言，王大宾混得最好。下海经商，好不快活。

当时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多半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种地，而王大宾得到学习的机会。学生时代的王大宾是个好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了大学，成为乡村飞出来的第一只金凤凰。考上大学之后，面临专业问题。常言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那些玩意都在地下，不能用。因为人才奇缺，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

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王大宾念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而有趣。从此他立志搞地质勘探。报考了地质学院。

进了地质学院之后，看了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当时王大宾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没能分配工作。毕业成了失业的代名词，和今天的广大青年一样。但和今天年轻人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当啃老族，当时则没啥可以啃。

既然不让工作，那就把精神投入到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这个事业中。情节还是老一套了：王大宾贴大字报批判学院领导，因为没有身世背景，反过来被工作组批判，却增加了知名度。工作组被撤销之后，王大宾认为没有工作是修正主义的错，出了问题还是修正主义的错，那就和修正主义斗争吧。

下定决心之后，满腔热血的王大宾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行串联、游说工作，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名曰东方红公社，自任政委兼司令员，一时间威风凛凛，开始干起了造反的营生。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大宾并不是地质学院的一把手。当时的一把手是朱成昭，此人应归于老红卫兵，随后立场转变了，挨了批。王大宾因为把造反精神发扬光大，成了一把手。既然成了司令，那就要有个司令的样子，干点大买卖，就要冲出地质学院，冲向地质部。地质部曾派过工作组到地质学院修理过王大宾同学。现在王大宾成了王司令，自然呀反过头来找地质部的领导们算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二十一岁的王大宾司令率领东方红公社成员一千多人，打着红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去了地质部，要求批斗副部长邹家尤。邹家尤曾经是工作组组长，也是造反派痛恨的对象。他们要给邹部长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泄愤。地质部当然不同意。

造反派说，交人。地质部说，不给。

双方口水几回合，搞得王司令很没面子。王司令决定发大招，率领一千多人在地质部静坐示威，说地质部不把邹部长叫出来，俺们这些革命小将就不走了，而且不吃饭，就死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要无赖，就好比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抢劫，说：你不让我抢，我就自杀。

造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了不得啊。

王司令勇敢的行为照例赢得中央文革的支持。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中央文革认为王大宾同学的

家庭背景都可靠，是个可造之材，就要求地质部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地质部顶不住了，邹部长顶不住了。

邹部长去了地质学院，革命小将们给他提供一套全程服务，从精神到肉体。几番批判之后，王大宾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人生还算可以，就放邹部长回地质部去了。然而眼见其他红卫兵社团红红火火，王司令又感到失落。他认为工作组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不仅要打到邹家尤，还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在九月五号那天，王司令率领革命小将再进地质部找茬，说上次批判邹部长很过瘾，咱们需要再次过把瘾。邹部长很识相，充分发扬舍身喂虎的精神，再次去接受革命小将提供的全套服务。

但是地质部的领导们很快发现，邹部长虽然英勇献身了，世界依然没有清静，窗外依然有小将们在那里静坐、耍无赖。他们也不是真的静坐，时不时闯入各个办公室、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名、实际上到处乱翻，时不时抢走一些资料，比当今的城管还要霸道。原来以王司令为首的小将们要独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不能不承认，毕业就失业的王大宾同学的胃口大了那么一点点。然而他们能成功么？

他们的野心惹来了另外一群造反派，一个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当时很牛的一个组织。西纠的人不爽了，大家同为造反的，凭啥你王大宾要把功劳占完？他们决定跟王大宾的井冈山战斗队抢战功，就发出警告说，井冈山公社那些货赶快滚，地质部是我们西纠的菜，再不滚我们就不客气了。王司令一看来个抢饭碗的，自然很不爽。你们谁啊，凭啥让老子滚？偏不滚！一方让滚蛋，一方不滚蛋。结果当然很明显，要比拳头。一番比划下来，王司令决定当一回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暂时滚蛋。

滚蛋之后的王司令非常不爽，心想自己一帮人马在地质部搞了半个月，竟然一无所获，太没面子了，太伤自尊了。于是重振旗鼓，趁西纠那般龟孙子不在，率人三进地质部。为了师出有名，直接亮出旗号，要打倒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毛泽东就是派何长工去给朱德传信的。王司令可不管这些，在他眼里，何书记是金灿灿的“战争果实”，要收藏好。

为了防止西纠队前来抢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连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慢慢审问批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王司令再次率领井冈山公社的小战士们，四闯地质部，把地质部的领导班子统统打倒在地才鸣金收兵。

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待业青年王大宾同学化身司令官，四闯地质部，打倒砸烂一个部委，战斗力之强悍堪比最先进的坦克车。这样的光辉事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奇迹”不断的年月依然十分耀眼。于是来自四川乡下的穷小子出名了，成为红卫兵时代的弄潮儿。

此后王大宾同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毁古迹，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系列打砸抢的表演中，王大宾同学更加赢得了中央文革的好感，最后混得了红卫兵“地派”领袖。

在王大宾的造反事迹中，最恶劣的就是揪斗彭德怀。

六六年底，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刺激地质学院的学生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听江青这样一说，王大宾再次热血沸腾了。随后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去成都抓彭德怀了。但是让王司令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天派”领袖，北航的司令官——韩爱晶韩司令，他们在揪斗彭德怀的问题上，把阴暗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韩爱晶和王大宾同龄，生于一九四五年，江苏涟水人。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革命烈士，继父是个中层干部，家境尚可，不为衣食住行犯愁。

韩爱晶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用在大美女身上也无不可。其人低调沉默，看起来既不凶也不恶。但沉默的外表下是燃烧的内心，低调的行为隐藏着强悍的性格。沉默低调有助于抵抗外界的干扰，火热的内心和强悍的个性则是内在动力。这种人天生就是事业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管走上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都比一般人走得远。韩爱晶的一生就遵循这个轨迹。出狱之后的韩爱晶下海经商，孤身闯荡深圳，成了一家负债千万的国企总经理。数年之后，那家国企起死回生，竟然还清债务。如果这些事业不算稀奇，那么在生活上绝对无可指责。

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说，就是欲望海洋：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欲望海洋就是有钱有权人物的天堂，诱惑无处不在，理由一大车。在这个海洋里，韩爱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天堂一样的生活，如同诸神一般放纵。韩爱晶不同，依然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搞男女关系，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穿着上还是当年那副寒酸样。然而买卖依然照做，大家都知道他叫韩爱晶，标准的老派知识分子。假如中国当今的官商，不说全部，大多数能这么干，中国将无比的强大、富有、和谐。

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不是和印象里的红卫兵不太一致？很显然后期的韩爱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前期的韩爱晶呢？

沉默上劲的韩爱晶念书很好，去了北航，成为高材生，赶上文革。

文革中，二十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青年韩爱晶同学出名了。别人出名基本上都是靠闹，而韩爱晶之所以出名，靠一股傻气。

北航隶属国防科委，文革开始后，大家都造领导的反，北航也去造国防科委的反。当然国防科委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凭啥要接受你们一帮儿子辈、孙子辈的小家伙批判？没有理由啊。革命小将也有自己的招数，以静坐请愿——耍赖——的方式开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出来接受俺们的批判，俺们就坐在这里不走，到时候找毛主席评理去，就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你们怎么交代。

静坐的人群中，小青年韩爱晶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一口气静坐了二十八个昼夜。想一想这是啥概念，二十八天，四个星期。这么说吧，四个星期连续上班，无休息日，看看有多少人能忍受？下班之后还有机会吃吃饭、唠唠嗑、玩玩游戏，甚至还能和发烧友一起发发烧。韩爱晶同学在二十八天的时间里，没有休闲娱乐、没有上下班，没有加班工资；吃饭估计也就是校友带点盒饭，睡觉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当时是夏天，夜里肯定蚊虫不断。就算有蚊帐好了，二十八天的时间里肯定有天气变化，遇到暴风雨天气，最多也就是跑到走廊下面躲一躲。二十八天不下火线，肯定没机会洗澡换衣服了。就算能借雨水冲一冲，那也免不了满身臭味。可以说这二十八天静坐，艰苦程度堪比当年长征时流落在南方的游击队员，远比今日致力普及民主自由的公知们给力。

韩爱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与其说是理想信念，倒不如说是傻气。一个沉默寡言却又不屈不挠的书生固有的傻气。俗话说，傻人有傻运。

二十八天之后，满身臭味的韩爱晶同学在同学们惊讶、钦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火线，立刻成为英雄。这下出名了，彻底出名了，成了名动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司令（总勤务员）。

第一代打天下的将帅们通常都是年轻有为。像林彪同志，二十三、四岁就成了军团长。文革的小将更快，韩爱晶同学才二十一岁不到就成了韩司令，手下的人手比林彪刚上任时红一军团的人数还多。林彪当军团长之前，好歹在黄埔军校里呆过半年（黄埔军校精英最多的就前几期，在校时间也就三到六个月，学点基本常识），好歹经历过几年残酷的战争考验。韩爱晶同学倒好，静坐二十八天之后一步登天。实际上是拔苗助长。

韩司令为了扩大影响，建立联络站、调查站，开始批斗人。所有的红卫兵领袖中，大概韩爱晶的批斗名单最有分量。在他的名单上，有打倒徐向前，有炮轰陈毅，有推倒叶剑英。另外他还联合成立过“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想要批斗刘少奇。然而韩爱晶同学还是太幼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虽然他已经很卖力了，印制了大批传单，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徐向前曾经是逃兵，说陈毅恶毒反对毛主席，说叶剑英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鼓开道，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陈毅还是陈毅、叶剑英还是叶剑英，一个也没有倒下。即使因为二月逆流挨批了，也和他韩爱晶无关。批判刘少奇，也争不过清华。

折腾半天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表面红红火火，实际事情没干成一件。韩爱晶同学表示很难接

受大好环境下一无所获的局面。眼见中戏抓走了彭真，清华弄出了刘少奇，北大批判邓小平，甚至连朱成昭和王大宾都跑成都抓彭德怀去了，“大走资派”一个个在减少。

怎么办呢？那就抢。去成都和王大宾他们抢彭德怀！想干就干，带着大队人马去成都抢人。听了江青的鼓动，王大宾第三天就带着井冈山公社的人马去了成都，已经很迅速了。哪知韩爱晶更为迅猛，第二天就带着红旗战斗队去了成都，在王大宾之前找到彭德怀，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王大宾非常恼火，一边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自己则亲自带领造反派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不仅如此，王大宾还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 and 文件两百多份。

然后王大宾带着人马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韩爱晶的人马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际，突然发动进攻，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了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跑到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韩爱晶决一死战的架式。

想彭德怀一生英雄，遭遇穷凶极恶之辈无数，临了却遇到两个克星：二杆子王大宾和一根筋韩爱晶。两人在从北京去成都的路上，上演了争夺彭德怀的闹剧。正是因为这两排敌对人马的竞争，导致回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两伙人的迫害。两帮相互看不上眼的二逼青年轮番把怨气发泄到彭德怀身上。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大宾就开始对彭德怀进行审问。下面是当年在场的红卫兵记录下来的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

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

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

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十六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审问对白是如此滑稽，颠倒是非；和当年红卫兵运动一样滑稽，颠倒是非。王大宾没问出来啥，感觉很没面子。回到北京之后就采取了野蛮的办法。王大宾让彭德怀写材料。彭德怀被烦得不行，就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出来。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鲜血流出。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六十九岁，是个白发老人。

这些只是开始。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彭德怀在北京军区被保护过一段时间。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交给红卫兵，最丑陋的一面上演了：由地派的韩爱晶和天派的王大宾轮番审问。

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嘶喊“打倒彭德怀！”跟班们赶紧跟上。以戚本禹最有代表性：“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七月十九号，轮到北航批斗彭德怀。韩爱晶非常积极。让彭德怀交代罪行未果，韩爱晶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光荣使命，怒气冲天，决定来粗暴的。他走到彭德怀跟前，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把彭德怀打倒后又再揪起来，再打倒，再揪起来，反反复复，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当时的记录：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经过一番批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的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第二天，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浮肿，起床很疼，也非常困

难，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打断彭德怀的肋骨，韩爱晶迎来人生的巅峰。

——这仅仅是一次批斗会而已。六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六十九岁、白发苍苍、肋骨被打断了几根的彭德怀再次被批斗。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统帅百万雄兵的汉子，曾经顶住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敌人，面对十万后生，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脑袋上挂着大牌子，任凭拳打脚踢、扔鸡蛋、白菜。

批斗会之后，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躺在硬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此后的两个月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为一种时尚，各个单位你争我夺，以至于两个月时间内彭德怀被批斗上百次。各个高校、各种单位、各样的人，争相批判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国人啊，你们在干什么？

——彭德怀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能想什么呢？都是曾经拼命保卫过的国人啊、曾经要爱护的下一代啊，又或许他庆幸自己没有留下子女生活在这个疯狂的年代。

彭德怀一生出生入死几十年，敌人给他的伤害加在一起也没有这次多。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王大宾和韩爱晶则是悲剧的代表。说他们是悲剧，除了摧残彭德怀这事，还包括他们自身。

王大宾摧毁地质部的勇气，韩爱晶在国防科委前静坐二十八天的恒心，在常人身上极为罕见。如果说王大宾能把这种勇气用在正确的地方，比方说他的专业——地址勘探，可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业绩。如果韩爱晶把他的恒心，用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很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凡是真正能干一番事业的人，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才华，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困境，还需要恒心去坚持。王大宾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去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

评：韩爱晶和王大宾两个人在当时或许是年少无知、或许是冲动鲁莽，但这些都不是理由。他们的行为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不能说他们本人十恶不赦，而是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和他们同样不可原谅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和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烽，他们以军人的身份，殴打曾经的统帅，老上级，老军人，丢尽了军人的脸。

（七）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中，聂元梓是最特殊的一个。五大高人中，聂元梓的年龄最大、入党时间最早、斗争经验最为丰富。其他四位领袖均为后生，聂元梓不是，只有她有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在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王光美和孙维世。和豪门世家的王光美、以及革命世家的孙维世不同，聂元梓是另外一类人：虽然生逢乱世，却衣食无忧；虽然衣食无忧，精神却动荡不安，因为那是乱世。

聂元梓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爸爸叫聂挺俊，是一个医生，同时是拥有一百多亩田地的小地主。但是身兼中医师和地主两重身份的聂挺俊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保守，闲着没事关心国家大事，几个孩子都送去念书。那恰恰是一个读书人没办法读书的年代，聂家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搞革命去了，把聂家变成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大聂真去北京上中法大学，总是没办法毕业，老是问家里要钱。后来才发现，原来聂真同学不是不学习，而是过于积极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念书为名向家里要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当然中法大学那是有革命传统的，比方说陈毅和张云逸就是杰出的革命派，身为师弟的聂真也不想落后。当局为了逮捕聂真，常常深更半夜去聂家搜查。尽管如此，聂家的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地闹革命了。为了革命，被通缉的被通缉（聂元梓大哥），被逮捕的被逮捕（聂元梓四哥）；结婚的闹离婚（聂元梓的大哥大姐），要当新娘子的跑掉（聂元梓的二姐）。

这些人把聂家变成了革命基地，周边的同志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在当局的统计榜上），肚子饿了就跑去聂家吃免费晚餐；有伤病就去聂家治病，没钱就免费。聂元梓的三哥成了当地县委领导，就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家，鼎鼎大名的赵紫阳去过聂家活动。革命家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当局抓聂元梓的三哥抓不着，就把聂元梓的妈妈抓去和猪关在一起。比方说敌人抓住聂元梓的二哥之后，为了让她二哥招供，就把她侄子给残忍杀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聂元梓，除了干革命就看不见别的出路。

聂元梓天生就是干革命的料。聂元梓生在旧时代却不裹脚，敢于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就敢去寻找革命党，寻找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就和她二姐一起在太原城墙下面印情报刊物。那份刊物的读者只有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由于表现积极，十七岁就成了中条山地委副书记。太原陷落之后，聂元梓跟随组织辗转到开封，然后又九死一生到延安。正是在延安，聂元梓对理论工作感兴趣。为了在延安党校学习理论，她甚至放弃了去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机会。因为对理论感兴趣，她回绝了拿枪杆子的追求者，选择了一个笔杆子，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

延安当时的女性比例非常低，聂元梓当时正值青春妙龄，要是选择一个将军的话，级别绝不会低，但是她选择了吴宏毅。吴宏毅是知识分子出身，当时是有名的战地记者，身材高大，能说会道。解放后，吴宏毅成了哈尔滨副市长。客观上说，吴宏毅条件不错，完全配得上聂元梓，只是有一个毛病：生活太超前——乱搞男女关系——像今天某些干部。那种事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忍受的，聂元梓做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选择——离婚。

随后聂元梓去了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亲自要求的。六年之后，陆平肠子都悔青了。单以工作而论，聂元梓在北大还是合格的。虽然她不懂经济，但是长期的革命工作，使得她善于梳理人际关系，对知识分子啥的，该尊重的尊重。而且她工作比较讲原则，干得还不错。正因为干得不错，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哲学系担任党委书记。当年北大哲学系是整个北京大学的核心，成员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名人总是和高层扯在一起。所以哲学系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聂元梓很快对哲学系的工作作风不满，她发现陆校长在北大搞小圈圈。

在北大，领导核心是党委。党委又有核心——常委会。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就是以陆平为首的几个人。大圈套小圈，圈内有圈圈。其实聂元梓也可以看做是陆平的亲信，毕竟是陆平亲自要求调进北大的嘛，而且把她放在了哲学系党委书记的位置上。按一般的观点，聂元梓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确实干好了自己的工作，还干了工作之外的事。然而从成长经历来看，聂元梓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那种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永远的革命者。而且在聂元梓看来，陆平还有官僚主义作风，理由是不怎么管哲学系的事。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陆平是铁道部进北大的，从铁道部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当助手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陆平对哲学系那一大堆理论争论是否搞得清、是否有兴趣搞清楚也是值得讨论的。但是聂元梓认为陆平工作不到位，要提意见。

提意见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容易上纲上线。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来四清去，清个没完。聂元梓对工作组提了对陆平的意见。陆平认为聂元梓这个人不可靠，反过来对她进行批判教育。一段时期内，聂元梓等提意见的人在北大成了监视跟踪的对象。聂元梓很来火，甚至给毛泽东写信诉不平。

文革开始之际，又给了聂元梓提意见的机会。于是她和几个人一起写了陆平的大字报。大字报这玩意在当时不算啥，满大街都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字报还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然而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不同，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登上“全国第一张无产阶级大字报”的宝座。

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陆平倒霉了，成为牛鬼蛇神；聂元梓出名了，成为北大的一把手。北大一把手的战斗能力是很强大的，成绩单不可能就打倒一个北大校长那么简单。她的战斗力很强，成绩单也是非常优异的。

聂元梓第二个丈夫叫吴溉之。吴溉之，年长聂元梓二十岁，是一位老党员、老红军，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跟过贺龙和黄公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高干人物，当时的吴溉之和组织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肖劲光关系不错，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打麻将。聂元梓嫁给吴溉之之后发现组织部长安子文和一个叫邓觉先的女人关系非常暧昧。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取证、推理之后，聂元梓认为邓觉先可能是特务。

既然邓觉先可能是特务，那么正部级的安子文也有特务嫌疑。这事本来和聂元梓也没有关系。但聂元梓再一次眼中容不得沙子，为了党和组织的利益，决定揭发。本来她想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揭发，后来在同僚的指点下向康生揭发。结果当然很明显。安子文完蛋了，当然后来也平反了。邓觉先没了下文。由安子文联系到吴溉之。聂元梓没法，只好和吴溉之离婚了，尽管她对吴溉之感觉很好。吴溉之在两年之后病逝。

在聂元梓的造反成绩单上，最鲜亮的一笔应该是关于邓小平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后台老板。大家把火力集中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当然是聂元梓同志。于是一份战斗力极强的大字报出炉了，主要内容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却是她签名的。由于聂元梓当时的名气很大，就把这份“功绩”算在她身上了。同时揪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功劳也落到北大的头上，所以北大也成了当年轻次于清华（揪出刘少奇）的战斗名校。当时聂元梓是头顶风光的，后来辩护时才说和她没有关系，晚了。

此外，在聂元梓的成绩单上，还包括错误地参与批判朱德（误以为是批判刘白羽），到上海搞串联，参与夺权，相当优异。康生请她吃饭，告诉她有事常来汇报。江青请她吃饭曰：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请她吃饭，打听革命行动的最新信息。她可以出入中南海，可以去告状，并且获得一个响亮的绰号——“北大老佛爷”。上一个拥有“老佛爷”绰号的女人，是在中国只手遮天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聂元梓能在北大混得此称号，也算是慈禧的山寨版本。

看了这个华丽的成绩单，联想到红卫兵造反，不要以为聂元梓是一个人品极为低劣的人。前面就已经说过，聂元梓经历过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而且放着好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夫人不当，为了所谓的组织原则跑去揭发毫不相干的安子文，丢了还算满意的家庭。只能解释为她是个组织原则很强的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投机倒把，想要掌握权力往上爬。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定了这个观点：文革很乱，中宣部把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聂元梓等人负责保护。那些档案都是有问题的，把它们放出去的话，在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指示，红卫兵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然而聂元梓不但没有公开，而且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反而是工宣队进校之后，把档案公开了。从这点来说，聂元梓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人品不坏的聂元梓为何成了红卫兵领袖呢？首先，红卫兵领袖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如果把

红卫兵说成坏人，那就大大降低了文革的悲剧性。其次从聂元梓一贯的表现来看，她的人生是一致的，即革命年代对敌人斗争；和平年代继续斗争，把她看不惯的人或事当成敌对势力，借助特殊年代，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之。

评，聂元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直处于革命的状态。如果说聂元梓有什么错，那就是没有理解：这世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是聂元梓的个人悲剧。更为悲剧的是，那个时代，像聂元梓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八）蒯大富同学

造反派五大领袖中，三男两女，三个男人同龄，都是一九四五年的人。

曾经的风云人物，红卫兵天字第一号领袖——蒯大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他的祖先曾经富有过，后来变穷了。到他爷爷那一辈变穷了。他爷爷爱赌钱，很有特点，逢赌必输。把家财和土地输光之后重抄祖业，贩私盐。当时正在抗战，贩私盐的利润很大，但是蒯大富的爷爷走私很不走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当兵也不是去抗日，而是跟新四军打仗。而蒯大富的爷爷当兵也不走运，跟新四军打仗也不成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最后变成新四军。蒯大富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那会入党的，都是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

蒯大富就成了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国家的人，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典型人物：能吃苦，爱劳动，并且以此为道德准则要求别人。

如果说是农民，能吃苦爱劳动的品德就体现在种田上。蒯大富是学生，吃苦耐劳的本事就体现在学习上。蒯大富同学的学习成绩非常牛叉，在没有报辅导班、请家教的情况下，他的数理化成绩经常考满分，某次不是满分，会拉下脸老半天，做一副懊恼状。不要以为他是天才，这是努力得来的。为了备战高考，蒯大富同学拿出老农民耕地的精神，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又常常半夜三更起床。老师一般对别的同学都说，人生在此一举，多学点吧，革命需要多投入点；对蒯大富同学则说，你小子悠着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就是这样一番努力，蒯大富修成正果，麻雀变凤凰，成为苏北村旮旯里首位清华大学生，而且是搞核研究，全班清一色的男同胞。按道理说，核研究足够蒯大富同学搞一辈子了。然而蒯大富同学是与众不同的，他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光大。看见别的同学吃剩饭，浪费粮食，蒯大富同学就贴大字报，提倡大家节俭。这是好事，理应得到赞扬。为了杜绝浪费，蒯大富同学进一步提倡大家吃红薯不要剥皮，向乡下老农民那般，连皮一起吃掉。这就是好事干过头，强人所难，就左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红薯皮的。即使在乡下，红薯皮多半喂牲口。现在蒯大富同学竟然号召清华那些高干子弟去吃红薯皮。别人不吃，他就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还是小事。蒯大富同学还放着核物理不去研究，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虽然读书人要关心天下事吧，但如果都去关心天下事了，还谁去读书？核物理谁去搞？这些事情至少展示了蒯大富同学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这种人生在文革，就是红卫兵最好的料子。也正是蒯大富同学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战绩和学校的名气非常的般配。

红卫兵起来之后，蒯大富写大字报保清华校长蒋南翔。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反蒋南翔，结果蒯大富和一帮同学发现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毛主席的要求不一致，就去贴大字报，和工作组辩论。六月十六号那天，薄一波去清华，看见蒯大富的大字报。当时两人互不相识，一番交谈之后，互不感冒。薄一波问蒯大富属于哪一派，蒯大富说他是革命左派。薄一波说：左得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

蒯大富之所以在清华闹得那么大，主要是因进清华的工作组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博学多才、漂亮优雅的王光美女士。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一员搞四清的，通过一系列的蹲点、调查、取样、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样板，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桃园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王光美再次化名，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清华，也是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样板，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成为清华经验。

由于蒯大富同学积极张贴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就跟蒯大富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座谈会，你也去参加吧。当时王光美确实去了，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发言，大家也不认识她（信息传播不发达啊）。开完会之后，蒯大富等人以为王光美没到，感觉小心灵受到伤害，又去战斗了：就去贴大字报说工作组骗人，搞得工作组相当狼狈。

工作组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决定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就说蒯大富同学有野心，要夺权，是反党反革命。实际上是想把蒯大富树立成典型，然后以此为经验推广。然后蒯大富同学的好日子过完了：凡是蒯大富同学上台讲话，总会被喝倒彩；蒯大富同学四处告状说俺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没有人鸟他。

换成一般人估计就休息了，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不对。毕竟对方是政府，对手都是高干，弄不好真的反党反政府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蒯大富同学充分发扬能折腾的精神，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天天去贴大字报。工作组则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终于，蒯大富同学进了黑屋子。

能折腾的蒯大富使出最后一招，绝食。他不想死，只想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结果没人鸟他。继续绝食吧，肚子抗议；吃饭吧，又拉不下脸。眼看年轻的蒯大富同学即将把自己折腾掉，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点化了蒯大富同学，闹啥闹嘛，身体是革命本钱。于是蒯大富有了台阶下，开始吃饭，抖擞精神准备新的征程。

恰好这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工作组给撤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蒯大富。

这一切当然都被中央文革看在眼里。中央文革的王立和关锋穿着军装找到蒯大富，说呢写材料吧。不仅如此，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同学谈话多次，询问工作组的事，并亲自为他平反。蒯大富随后成立自己的组织——清华井冈山。为了方便斗争，还弄出一个《百丑图》来，就是通过漫画的形式，把彭真、薄一波等人丑化到一起，便于大家泼脏水。漫画是北京戏曲学院弄出来的（学有所用啊），蒯大富很欣赏，就在清华报刊上发表，当然功劳和后来的过失也算在蒯大富的头上。

蒯大富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人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彻底演活了咸鱼翻身的反转剧。张春桥亲自把他推荐给江青，一时间红得发紫。就连王洪文同志从上海到北京，就是蒯大富带着去见中央领导人的。

其实多大的事嘛，就是王光美是否参加座谈会引起的误会，最后竟然弄出来阶级斗争。咸鱼翻身的蒯大富把这一切都归于刘少奇和王光美，他决定继续折腾，就是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揪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批斗王光美事件。

确切的说是骗。当时的王光美还是国家主席夫人，住在中南海，要想把她骗出来批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骗她，必然瞒不过刘少奇。刘少奇除了是国家主席之外，还有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被忽悠的概率应该不高。但是能进清华的人智商都不低——让我们来看看那帮清华学子的智商究竟有多高。

清华井冈山专门有一个小组叫捉鬼队，这个小队就是负责打击工作的。这个小队的成员决定把王光美给骗出来。十一月六号那天，捉鬼队行动了。

捉鬼队首先发挥聪明才智说服了王光美的二女儿刘婷婷，让她和他们一起欺骗自己的妈妈。接下来找到师大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中南海，同时扣留了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有人先冒充西单交通中队的交警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这时候王光美可能还不相信，但这只是第一招。

接着又有人冒充北大医院的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证实说你孩子受伤了。

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又是女儿打电话，这样一个连环套可以忽悠特工了。最要命的是，刘少奇、王光美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对待孩子方面终究还是父亲和母亲，孩子是连心肉，和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上当在所难免。

所以清华园高智商的学子们成功了，成功地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骗了出来。只是当时局势不明

朗。他们没敢对刘少奇怎么样，只是把王光美给抓去批斗一番。这就是第一次批斗王光美。江青对此很开心，因为王光美是她的敌人。事后特意打电话给蒯大富，表扬了他一番。蒯大富同学仿佛看到了前途一片光芒。他决定再接再厉，于是点名打倒刘少奇。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蒯大富迎来了人生的高潮，恍然间拥有呼风唤雨的感觉。

红卫兵五大领袖，各有各的战绩。他们凭借自身的战绩在那个诡异的年代，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麻雀变凤凰。他们的获奖感言是：首先要感谢国家和伟大领袖提供了机会，其次感谢老师们多年的栽培，感谢父母给个好出生；最主要的、也是最需要感谢的则是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们。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的直接领导、指挥下，才尽量少走弯路，指哪打哪。

七、中央文革小组

（一）诞生

文化大革命，文武两手，武的一块由红卫兵来做，那么文的一块由那些人负责呢？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起这个小组，许多人都咬牙切齿。

好吧，就看看他们是如何让人痛恨的。

中央文革的前身是五人小组。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功能是引导全国的文化方向。五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一共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就弄出来一个《二月提纲》，随后遭到批判。《五一六通知》之后，彭真和陆定一成了反革命，改组势在必行。

于是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起初它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甚至连公务员编制都没有。但是成长速度却极其惊人，很快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可以说是史上掌权最迅速的组织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看看这个名单，一共十四个人，除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有干实事的本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靠理论（嘴和笔）吃饭的。康生也能干实事，只不过特殊一点，是整人。

随着时间的推进，凡是动嘴不积极的，统统抛出去，十四人又开始精简。第一个出局的是穆欣。穆欣，河南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七岁加入中共，一直搞宣传，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时，职位是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因态度不够积极、和之前的一些牛鬼蛇神的关系扯不清，就从江青那里得到一顶大帽子——叛徒。

名单中的尹达最为怪异，因为尹达是搞考古的，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没理由进中央文革。尹达一辈子都在搞考古，搞学术研究。这种人拉去搞文革斗争，明显

是专业不对口啊，出局也是必然的。当然出局也戴了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

接下来轮到三位能干实事的人了。在靠笔杆子和嘴皮子耍宝的中央文革里面，能干实事的必然要被淘汰。因为理论家们可以让牛在天上飞，实干者是不可能这么干的。王任重和刘志坚两个人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理论功底，由于要干点实事，肯定不能达标，于是遭到理论家们的火力伺候。于是王任重被迫“离职养病”，实际是靠边站了。

至于刘志坚，本来算林彪的人，林彪曾派他到上海帮助江青。江青那个谈话纪要，刘志坚参与整理过。刘志坚能进中央文革，也和这层关系有关。无奈他是军人，干事和演戏出身的江青实在不是一个风格。然而中央文革是一个是非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想要出去，必然要戴帽子的。军人最怕的帽子是啥？答曰，叛徒。

然后陶铸。陶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却被中央文革自己给踢出去了。经过一系列的策划、炮轰之后，陶铸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出局，中央文革看似胜利，实则干了一件蠢事。左派很少有人意识到，陶铸的出局已经暗示了中央文革最后的结局。这一点稍后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成了一个纯粹的舌头笔杆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靠这些人干事业是没有指望的。正因如此，文革结束才遥遥无期。毛泽东一世英名，被空喊派玷污了一世英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之极，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扔了。加上陈伯达生病，实权落到江青的手中，后来再倒向林彪。中央文革实际瘦身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加上后来的王洪文异军突起，四人帮便诞生了。中央文革是五人小组的变体，同时是四人帮的母体。

中央文革的改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青。通过二十几年的折腾，她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舞台。

（二）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宣传飞角度上说，很简单，坏人。然而好人和坏人的

概念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在现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他们有的人人品确实不行，比方说康生同志；有人有过混乱的私生活，比方说早期的江青；所有人都显得很狂热，舌头上堆满棍子和帽子，随时准备横扫一大片，然后戴上某种帽子，简直是贩卖棍子和帽子的专业户。然而从另外一面看，他们虽然每个都声名显赫，却很少以权谋私。除了康生善于私藏文物古玩，除了江青收集衣帽装饰品，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按照惯例中饱私囊，也没有为亲朋好友安排要职。

从人品上说，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还是可靠的。比方说张春桥，一直追随那种思想到最后。如果说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那么戚本禹是被毛泽东一手推入深渊的，文革结束时，又因为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而被判刑。晚年的戚本禹看见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污蔑毛泽东时，依然为毛泽东辩解。其实他可以像李志绥一样写东西污蔑毛泽东来赚钱，而且可以“爆料更猛烈”，但他没有那么做，表示人品还是可以的。

从政治的角度上讲，左派和右派，或许境界有差别，但各有各的追求。正是因为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又影响到社会生活，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央文革那些人都是玩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他们通过笔杆子和嘴皮子去影响、指挥红卫兵打砸抢。殴打彭德怀，侮辱王光美，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试图通过嘴和笔摆平现实世界，却发现敌人众多。因为嘴和笔只能捣鼓出理论。理论那玩意都不是万能的，即便是科学定律，也和很多社会现实冲突，何况是政治理论。

当一群理论家坚持一种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满世界、满大街、满房子的敌人。根据极左派的理论，官吏体系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遍地都是；根据极左派的理论，满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和事，很多人的行为不仅和资本主义挂钩、而且和特务很相似；根据极左派的理论，中央开会时，除了他们几个人，其他人要么右派、要么即将是右派。仿佛这个世界即将完蛋了，只有他们几个在拯救世界，怎么办呢？那就战斗吧。

如果让世界服从于道德，那么自己首先应该是道德的。首先就要把那些认为自己不道德的人和事消灭。在这方面，中央文革的实际领袖江青给大家做了一个模范。在前面说过，江青的性格里面有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因为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使得她在年轻时代有过一些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交过不少男朋友，在上海滩和同行抢戏。这些本来没啥，但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准来看，在道德作风上是过不了关的。即使能过关，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旗手。江青要成为旗手，就要修补过去的形象。

当江青高高在上，成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的时候，江青是一个爱记仇，或者说爱恨分明的人，有时候她分不清细节和原则之间的轻重。比方说她看毛岸英的遗孀张松林不爽，就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时啰嗦张松林的不是。红卫兵就去批判张松林，搞得张松林姐妹被迫流浪。毛岸英是毛泽

东最亲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对刘松林是非常关照的。

刘松林不是重点。重点是修理一些当年知道她老底的那些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修理那些旧时代的“戏子”简直是太容易了，举手之劳。跟她抢戏的王莹悲剧了，知道她和唐纳结婚的那一大串人悲剧了。除了国外的和死去的，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包括孙维世（知道江青在上海的事）在内，基本上都是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连当年给她打下手的秦桂珍都没能幸免。

秦桂珍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照顾过江青，江青当年对秦桂珍相当感激。为了旗手的声誉，江青让吴法宪派人把秦桂珍从上海挖到秦城监狱，成了“特务”。可怜的秦桂珍当了一辈子佣人，生于贫苦，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穷水手，没几年就死了，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地活着，一辈子不知道特务这两个字怎么写，竟然享受到特务的待遇。一次次的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原本身体非常好的秦桂珍大病不断。她的头发被拔光了，脑袋上只留下一小撮头发，是用来揪脑袋用的。直到一九七五年，奄奄一息的秦桂珍才走出秦城监狱。

幸好黄敬早死，幸好唐纳在国外，不然不知道又将闹出怎样的风雨。

中央文革舞台上的江青，第一个角色是复仇者，第二个角色才是斗争者。从女人的角度上看，够得上分量的对手也就一个王光美。其他的高干夫人非常低调，比方说邓颖超，比方说卓琳。叶群当时倒是非常高调，但她是跟着江青的。

王光美和江青比起来有很多优势。比学历、比知识，均是王光美胜出。论风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访问，风头盖过江青。论干事，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整出了样板——桃园经验。论容貌气质，两个人旗鼓相当。江青也有优势，比方说革命资历，入党比王光美早，在戏剧的才华上高于王光美。这些优势可以不计，值得计入的优势是毛泽东的地位高于刘少奇。更大的优势则是当时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政见不合。最大的优势则是，利用中央文革之便，操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是决定性的筹码。能压住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胜。压不住红卫兵，则是毛泽东胜。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和王光美本来没有关系，但政治把他们扯在一起。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些年，江青和王光美关系甚至可以说还不错。江青时常会拉王光美唠嗑，王光美有时也去江青那里串门。两个人常常唠叨唠叨衣服、看电影什么的，感情比较融洽。

然而她们两个终究不是很合拍的女人，差别很大。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比较温和；江青则出身寒微，早早闯荡社会，性格比较倔强。这样的两个人，即使最终归于中南海，思考方式和处事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但并不能形成默契的朋友关系。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思路上出现分歧，她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晴转多云。

一九六三年开始，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还会习惯性地征询一下意见。曾经，王光美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就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寻求意见。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衣服上不要戴别针，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高雅而大度。但是东南亚有些地方很热，穿鹅绒套装简直是找虐。于是王光美改穿了旗袍。在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又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出于礼貌，王光美就穿上旗袍戴着金项链出席晚宴。王光美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兼具知性和美貌；长期出入高层，气质不俗；再配上旗袍和金项链，那叫一个耀眼。要知道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当保守的。

照片传过来之后，同为女人的江青心中有了嫉火。因为王光美俨然成了第一夫人，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头。如果江青像邓颖超或卓琳那般的温和性格也就算了。江青偏偏非常要强，从演戏开始，不是她的要争取，是她的更不能让别人拿走。不是第一夫人的王光美抢了她的风头，如果没有嫉火反而不正常了。嫉火不要紧，要紧的是发泄。直到文革开始，江青才有机会。得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骗斗王光美的事，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笑得非常开心。

第一次批判王光美，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还算比较文明，没有人格侮辱。十一月天冷，他们给王光美一个军大衣。还有一个女生把棉袜脱给她穿了。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定性。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必然遭到清算。既然清算，那就比较野蛮了。

批斗王光美之前，江青对蒯大富等红卫兵说：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又有传言，江青说过：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蒯大富觉得应该让王光美穿当初的旗袍去受审。

红卫兵到王光美家之后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红卫兵就自己打开箱子，把三年前那套衣服给找出来。但是王光美已经变胖了，里面还有毛衣，穿不上。清华的天才们就把两边撕开，直接套上去。至于项链，一般项链太小，没啥效果。捉鬼队——又是他们——别出心裁，把一串乒乓球穿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以示羞辱。王光美就那样被压到清华三十万人的面前接受批斗。

——这是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江青对此很满意，因为她看到了对手的倒下。又经过一番功夫，整出一个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再一次七整八整，把王光美整出一个死刑。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免得一死。

中央文革操纵红卫兵取得很优异的成绩，扳倒了很多大人物，比方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

等。整人方面，更是数不清。抄家方面，还是数不清。按道理说，战绩如此辉煌，该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一下鸣金收兵、整理一下战果了吧。

不，还要继续战斗。

红卫兵们靠着燃烧的激情在前面打砸抢，中央文革则在后面给红卫兵的打砸抢寻找光鲜的理论依据。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过来刺激红卫兵的造反欲望，红卫兵的造反又给中央文革壮大声势。没有中央文革的理论跟进，红卫兵的运动就是粗暴的破坏活动，很难引起多大反响。没有红卫兵运动，中央文革也就是一帮叽叽喳喳的秀才，就是文字功底和战斗力比现在网络世界的喷子高级一点点。

可以说两者相互联系，文武合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家机器被控制的情况下，两者结合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夺权。

按照当时的理论，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国家建设才会出现那么大的篓子。又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把权力夺回来是天经地义。有了权力才能掌控资源、才能继续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运动之前，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王洪文只是一个愣头青，到后期，张春桥差点成为国务院总理，王洪文更牛，差点接班。

（三）夺权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号，中央颁布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简称《十六条》。

思想基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思想基础是有道理的。

目的：一，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也有道理的。

主力军：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这些革命主力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所以造成文革种种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不准女孩子穿高跟鞋。而且在那个阶层中，愤青和压抑者众多，允许他们蛮干的后果极为严重。

战斗手段：敢字当头；方式：发动群众，以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个方式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方式失去最关键的部分，即取证。没有严格的取证程序，这种方式将真假难辨，打击者、报复者、污蔑者、投机者都可以从中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在革命的大旗下行偷鸡摸狗之目的。

战斗原则：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要停下来。

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红卫兵运动正在高峰，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号，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当时的走势。整个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喜欢闹事，就是北京的学生和上海的工人，那是有传统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就是一系列闹事事件中的代表作。当北京学生闹得轰轰烈烈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要夺权嘛，首先要让学生和工人闹起来。中央纲领，红卫兵串联，在加上闹事传统，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学红卫兵的样子搞运动。他们成了“工总司”，搞起了批判事业。由于经验丰富，很快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大手笔，要求批判上海市长曹狄秋。上海属于中央直辖市，市长是省部级别。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虽然打砸抢正搞得轰轰烈烈，但夺权还没有开始，除了被中央划定的右派，还没有大规模的被揪斗的高官。上海要开先例，当然不容易。市委不同意，工人就闹。

工总司的头头叫潘国平，人称潘司令，时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并能说会道，处于敢闯敢干敢闹事的年龄段。说白了，也就是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当过几年兵，刚刚在上海滩卖了几天力气，就要批斗上海市长，口气、派头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最牛叉的公知们，有几个敢让上海市长辞职的？不让批斗，那就游行喊口号。再不行，那就来点花样。

什么花样呢？带着一批工人兄弟去北京上访。他的部将王洪文带着另外一批工人兄弟跟进。现

在大家印象里的上访，都是装孙子，偷偷摸摸，好不容易去到北京，能否如愿亦未可知。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不一样，不但大摇大摆，还大声喊出来说老子要去北京告你们。更牛的是，他们直接冲进火车站，强行上车不买票不算，还要火车给他们调时间。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潘司令的人在嗷嗷乱叫中挤上一列火车，他本人没能挤上去，在月台上等来了王洪文的人，就和王洪文上了同一辆车。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并没有到北京，仅仅是到安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停在那里不动了。派人去跑到安亭站询问情况，得到如下答案：“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原来上当受骗了！太伤自尊了！太可气了！

而且工人内部也出了问题。已经折腾了很久，大家全凭一股热情支持，现在被骗到荒郊野岭，又累又饿又冷，开始骂娘。有人开始骂王洪文，王洪文也不敢吭声。最后还是潘国平比较聪明，勇敢地站出来，想了一招精神爽利法：读毛主席语录。

潘国平就领着大家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此等等，如同和尚念经一般。这一招还真灵。

大家不闹了，情绪再次激昂起来，表示坚决跟着潘司令把伟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想到一个新招：卧轨。他们可不是要自杀，是要扩大影响。安亭是个小站，当时是单线，这样一来整个北京和上海的运输线就断了。双方展开谈判，谈了老半天没有结果，运输瘫痪，惊动中央。不但惊动了中央，而且还影响了时局。

周恩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要求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连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也发电报给工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去了，他站到人生的轮盘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

当时的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中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将爬上权力的山坡。

当时的张春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

张春桥夜里十二点赶到火车站和工人代表谈话，谈到第二天早晨，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中午，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下午四点钟，谈成了，大家回上海再折腾。前后十六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喷唾沫星。

按照张春桥的回忆：“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的，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是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

——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换成一般情况，搞十六个小时的娱乐休闲活动也不见得能撑下去啊。何况站在那里，听粗话，挨骂，不还口不说，还要慢条斯理地讲道理！政治，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能玩政治玩出花样的人，更是不一般啊。

在张春桥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央常委们找过他，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也就是说潘司令及其追随者们卧轨扰乱交通的事不能算革命行为。

中央给张春桥的任务是把工人忽悠回上海。按照保守的选择，张春桥应该把那火药桶扔给上海市委，然后拍拍屁股回北京等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时的夺权还没有开始，局势还不明朗，连陈伯达都在走稳妥的路子，跟周恩来一个调。然而张春桥是一个有水平的人，而且想要的更多。

回到上海之后，张春桥参加了市委常委会议。会议再次强调中央精神，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是靠批判闹事上去的，走的并不是正常的官吏升迁之路，所以曹荻秋对张春桥还是很警惕，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工作，请示之后，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张春桥日后又不认账。当时陶铸不仅主持中央工作，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和康生的职责一样。

应该说曹荻秋能做的就是这些了，而且做得不错，只是错误估计了张春桥。张春桥对陶铸表示服从，随后又去和潘国平、王洪文谈判。就在谈判的过程中，张春桥表态：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一一认可并签字，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是发扬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张春桥这是干什么？先斩后奏！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如果中央权力不发生重组，那么张春桥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坐牢，政治生命结束，还可能坐很久。

别的不说，就那第一条：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啥意思？

就是承认那个机构可以领导上海所有行业的工人闹事。大革命时代搞得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也没有这样一个合法机构，刘少奇和李立三还要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张春桥倒好，私下承认这一切，相当于跟整个政府对着干。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就是相当于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去买彩票，相当疯狂，完全是一种赌博。但是他很幸运，赌赢了，中了大奖，因为毛泽东认可了工人的行为，张春桥则收获了政治生涯中一桶金灿灿的黄金。应该说张春桥根据自己的思考，准确地判断了未来的局势。

事情还没完，既然承认人家工总司是革命的，那对立的上海市政府怎么办？就是反革命咯。即使不说上海市政府是反革命的，那工总司要批判的人总该叫出来吧。造反派们在十一月底夺了解放日报的权，造成了解放日报事件；十二月份又纠集几十人去平康路高喊打倒曹老头，弄出平康路事件，通过一场武斗冲垮了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主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一九六七年为大革命关键的一年。迎着这股势头，上海造反派决定再接再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收拾已经被冲垮的上海市委。一月四号，夺文汇报的权；两天后以工总司的名义开会，宣传打倒上海市委，并发布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随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陈丕显、曹荻秋都完了，站到了被批判的位置上。

结果张春桥成为上海市的光辉代表，一把手，老大。在短短的时间里，张春桥同志就从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上升为一把手，填补了柯庆施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与他一起获利的还有王洪文。原来闹事的头子是潘国平，成功之后，大家重新排座次。王洪文是农民出身，当过兵，又是工人，又是共产党员，根正苗红。潘国平虽然也当过兵，可惜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乎，原来的潘司令让位于王司令，变成了潘副司令。在整个上海，在张春桥、姚文元、许景贤之后，王洪文坐第四把交椅。

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革命，在张春桥眼中，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辉映。

文革之后，这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称为一月夺权。

为了增加权威性，张春桥又把一月夺权冠名为“上海公社”，和巴黎公社对应。以一月夺权为界点，全国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中央文革的文章以及造反派的打砸抢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延续，用道德大棒横扫现实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谁是安全的，连朱老总都受到批判，曰大军阀，因此很多人注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能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都是精英。

牺牲品主要有两类：被迫害致死和被迫害自杀。因为他们的死去，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出现断层。代表事件分别是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和老舍自杀。

张霖之的死，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开始断裂。任何时代，有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不见得会搞社会物质生产，然而没有一个完整而稳定的行政系统就别想搞社会物质生产。行政系统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停顿。有行政系统的时候，生产出来的食品可能安全系数低一点，有人吃了会拉肚子；生产的工业品可能质量差一点。如果没有完整的行政系统，连食品都没有，连次品都没有。

老舍的死是另外一个情况。老舍是文化界精英中的精英，他的自杀不仅仅是死了一个创作者那么简单，而且意味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被截断了。因为在文化界的精英之中，老舍和人民群众的距离非常之近。而且老舍平时生活低调，踏实创造。在整个文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创造思路也是取之于人民、用之于人民，可以说是精英的楷模。如果连老舍都活不下去了，那表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出了问题。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问号：如果连老舍都容不了，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培养出来的创作者能胜过老舍吗？能像老舍一样朴实平静地创造吗？能像老舍一样平白吗？

（四）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这是一个典型，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典型，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高官。

张霖之，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人，师范学历。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的张霖之考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之后加入共产党。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担任一系列的职务，参与淮海战役。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等职。

一九五五年之后迎来人生的高峰，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正部级。

接下来的情节很老套，大跃进，大饥荒，然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路线上发生分歧，张霖之和所有行政官员一样，被夹在中间。和其他行政官员不一样的是，他的煤炭部管理的是资源，而非实实在在的生产。一个普通行政干部受点贿，也就是贪污腐败。煤炭部那可都是大手笔啊，加上管理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放在今天，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意味着酒肉穿肠、香车美女、风光无限。那个时代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再批斗，形同反党反革命，所以张霖之的处境比其他同僚更为艰难。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

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则顶撞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的命运就此注定。从工作关系上看，毛泽东和张霖之并无交集，也没有矛盾。关于煤炭部、冶金部，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有多少人，但部长的名字还是记得的。当毛泽东认为煤炭部、冶金部存在资本主义当权派时，随口就把部长的名字说出来。

只能说张霖之真是太倒霉了！

文革刚刚起来，张霖之立马遭殃。和其他人不同，张霖之并没有被绑架到秘密地点，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批斗。矿院的学生、教师、干部把文斗武斗的基本项目——喷气式、侮辱、毒打——一遍又一遍地用在张霖之身上，因为他们要夺权，要解决张霖之。

张霖之的女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去看望他时看到如下情形：“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之后张霖之的女儿也没能回家，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然而张霖之始终没能屈服，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承认自己是彭真的同党。这让矿院造反派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央文革保证过，要让张霖之“认罪”，要在煤炭部夺权。当时是夺权的高潮，各地的夺权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要夺权，必须让张霖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能防止将来张霖之咸鱼翻身。

为了达到目的，造反派决定按照口号行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也就是要张霖之的命。于是乎，斗争升级。

造反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斗争进行了创新：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不仅有创新，还有复古：造反派弄了一个重三十公斤，即六十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将近六十岁的张霖之，就是年轻人也无法用脑袋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张霖之的头上，把他压倒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昏死过去，造反派欢呼。这种事只有古代的太监们才干得出来，不愧是读书人啊，果然见多识广。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时代的见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号夜，张霖之死，被虐待致死。第二天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1967年1月22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

张霖之死前两周，一月八号，张霖之的战友、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堪羞辱，奋而自杀，留下遗书曰：“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逮捕。杨勇，生于一九一三年，经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后期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开国上将，跟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三位元帅，和杨成武、杨得志并称为中共三杨，赫赫威名。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文革需要夺权的人物之一。杨勇还好，九一三事件之后重见天日，陶勇的事则成了一桩悬案。

张霖之死的前一天，一月二十二号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

陶勇，生于一九一三年，出身红四方面军，之前一直跟随徐向前，直到西路军失败。抗日战争时期，跟着陈毅打；解放战争时期跟着粟裕打。抗美援朝时，陶勇再次走上战场。陶勇在军中一直以悍勇称著。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战舰最后一次在中国耀武扬威，遭到打击，下令开火的人正是陶勇。正是因为这个机缘，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由于陶勇并非林彪嫡系，东海舰队也成了夺权的对象之一。在夺权的过程中，陶勇竟然死在司令部的井里。造反派说陶勇投井自杀。海军政委李作鹏通报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老领导陈毅则说：说陶勇自杀，打死我都不信。另一个老领导、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则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然而正义并未到来，陶勇案没破，陶的妻子又被关押，被迫害身亡。

一月二十八号，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

一月三十号，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的囚禁之中。

如此密集的高干死掉，即使在革命斗争中也不曾出现。而且这些人多半五十多岁，正值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而且他们都是实干家，经过艰苦的磨练，非常靠谱。虽然他们的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当官或者为人有这样难免的缺陷，但那些并不构成在暴风雨中死去的理由。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死是整个社会机器的损失，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只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死去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此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运行出现断裂。

这是以张霖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的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只是整个社会损失的一部分。下面看看另一部分损失——老舍之死。

（五）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前面一个例子讲到了张霖之的死。张霖之的死并不是一个孤证，他的死意味着文革对现实生产的一种冲击。下面说一说另外一种破坏，即对创作者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号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第二天上吊自杀，成为文革风暴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难者。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建国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大饥荒时代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非常毒辣。文革开始后，被戚本禹尊称为叛徒。

邓拓的死仿佛是一个启示，即文化界的精英们如果受不了“牛鬼蛇神的待遇”的话，自杀是唯一的出路。这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杨朔，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人。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不堪忍受之下，上书毛泽东和找单位领导谈话，遭到拒绝。杨朔绝望了，吞服安眠药自杀。

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傅雷，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之后，被连续抄家四天三夜，与此同时，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不堪侮辱之下，夫妻双双绝望，上吊自杀。

最好的历史散文学家之一，翦伯赞，文革中对前途绝望，夫妇两人割腕自杀。

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跳井自杀。

旧时代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著名学者储安平投河自杀。

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老舍的死。老舍也是不堪侮辱自杀的，方式是投湖自杀，尸体在北京西北的太平湖漂了起来。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满族正红旗人。

职业，作家。

性格，敏感。

绰号，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曾和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打巷战，战死。老舍诞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灾难和战争，通常会促使两类人登上历史舞台，军人和文人。它让军人战死或成为英雄，同时刺激文人的灵感。

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军人在舞台上表演，文人在纸页上表演，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老舍就是文人之中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几个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通过几十年的辛苦劳作，老舍把他的人生和心血倾注在《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经典著作中。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把民俗文化、市民形象、人生步履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后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就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老舍的男人在世上存在过。从事业的角度上讲，老舍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

感情上讲，老舍也值得称道。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文人的另一面常常是感情混乱。老舍不同，老舍的夫人也是满族人。老舍给她写的“情书”中列出这么三条：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读起来一点也不像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反而像乡下人讨老婆。然而生活就那么回事，二杆子文人是看不透的。从这事上可以看出，老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一生忠于艺术，又拿艺术服务大众生活，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尽管老舍如此低调，尽管老舍离人民如此之近，依然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老舍的文艺作品便遭到批判。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老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所有他那个级别的人物的创造工作都有内在的规律，不可能符合政治规范。如果按照政治规范来，那么所有真正的创作者都将完蛋。这正是文革不受待见之处。

一九六五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未获准发表，老舍由此被迫停笔。

文革开始，江青记挂起了老舍，但老舍也没啥可抓的。江青的理由很简单：“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同时康生捎话给老舍，让老舍去红卫兵那里参加运动，感受一下政治斗争的气氛，老舍只有遵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老舍身穿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到文联，那里还有萧军等二十几个等待批判的作家。他们都曾名动一时，都有过自己的事业，现在等待年轻人的判决。红卫兵把他们押到文庙批斗。在文庙的时间里，老舍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着“反革命分子的呼声”，然后接受教育、遭受殴打。一直殴打到深夜，老舍已经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第二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并没有去参加批斗会。那是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没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又过了一天，二十五日凌晨，老舍的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比较靠谱的推测是，二十四日上午，老舍应该去太平湖了。整整一天，他应该在太平湖某个地方思考，然后投水自杀。

为什么？老舍以及老舍之前或之后的那些文化界精英，他们代表不同流派，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什么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回答之前，先把目光往前推，推到两千年之前，那个象征中国人风骨的楚国人，三闾大夫屈原。

当年屈原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屈原为啥投江呢，原因无外乎：一，因为谗言遭受驱逐，个人遭到羞辱；二，他所效忠的楚怀王遭难。归根结底，就是前途漫漫，才华无处施展。可以在屈辱中苟活，但屈原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二十四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在想什么呢，一定想到了屈原。

实事求是地讲，老舍虽然遭受打骂和羞辱，和当时其他人比起来，如干部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包括文化界的其他精英人士，承受的批判力度远不如党政干部，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自杀。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忍一忍，或许能过，但是他们均选择不忍。

为啥就不能忍一忍呢，是不是太玻璃心了？这个先要从事业的角度说一说。当官的，需要机敏、忍耐，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慢慢等待，要不然就没法在政坛上混，忍受过了崎岖坎坷就是光明大道，继续当官。搞创造的恰好是另外一个样子，需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而非埋头忍耐。可以像李白那般在旅途中思考，也可以像曹雪芹那般在穷困潦倒下思考，唯独不能在镣铐下思考。文革恰恰要把他们置于镣铐之下。

太平湖畔的老舍是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到侮辱，不仅仅是身处枷锁之下，更致命的一点，是那些批斗者的身份。那些红卫兵都是什么人？如果是国家机器内部的人也就罢了，也许还有忍耐的理由。年轻时代的老舍，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他选择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可谓不勇猛。怎么到老了，被一群年轻人批判了一天就去寻死？似乎不可理解。仔细想想，那群年轻人就是他寻死的理由。

老舍一辈子辛苦勤劳，号称人民艺术家，为人民工作。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现在，那么人民的孩子就是国家的将来。而批判他、殴打他、侮辱他的那些人恰恰就是红卫兵，也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就算了，就当被狗咬驴踢了，如果是一群，也可以忍一忍，就当遇到黑社会了。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国家出了问题。他只能理解为他为之创造的人民，以及年轻人抛弃了他。就创作者而言，这才是最大的绝望。正如两千年前被抛弃的屈原——被毕生服务的群体抛弃了。

所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和汨罗江畔的屈原的心思是相通的。老舍的悲剧犹如当年屈原的悲剧。老舍的悲剧，恰好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即割断了创作者从事创造的梦想。隔断了创作者不说，毕竟老舍的一生已经走完大半。参与文革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创作者，这恰好是文革之后这些年，文化界创造力荒漠的注解。这个结果，或许是老舍自杀时就想到的吧。

一九六八年，老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五个提名者之中，老舍的得票最高。按常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老舍的了。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瑞典驻华大使多方寻觅老舍无果，认为老舍已死，奖章改颁日本的川端康成。有趣的是，获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也自杀了，吞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也是绝望，就世界范围内，文学大师的自杀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海明威，比方说茨威格，均对社会绝望而自杀。

（六）失败的种子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

中央文革则是另一种情况，在一九六七年，满世界找事、闹事、夺权、掌权，急速上升时，灾难的种子便埋下。所谓灾难，不外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无非是折腾过程中树敌很多。当然咯，想要夺权，就难免树敌。权力是一根魔力棒，无论谁拿到，都不会轻易放弃。想要去夺，必然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但是树敌也有不同，数量和质量总有不同。敌人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身，也就是所谓的内因。

一个组织在上升阶段就埋下失败的伏笔，必然是内因。中央文革的失败伏笔，集中表现在陶铸身上。

陶铸，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死于一九六九年。

信仰，共产主义。

性格，讲原则。

从第一代领导人的身世来看，陶铸还是不错的。他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伟大的辛亥起义，之后还伙同别人一起开过煤矿，集知识分子、革命家、企业家于一身。陶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自然不差。十六岁便去了师范学校。相比之下，刘少奇十六岁时还是个小学生呢。

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陶铸结束了文化课程的学习，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群英荟萃的大黄埔中的一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很利于年轻人闹革命。然而一年之后风向变了。国共分裂，陶铸选择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武斗事业，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层身份算是元老级人物之一了。

作为元老级人物的陶铸，战争年代的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不是他无能，而是因为他运气很差。广州起义之后，陶铸没能跟着队伍去井冈山，留在了白区。留在白区就算了，还不幸被捕，坐了好几年牢狱，错过了军史上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黄金的时节。

但陶铸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脚印的，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干过一系列的实事。比方说在抗战时期，陶铸曾担任军委秘书长。比方说辽沈战役之后，陶铸成为沈阳市长。能在大战之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市长的人都不简单，比方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比方说聂荣臻成为北京市长，刘伯承成为南京市长。在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傅作义谈判。陶铸就是平津前线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和傅作义谈判，而且负责收编傅作义的军队。

四野南下时，陶铸已经成了政治部主任，四野中的第三号人物。解放之初，代理广西省委书记，负责剿灭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剿匪是件很辛苦的事，高光程度不及指挥战争，力气一点也不少出。特别是西南土匪，那是有历史渊源的，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唐朝剿不完宋朝剿，宋朝剿不完明朝剿，明朝剿不玩清朝剿，蒋介石去剿，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非常猖獗。历史记载，西南剿匪是一场和攘外的抗美援朝并行的安内战争，非常艰苦，非常重要。

从这些履历来，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没得说。随后陶铸的角色一直是封疆大吏。直到一九六五，文革将要兴起之际方才进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权力重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名，林彪之后是周恩来，周恩来之后就是陶铸，也就是说陶铸成了当时中共中共的第四号领导人。与此同时，陶铸的身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布局，中央文革将是新的权力机构。把陶铸放入中央文革，实际是把他放入权力核心。

陶铸的上位，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文化大革命将要打到一大堆实权派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在当时的情

况下，说他们修正主义也好、说他们叛徒也罢、说他们官僚主义也没所谓，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干了很多活——当干部本身就是干活的。

干部不干活，国将不国。

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官僚作风是有的，活也是有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红卫兵冲击一个个老人家，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中央文革那些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夺权，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但是那种成成感是建立在干活人被打趴下的基础上的。年轻冲动的红卫兵可以不管这些，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管这些。原因很简单，把一帮人打倒了，还得有人干活吧？

看看中央文革那些人，用笔写文章可以，用舌头鼓动宣传也可以，但是笔和舌头的功能是有限的，也就是给人家戴高帽子，也就是鼓动红卫兵。至于维持国家运转，靠的还是脚踏实地干活、认真真地干活、无怨无悔地干活。

毛泽东把文武双全兼具实干精神的陶铸放入中央文革，放到权力核心中，就是希望他能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之后，多干点活。除了干活之外，陶铸还有两个功能：一，陶铸比较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当时五十八岁，年富力强；二，他是老干部，对老干部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三，陶铸是四野出身，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也不会遭到林彪的人的反对，干起活来阻力会小一点。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棋。

就是实际工作和理论吹嘘是两回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中或许失误不少，但能力摆在那里，换个人也不见得能干得更好。任何一个想干实事的人都要按规则办事。

陶铸进入中央之后，和江青、陈伯达的关系就不怎么样。特别是关于刘邓的问题上，陶铸是另外一个调子。江青想让陶铸带头去批判邓小平，陶铸说刚到中央不了解实情。非但拒绝批判，而且连“炮弹”都不提供。不提供炮弹也就罢了，当别人去批斗时，陶铸还去泼冷水。比方说组织部组织人马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陶铸则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同志，不能喊打倒。

对待造反派上，陶铸跟之前的刘邓也是一个调子。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待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赌博性的选择之后，陈丕显打电话去北京，陈伯达推卸责任，陶铸明确告诉陈丕显：“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从事实的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一群工人搞革命闹事也就罢了，往北京去闹也就罢了，卧轨拦火车，造成交通堵塞，即使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这么干吧？陶铸这态度是负责，为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负责，却没有为另一层身份——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

所以江青给了陶铸一个评价：“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这个评价很准确，但不够精确。精确地讲，陶铸是干实事的。

陶铸的这个态度，是江青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毛泽东需要的。刘邓那么干，毛泽东不能容忍，是因为他们树大根深，拉着整个行政系统去修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修正主义，是不能容忍的。陶铸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又可以安抚老干部，一举两得。但是江青无法理解这一层，以为陶铸唱对台戏，要打掉。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是个出色的女人，比传统思想下那些只懂得持家生孩子的女人出色很多。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虽然远有武则天近有慈禧为榜样，她还不够格。从各种回忆录就能看出，比方说红卫兵造反派的蒯大富，比方说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比方说同为女人的聂元梓，他们对同为四人帮的张春桥的评价就比江青高。在这些回忆里，江青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情绪化，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惹事。最要命的是，她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代表，反对她就是反对毛泽东。现在陶铸反对她，她要打掉陶铸。打掉陶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点点头，陶铸也就要休息了。

然而毛泽东选择保陶铸。

然而江青实在无法容忍陶铸。陶铸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她低头哈腰装孙子，而且常常和他吵架，让她下不了台。某次开会，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很蛮很自信：“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之后江青又傲慢地问陶铸：“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些话让江青非常受伤。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她说话。当年彭真顶撞过她，已经成为反革命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一个陶铸，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玩政治的而言，愤怒不怕，怕就怕怒火损伤了理智。愤怒之下，江青竟然命令陶铸去支持左派。当时的江青只是文革副组长，陶铸是整个国家第四号人物。她有什么资格命令陶铸，骄傲？蛮横？这些都不是理由。忍无可忍之下，陶铸选择不再忍。陶铸站起来，直视江青，厉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事已至此，从政治角度上讲，江青败给了陶铸。但是江青还有一层身份，女人。江青选择用女人的方式对付陶铸——大哭大闹。哭闹着啰嗦，陶铸欺负她啊镇压她什么的。说撒娇也可以，说撒泼也可以。然而她不明白：她之所以有机会在政

治舞台上“撒”，只因为身后那个巨大的身影还在；等到那个身影消失了，她连“撒”的机会都没有了。

陶铸和江青的尖锐对立，使得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认为必须除掉陶铸。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编制谎言、断章取义、收购材料等一系列方式，终于把陶铸打成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成了刘邓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倒下了，规格更高：百万人批斗大会！节目还是老一套，拳打脚踢什么的。陶铸脑袋上常常长出大号疙瘩。中央文革的人很开心，架起摄像工具，拍下现场留念。然而此时陶铸已经撑不住了，生病了，没人理会，拖了几个月之后，直到非常严重时，医生才开点止疼片。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陶铸的腹部长出一个大大的疙瘩，才得以进医院，犯了囊癌，需要动手术。医院也是很有特色，四周窗子钉死，投不进一丝阳光。手术之后癌细胞扩散，疼痛难忍，鉴于没有更好的医疗措施，只能忍着。其中滋味，非局外人能描述。六九年，由于战争压力，老干部要疏散。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享受特级护理：在小黑屋里，医务人员不得和病人说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四十三天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号，陶铸死去，年仅六十一岁。

打倒陶铸和打倒刘邓不一样。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是毛泽东的布局，是自上而下的。打倒陶铸这事上，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等到把陶铸那些“罪名”抛出之后，陶铸立刻就被洪流给冲垮了，连毛泽东也保不住他。正如刘少奇在最后时刻对王光美说的，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主席也没法控制。这话是对的。刘少奇本人就是精于运动的政治家，对政治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只能引导，无法控制。

倒掉陶铸，加上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相当于宣布，把整个老干部全部打倒。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所以说不可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老干部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领袖在，老干部会退让，问题是在另外一面，放在后面说。

由于运动过于猛烈，造成的长期伤害（中断生产和抹杀文化创造）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体系内外大批精英死去还是过于震撼，毛泽东也考虑要给运动降降温。文化大革命，说白了也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旗号还是所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人给整死了，偌大一个国家，谁来干活？然而中央文革那帮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干的就是扯着嗓子、挥动笔杆，煽动红卫兵一起往前冲。他们认为，冲得越猛，打倒的人越多，战果越大。

一系列的打砸抢运动，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让毛泽东认为运动搞得过头了，他决定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下运动方向，也就是给运动降降温。为了给运动降温，毛泽东采取了两手准备：对中央文革新晋升的首长们，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一下；对造反派，毛泽东的办法是，以支左的名义让军人消一消年轻人的火气。这两个手段是一个信号，既毛泽东要对文革初期的

狂热运动调整一下。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和发生在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它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八、二月逆流

（一）大闹怀仁堂

文革初期有两条线，一条是在社会上内闹，一条在军内闹，前面说的那么多都是社会上闹的。其实同一时期，军内闹得也很凶，名曰揪斗军内一小撮。社会上闹文革，得利者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军内闹文革，就很乱。彭德怀、黄克诚就不必说了；贺龙成了大土匪；还要批判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红卫兵天天喊来喊去，喊个没完，惹得几位老帅烦得不行。

如果仅仅批判他们几个人也就算了，都是高层，一边凉快一会也不要紧。下面那些非四野系的将领也遭到批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不明不白地死去就是例证。最有趣的是许世友。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将领，也被逼得东躲西藏。

上海夺权的风波很快波及到南京。一夜之间，南京掀起打倒许世友的浪潮，满大街都是大字报，曰，打倒许大马棒。又有人曰，许世友在延安要杀毛主席，打过毛主席，现在又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头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造反派抄许世友的家，满世界去抓许世友，当然是抓不着的。因为许世友已经带人躲到大别山里了，那是许世友造反闹革命起家的地方。许世友什么人啊，毛泽东最信任的将军。这还不算，许世友并不是善茬，绝不是那种乐于被欺负的主。许将军放话，别来大别山惹老子，不然开枪。

毛泽东南巡到上海，明确表态保许世友，并让张春桥乘飞机去南京找许世友去上海，意思是让许世友支持文革。此时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怕张春桥害他。但是不见又不行，就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吃饭之际，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当然许世友多虑了，张春桥还没胆杀许世友。他很快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

虽有毛泽东的表态，造反派依然不打算放过许世友，一直把许世友追到北京。许世友躲进京西宾馆，和他一起躲在那里的还有韩先楚上将、皮定均中将等二十个人。当时北京造反派正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甚为风光。南京来的几百号人也不甘寂寞，决心要把许世友抓回去批斗。他们围住京西宾馆，警卫不让进，他们就不走。

许世友知道，落到那帮小崽子手中，不死也得脱层皮，他决定反抗。他把子弹上膛，大喊曰：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将军，身上只有两把手枪。许世友一支，韩先楚一支。大家表示听许世友的指挥。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发扬野战的本领，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静待造反派。

这是粗的一面，还有细的一面。许世友打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出事，立刻派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徐向前是许世友的老领导，他的话许世友得听。傅崇碧当时管北京警卫，可以处理安全问题。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事情才算了结。

这并不是一个许世友的问题。许世友作为坐镇一方的大员，竟然被造反派追赶上千里，表示军队也开始乱了。别的地方可以乱，不要紧。但军队是国家支柱，一旦混乱，后果堪忧。与此同时，军内还在大搞特搞。

一月十九号，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为啥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呢，就是要和他们协调一下文革应该怎么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中央文革的人则不同意：“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搞军队，怎么夺权呢？他们决定搞突然袭击，攻击萧华。江青打头阵：“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陈伯达跟进曰：“萧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帮腔：“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还指着萧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敢去吗？当然不敢去。

萧华，江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

军衔：上将。

萧华是标准的第一代将领，出生贫寒。一九二九年，年仅十三岁的萧华加入了毛泽东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十四岁入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随后参与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参加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一九三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创建了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萧华最为解气之处并非打日本人，而是消灭了汉奸石友三。

石友三，江湖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仗，石友三头靠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蒋介石打仗，石友三头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石友三又投靠李宗仁。又经过一系列的折腾，石友三再次成为冯玉祥的手下，随后中原大战，石友三再次投靠蒋介石。随后日本人来了，石友三投靠日本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打仗，又投靠共产党。蒋介石秘密反共，石友三再次投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中国军人弱，皆因石友三这样的人在。如此军人，不如妓女。不仅没有节操，而且罪大恶极。在河南期间，纵火毁坏河南登封少林寺，千年古刹，毁于一旦。

萧华消灭了石友三的主力部队，实在是大快人心。损失惨重的石友三想再次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连结义兄弟兼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把石友三骗到濮阳，活埋在黄河岸边。高树勋这事手法之残忍、态度之绝情让人难以认同，但用在石友三身上正合适。天理昭昭，报应永存。做人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解放战争，萧华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特种部队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辽沈战役之后出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文革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和总参一样，是军委下面三个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萧华的地位和总参谋长一样高。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因为不合作被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依然是不合作，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呵。

军委散会之后叶剑英立即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萧华。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毛泽东为啥这个态度呢？因为萧华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跟着毛泽东走。

周恩来电告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又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萧华不能批。但是问题和陶铸一样，中央文革的人煽动造反派去搞萧华。当天夜里，造反派去萧华家抓人、抄家。萧华比较机灵，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到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号，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见萧华迟迟未到，江青挑衅曰：“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恐怕来不了啦！”既得意又失望。得意的是，军委没有保住萧华；失望的是造反派没有抓住萧华。军委的元帅们则非常愤怒。

大家也不说话。一会之后，萧华到了会场。徐向前见萧华来了，问他昨晚跑哪去了？萧华如实回答。徐向前气愤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么？”徐向前说话时愤怒地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掉了。徐向前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他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觉得萧华应该敢于直面造反派，有军委罩着嘛，怕啥。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对萧华说：“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是谁呀？”

这时叶剑英忍不住了曰：“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藏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火气上涌，愤怒地猛拍桌子，茶杯和碟子都被震落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

元帅的盛怒镇住了江青、陈伯达等人，不再纠缠萧华了。其实徐帅、叶帅都是老人，已经很久没动火气了，江青和陈伯达能让他们来火也不容易了，这事在历史上叫“大闹京西宾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萧华还要继续挨批，杨勇莫名其妙地完蛋了。老师们认为这么下去不行，打电话找管事的林彪，林彪不见。一月二十四号，徐向前直接去了毛家湾，见到林彪曰：“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能夺权。”林彪连连点头答应：“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下来又请聂荣臻和叶剑英商量了一番，大家都赞成。七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八号下午，林彪和徐向前把文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加上一条：高干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一共八条。前七条保证了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加上的第八条也是非同寻常，所谓管好高干子女，即剥夺了老红卫兵的造反资格，也就是否决了老红卫兵的功能。红卫兵四大派系之一、造反派先锋、骨干型人物就此推出历史舞台。

军委八条下达的过程中，林彪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不愿意见老师，是因为他们不想趟浑水，最后没办法了必须表态。从林彪的角度讲，他希望文革，乱一乱可以的，可以烧掉更多对手，扫除障碍，特别是其它有威望的元帅，比方说贺龙就掉了。但他不希望军队下面乱，因为军队是他管的。军队乱了，他也没好处，最后还交不了差。他的人，比方说李作鹏、吴法宪都被批斗过，没办法，控制不了。萧华也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林彪未必想批他。

破坏过猛，军队出乱子，毛泽东决定敲打一下中央文革那帮理论家。

军委八条下达一周之后，二月六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吹风曰：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

四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说完陈伯达说江青：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从审定军委八条到敲打陈伯达和江青，短短十来天，毛泽东连续出手，极为不常见。毛泽东本意是恨铁不成钢，是安慰一下老同志，却给老干部们造成一种幻觉。老干部就想了，领袖是不是对中央文革不满？是不是放风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往好的一面想，好像是。那年代，毛泽东说谁有事不商量时，基本上意味着那人完蛋了。大家想必还记得，毛泽东打倒邓小平之前，说你邓小平有事从不找我商量，然后邓小平就成了党内第二大走资派。

老干部决定反击，理由如下：如果继续文革，很多人将继续遭殃，还有很多人将开始遭殃，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如果领袖决定结束文革，那正好大家用力，把中央文革那帮讨厌的家伙给一锅端了。豁出去了，干！

大闹怀仁堂就此拉开序幕。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光绪年间建仪銮殿，用时三年。建成后慈禧老佛爷入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老佛爷亲自在此训政。仪銮殿取代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大火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

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五四年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处理高岗；一年之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怀仁堂加冕而载入历史；五八年反教条，刘伯承在怀仁堂挨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故事。

时间到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再次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此次事件之重大，超过建国之后任何一次政治较量。

在这次较量之前，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后，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前，周恩来召开政治碰头会，中央文革跑过来参加；这次较量之后，周恩来必须去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碰头会。

战斗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按照正统的说法分了两派：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

正义一方：谭震林和陈毅冲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协助。

非正义一方：张春桥和江青打主力，陈伯达、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旁协助。

（二）愤怒的谭老板

谭震林，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八三年。

性格：坚强。

个性：爱放炮。

绰号：谭大炮，谭老板。早期领导人中，绰号千奇百怪。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得美髯公称号；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将士称其为胡子军长；罗瑞卿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曰罗长子；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人们喊他“李瞎子”。

外号喊起来亲昵，大家喊谭震林为老板，其实谭震林一点也不像老板。谭老板身高一米六，面黑，特别是没有老板的大肚皮，怎么看都像干活的。但是大家偏偏喊他老板，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都这么喊。至于大家为啥这么喊，大概因为谭震林是店员出身吧，后来在新四军中冒充过一次老板。

谭老板虽然不像老板，但脾气很大，和彭德怀有几分相似。陈毅对谭震林的脾气有过经典的评价：“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老板批评人时，

叫你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建国后，谭老板当了官，官至副总理。

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是——沉默是金，如果不得不说，那就和稀泥，不行就当墙头草。谭老板倒好，得了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曾经有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一天，谭老板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说，“这简直是国民党！”顺便说一下，那时候共产党称国民党为匪。谭老板就这么一路放炮，一直放到怀仁堂。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生的终极考验。

八年前的彭大将军孤身一人在庐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应该做的事，现在谭老板在怀仁堂就干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员应该干的事。

文革一开始，谭老板就对很多事看不惯，鉴于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很多事也就忍了。等到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须再忍了。

二月十六号，六十五岁的谭老板进了怀仁堂。他是参加政治局碰头会的，周恩来主持会议，谭老板原本要和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大饥荒时代，谭老板管农业，最后出了天大问题。虽然是集体灾难，但无论如何谭震林难逃责难。他的左倾蛮干，也是推动因素。对此谭老板非常内疚，决心好好工作，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然而他没想到，以谭老板的身份进入中南海之后，却变身为谭大炮，放出一辈子最大的一颗炸弹。

因为在这次碰头会上，谭老板恰好碰上了张春桥。

本来谭老板和张春桥是老熟人。当年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属于后生。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这位后生。那时谭老板还没有感受到张春桥这位后生的可畏之处。

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其书生气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被毛泽东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在谭老板那里，张春桥还是后生，并不怎么可畏。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时，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这是明知故问，因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已经在之前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了，现在正在群众哪里交代“罪行”呢。老干部对此极

为不满。谭震林的言外之意，就是小张啊，你要好好说说。

张春桥看了一下谭老板，还是当年那样子。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张春桥了，就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言外之意：不要摆谱了，老家伙。

一听“群众”，谭老板就来火。文革初，很多惨案都是借“群众”之名搞的。现在又把“群众”抬出来，真是气死老夫了。张春桥啊张春桥，老子解放群众时你还不知道在那儿呢！一想到这里，忍不住开炮了：“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话当然是说给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听的。

文革小组虽然是理论高手，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些老干部都是绵羊，只要亮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就会任其宰割，这个谭老板怎么就变成饿狼了呢？非常意外，想不通，一时愣住了。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老板继续开火，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又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沉痛地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话揭穿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同时引起了老干部们的共鸣。说这些话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肢体动作，比如拍桌子啥的，非常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都不致命。张春桥等人虽然红得发紫，终究还是小字辈。在讲究资历的年代，谭震林就是指鼻子骂他一顿也没有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谭老板把炮筒对准了江青，说：“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这倒是实话。谭震林一九二六年入党，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干了，可以说是最老牌的井冈山之一。随后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干活。长征之后，谭震林和陈毅一样留在南方打游击。随后一直在新四军干，是新四军的元老之一。最为辉煌的时刻，跻身淮海战役五大前委之一。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大炮大声回应。到此还没事，但是他忽视了中央文革中有康生这样阴险的暗器高手。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阴险的说。

但谭老板已经愤怒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什么“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谭老板已经气昏了估计，说这些授人以柄的话。这样“自杀式”的言论，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恰好落入中央文革的陷阱，整理成记录交给毛泽东，会有谭老板好果子吃？

当然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冷静下来的谭老板看到自己的一方力量有限，几个老师没有军权，几个副总理没有实权，就算把周恩来拉进来依然没有胜算。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有力量有权力，如果他愿意，胜算应该大一点。那个人就是林彪，谭老板给林彪写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的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2月17日

谭震林这又是一招臭棋。他以为林彪也是老革命，会对中央文革不顺眼。林彪确实是老革命，确实看中央文革不顺眼。在那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林彪如果敢按照谭震林那样子折腾，估计下场比谭震林还要难看。

林彪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还做了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

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这个批示的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谭震林拉我，但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想有关系。

谭老板也足够硬气，两天之后，在毛泽东面前重复了他的三不该：不该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把毛泽东气得愤然离场。

毛泽东自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说严重后果之前，看看谭老板亲密战友，陈毅元帅的表现。

（三）陈毅的表现

谭老板发泄完心中的愤怒，正要转身离开，以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屑。一个声音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那人便是陈毅。

大家或许有些纳闷，这个大闹怀仁堂，为啥陈毅和谭震林搞冲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何没有冲到最前方？当然他们也拍了桌子，也大声呵斥了几句，但是比起谭老板那些自杀式的言论，比起陈毅那种不要命的演说，只能是和风细雨。

回答这些之前，要先理清一些关系。

谭老板参加革命很早，二七年武斗刚开始那会就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工作了，属于毛泽东的老部下。但是谭老板那时的级别不高，无法跟毛泽东一起搞。反围剿失败之后，谭老板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成为新四军的铁杆，后来成为第三野战军一员。反围剿失败之后，陈毅也留在了南方打游击。皖南事变之后，陈毅一直是新四军和三野的形象代言个人。

也就是说，陈毅元帅一直是谭震林的直系老领导。而周恩来是陈毅的老领导，南昌起义就是，建国之后还是。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就乘坐同一辆战车。

中央文革那帮人崛起之后，想要上位就必须搬掉一批人。当年最大的障碍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已经被打倒了。还有一个障碍，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前，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就落到周恩来身上。只要拿下周恩来，政治局就会落到中央文革手上。然而要打倒周恩来并不容易。周恩来的势力不见得比刘少奇小，和刘少奇不一样，周恩来没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但是这不妨碍那个戏子（江青）以及她的理论家们的雄心。

打倒刘少奇之前，首先清扫刘少奇的外围，就是扫掉彭真、安子文、薄一波、以及罗瑞卿等人。按照这个经验，打倒周恩来，也要先清扫外围，就是清扫陈毅、谭震林这些人。

陈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周恩来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于公于私都要奋起抗争。在中共高层中，包括倒和没倒的加在一起，唯有周恩来和陈毅在历史上曾

经让毛泽东下台（以后会分析这些事情），这场运动无论怎么看，周恩来和陈毅都不能幸免。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争一争。

徐向前和叶剑英还在军方，当时不掌实权，军方有了八条命令之后已经没那么迫切，所以才有陈毅和谭震林冲锋在前头。

谭老板已经当了一回大炮，火力覆盖了整个中央文革，而且波及到毛泽东。那么陈毅呢？也开了一通大炮，而且火力同样不差：“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这一通火力犯了天大的忌讳。

战场之外，如果说有某位同志给毛泽东的震撼最大，既不是老对手蒋介石，也不是党内对手刘少奇等人，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之所以能极大地震动毛泽东，并非他有多大功劳，也不是他的能力，而是其政客之阴险。阴险地在斯大林面前谄媚，阴险地利用朱可夫登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随后又阴险地解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然而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做到了极限，通过他的秘密报告，把已死的斯大林攻击得体无完肤。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变成了一只魔鬼，希特勒第二，相当于鞭尸。客观说，斯大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独裁者，但是作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赫鲁晓夫显然缺少政治家的智慧和气度——他期望通过鞭笞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到最后，捏日博列夫用同样的办法赶走赫鲁晓夫之后，没人同情他。终其一生，赫鲁晓夫不过是个政客，眼高手低，而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同样担心自己死后的事，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所以每一次运动都在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彭德怀啊、贺龙啊、刘少奇啊、林彪啊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但是毛泽东自己可以讲，陈毅不可以讲。但现在陈毅豁出去了，偏偏就讲了。不但讲了，还讲得很多，一直唠叨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整过很多人，周恩来、陈毅都是被整的对象。通过延安整风上去的那一批人，刘少奇、邓小平、高岗、安子文这些人已经被毛泽东亲手除掉了，原因各种各样。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伤疤。

当年毛泽东亲手给了刘少奇、高岗等人机会，结果倒好。高岗不听话搞串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是明目张胆地跟毛泽东对着干。

说了这些之后，陈大元帅还嫌不过瘾。因为延安时代的整人专家，康生同志今天仍然坐在这里，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继续整人。所以陈毅很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康生：“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

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然咯，这些话说得很重，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架不住了，但对康生同志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康生同志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整人事业中，那是久经考验，啥场面没见过？

这还没玩，当晚九点左右，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团，再次拉开大炮，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慷慨陈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

陈毅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说：“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毅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陈毅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陈毅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这么一番话，连现在很多网络喷子都说不出来。当时陈毅以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的身份说出来了，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象。

说这么多，激情发泄了，愤恨说出来了。后来人把谭老板和陈大元帅的这些话当成正义之声加以转载。正义归正义，很多时候正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陈毅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算捅了马蜂窝。没有解决任何实际性的问题，相反连中央政治局都断送了。

为啥呢？中央文革这种人，书呆子也好，政客也好，理论家思想家也罢，说到底只有一张嘴。他们的那些嘴加在一起既不能掀起文革，也不能结束文革。不管是江帮主还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高谈阔论、浑水摸鱼，借机打倒一批人而自己上位或者演戏而已。让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去搞

文革那是抬举他们，离开了毛泽东他们啥都不是。

没有毛泽东，江青只能从事自己的老本行——演戏事业，什么共产主义战士，瞎扯。

没有毛泽东，康生估计能在文化市场上投机倒把一番，就像现在某些良心泯灭的所谓的“大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尽。

没有毛泽东，张春桥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姚文元要乖乖地当文人墨客。

既然根子在毛泽东那里，此时的谭老板和陈大元帅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在这里乱放炮。等待他们的只有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谭震林的讲话和写给林彪的信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度，陈毅再来这么一篇演讲，再加上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从旁协助，快构成一个小集团了。中央文革的人一看就乐了，他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如此团结；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等人也没有如此团结，但依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彼时的高岗和彭德怀还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苗头。现在好了，谭震林和陈毅竟然不知死活朝领袖叫嚷，太好了，太好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诞生了，你们死定了。正愁没办法整你们呢，这下倒好，你们自己送上门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管你老师还是副总理，只要是反党集团，就得完蛋。

接下来文革小组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添油加醋向毛泽东汇报，再想办法把那群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开批斗会，开飞机，殴打，批斗，打翻在地，让他们跟彭德怀、贺龙做伴。最后大获全胜，唯我独尊，哈哈。他们很得意——当然他们有得意的理由。特别是江青同志，本来就是主修表演的，现在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当然要好好表演一番。

当然咯，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陈毅同志。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陈毅再一次站到对立面，一定要敲打敲打。

（四）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二年，和朱德、邓小平一样，是四川人。

性格：豪迈，刚毅。

兴趣：领兵打仗，舞文弄墨。

个性：善于放炮。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位。

陈家原为地主，在清朝前期有很多土地，等到近代，便和清帝国一起衰落。但陈毅接受很好的教育，早早识字，念私塾，新校，后来又去留学。和所有元帅一样，陈毅的血液里流淌着不安的因子，不甘于现状，不甘于被压迫，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辛亥革命开始之际，年仅十岁的陈毅就剪掉辫子，以示和传统决裂。

评价陈毅的一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借用官方的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像郭沫若那样，说元帅本质上是诗人；或者说些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等形容词等等，这些都是大实话，陈毅都当之无愧。

本文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坎坷。

陈毅本是风流豪迈之人，却生活在乱世之中，曾经加入“文学研究会”，和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路，差点成为文豪。加上陈毅的面相还可以，肯定是感情丰富——的确陈毅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感人。法国留学被遣返之后，在重庆靠文字讨生活。不想无意间就成为那个报刊的主笔，有美女读到陈毅的诗文，无限向往。

陈毅的第一位知音叫胡桂兰，号称乱世佳人，和陈毅同龄，国民党女少将，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的后代。军阀杨森垂涎胡桂兰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拒绝。大文豪茅盾听了此事后，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女主角的原型就是胡桂兰。胡桂兰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两人成为密友，亲密到啥程度，只有传说。后来胡桂兰嫁给了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国民党军队中做革命工作。南昌起义前夕，陈毅辞别胡桂兰，一别十年。二九年，胡桂兰被蒋介石点名驱逐，后留学欧洲，加入德共，和德国共产党领袖谈过恋爱，随后坐过监狱，出国后写了本书叫《在德国女牢中》，名扬天下。此后又去苏联，深得高尔基的喜爱，赞曰，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抬棺，胡桂兰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但是胡桂兰和王明不和，在苏联受到监视，遂回国，任何香凝的秘书。

国共再次合作，胡桂兰又和陈毅相见。两人倾述衷肠，约定终身，并得到陈毅父母的同意。眼看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项英亲自找胡桂兰谈话，说他们倘若结婚，胡桂兰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两人只好痛哭分别，并相约：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再婚，胡桂兰还在默默地从事地下事业，从此再没和陈毅相见。

一九三零年，胡桂兰出国之后，二十九岁的陈毅结婚了，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叫萧菊英。第二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回来途中遇到土匪袭击，马死了，他步行绕路回去。然而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陈毅闻讯悲痛异常，写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后陈毅冒险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

萧菊英去世后第二年，三十一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女红军赖月明结婚。当时陈毅指挥六个师和所有的地方武装，居然没钱摆酒席，还是赖月明借了二十块钱应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长征后，陈毅重伤，依然让赖月明疏散回乡打游击。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从此生离死别。抗战之后，陈毅去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再一次写诗抒悲痛：“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老爹抓回卖给一个鞋匠，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一九七二年，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死讯——而陈毅一直不知道赖月明还活着。

一九四零年，和胡桂兰的三年之约到期之后，三十九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张茜结婚，感情才算风平浪静。十大元帅之中，陈毅最有文采，感情最为坎坷。

不仅是感情，事业上同样坎坷。当然，那一代人都很坎坷，然而在这一群坎坷者之中，陈毅是坎坷派中的代表。其他人的坎坷仅仅来自于敌人，陈毅的坎坷除了敌人还有老领导毛泽东。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毅就干两件事：一件是念书；另一件和那一代人一样，对社会现实不满。五四之后，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因为是马克思的粉丝，留法期间被遣返回国。

二七年投入武斗之前，陈毅当过编辑，和学生一起搞过运动，和工人一起搞过运动，当然成绩和刘少奇、项英等人是没法比的。此时陈毅的本质是个文人，不安分的文人，左派分子。

文人永远都是不安分的。不安分也有两种，一是风骚；二是有理想。究竟是风骚还是有理想那是需要考验的。当然如今这年头难得有考验的机会，但陈毅那年头绝对不缺机会。蒋介石的屠刀就是最好的考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风骚的文人就安分了，有理想的文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投笔从戎。

陈毅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正式起义，却迎上来败退的队伍。然而陈毅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朱德重整部队，随即跟着朱德一起去了井冈山，成了正统派之一。

陈毅在井冈山上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曰，说不清的关系。按照宣传，毛泽东和陈毅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兼诗友，非常特殊，非常美好迷人。但是在美好迷人的外衣下面，也有结。分析两人之间的关系，绕开那些心结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面对侃侃而谈的陈毅时，一定会想起一九二九年的陈毅。一九二九年的陈毅同样侃侃而谈，结果让毛泽东栽了一个难堪的跟头。

毛泽东在苏区被人家“夺了几次权”，第一次，就是一九二九年那次，就是被陈毅给轰下台的，

是最为窝囊的一次。窝囊在哪里呢，后来也有被轰下台的经历，比如在宁都会议上，但那是被中央架空，说得过去。陈毅是谁啊，跟着朱德一起上井冈山的，是下属。

被下属轰下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丢面子的事，何况还是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

朱毛会师于二八年，会师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当年毛代表对陈主任的印象很不错。因为这个陈主任和自己差不多，是个文人。虽说文人多半相轻吧，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会物以类聚的。当年井冈山能遇到文人相当不容易，毛泽东的寂寞可想而知，眼前这个陈主任非但能诗善文，字写得也不错，而且说话风趣幽默，知音啊！

两人相见，可谓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非但志趣相投，陈主任也很够意思，处处支持毛代表。

当年朱毛会师之后，可不像现在宣传的那样家和万事兴，矛盾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了关于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为了指挥的方便，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但是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要干，什么柴米油盐的，一大堆。这时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工作，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刘安恭同志认为：前委只管好行军打仗就行了，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还是让军委管吧。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朱德表示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刘安恭等于给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行动上加了一层约束。

所以朱毛就有了矛盾。

既然两位领导有了矛盾，下属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应该支持谁。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同志，另一个就是知音陈主任。林彪和陈毅都是跟着朱军长上井冈山的，现在他们选择支持毛代表。在毛泽东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让给刘安恭时，只有林彪和陈毅表示坚决反对。而在朱德和刘安恭倡议成立临时军委时，也只有林彪和陈毅明确表示反对，连秋收起义时就追随毛泽东的罗荣桓都没有如此明了的表态。

有了矛盾就应该解决。于是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表决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于是大家决定再一次开会，看看事情该如何解决。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号，福建龙岩城，苏区开会，大会主持人：陈毅。

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自己，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代表也会和林彪一样，

坚决地支持他。

会议之前毛代表特意找到知音陈主任，请他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毛泽东没想到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与最初设想的相反：陈主任严厉地指责了毛代表。

看看陈主任说了啥。陈主任说毛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说的都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陈主任说朱军长：“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此外陈毅还把刘安恭给骂了，简直是一棍子横扫一大片，把所有的人都骂了干净。其实不是陈毅喜欢骂人，他就是这风格，以为把问题说出来就可以解决——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

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陈毅又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

大会还总结了毛代表的几条问题：什么英雄主义啦、固执己见、过分自信啦、什么虚荣性重啦、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啦、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啦等等，从工作到生活一应俱全。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异常恼火，不停地吸烟，一言不发。当然他是有理由的嘛，诗歌、文章、知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毛泽东的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词——背叛。

最后大家投票选举前委书记。结果晋国（毛泽东）和楚国（朱德）都落选了，而小小的郑国（陈毅）当选了。这就是慷慨陈词的力量啊。

据当事人回忆，投票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只是差陈毅的一票就能当选，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四军，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这是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败在下属的手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被知音兼下属的陈毅

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权。此事后来经过毛泽东的口中说出很多次，可见刺激之大。最后由陈毅亲自登门道歉，才将毛泽东请回来。

延安整风时期，陈毅这么辩解：“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红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前面说过，延安整风时，陈毅没少郁闷，竟然被后生饶漱石给折腾得很惨。

这事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最大的历史包袱。每一次整风，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旧事重提，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的御用理论家们提起这事，陈毅还是要检讨。不停地检讨，检讨个没完。陈毅能在不停的检讨中成为共和国元帅，能够在文革中批而不倒，非常不容易。

当然二九年之后，陈毅再没反对过毛泽东。此后的峥嵘岁月中，两大体上合作愉快。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大体上符合官方宣传的轨道——下级、战友、诗友。陈毅无条件地服从毛泽东领导，在残酷的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把新四军搞得有声有色。

打仗之余，两人时不时搞点诗歌来往。

文革前夜，陈毅还写诗《西行》请毛泽东修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以诗歌形式描述了出国感受，写得相当不错。当然不仅是诗歌探讨这般简单，主要是保持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

然而三十八年之后，到了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陈毅再次反对。不仅反对，还把延安整风的陈芝麻、烂西瓜给抖出来。延安整风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是毛泽东奠定领袖地位的时候啊！陈毅一番炮轰，毛泽东当然忍不住回忆往事。

（五）毛泽东的反击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第二次革命。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

东是寸步不让的，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本来想批评一下中央文革的过火举动，聚拢一下人心，没想到遭来这么大的反对声。

为了阻挡这股逆流，毛泽东必须坚决反击。如果不击溃这些人，文革势必难以展开。如果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想同时反击这些人相当困难。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足够的筹码。

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二月十八号，毛主席开了一个会，两派人都请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会，而谭震林没有请（注：谭震林的信十七号写给刘彪，林彪十九号才给毛泽东）。

这个会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也不是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毛泽东请人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亮出了全部的筹码——这些筹码是夹杂着雷霆怒火抛出去的。

毛泽东愤怒了：“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一步，首先亮出态度。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指出打击对象，这是第二步。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第三步呢，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言外之意，并非我强人所难、无理取闹，是你们这帮人言而无信在先，说过的话不算数，逼我如此这般的。告诉你们，政治玩笑是不能开的。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第四步，再一次亮出态度，分析其中的厉害。前面是悬崖，你们再往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军队在林彪手上，你们有实力吗？苦海无边，还是回头是岸吧，老同志们。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

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再一次点名要打击对象：做错了事就要惩罚。特别是陈毅同志，历史上反对我也就罢了，现在又反对起我的历史来了，这还了得？一定要惩罚。下一步当然是惩罚的方式。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在毛泽东这样愤怒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两点信息：这些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预见到他们翻案复辟的严重后果：改组、抓捕革命者（后来四人帮的命运）。

在毛泽东的号令下，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时候，周恩来的态度就很重要。因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核心，如果此时周恩来振臂一呼，那么这些人将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右派”，最后就算失败，结果必然天崩地裂。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做，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周恩来再一次顾全大局，选择服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番五次地发表讲话，讲“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获得胜利。

批判会上，流程还是老一套：认错，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检查，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云。

三月十八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从此江青可以得意洋洋地对周恩来说：“以后你要来我们这边参加碰头会。”周恩来也很配合：“以后给你们做决定。”

这一次轮到中央文革乐了。特别是善于表演的江帮主，当然少不了表演一番。其他人等自然也跟着庆祝胜利。然而他们庆祝得还是太早了。正如大闹怀仁堂之前，“老右派们”以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一般，“左派”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想要打倒“老右派”。毕竟风雨同舟几十年，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大家的态度良好，也没有彻底打倒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毛泽东面前虽然俯首贴耳，但是在其它地方都是巨人，就算不掌权，在军方或政界也有巨大影响。如果全部打倒，军队将全部落到林彪一个人手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久经考验，干活能力超强。将来文革搞定之后重新搞建设，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

毛泽东雷霆之怒第三天，发生在青海的血案提醒毛泽东，靠江青那帮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需要“老右派”稳定局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觉得批得差不多了，就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翻译成通俗用语就是，你们不要闹了，大家都不容易，加把劲把革命工作搞好吧。

“九大”时，除谭震林外，其他六位老同志都当选中央委员，表现良好的叶剑英、李先念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名存实亡，成了空架子。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批判你，给你留点希望，转换成军事术语就是——围师必阙（给敌人留下一个逃命的缺口，溃散了再打）；批判少数，拉拢多数，军事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对高岗如此，对彭德怀如此，如今还是如此。很多人会说军事和政治相通，政治上能做到毛泽东这般游刃有余者，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真正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通过这番折腾，毛泽东成功地摆脱了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取而代之，此后便可以放手干他的人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局势的进展和毛泽东的期望相反。

对二月逆流的处理的本质是毛泽东变相解除几个老干部最后的一点决策权。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功臣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人喝酒作乐。酒至半酣，宋太祖遣散左右对部下掏心窝子：“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众人惊慌，痛哭曰：“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借机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人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功臣宿将们称病辞职。宋太祖说好。

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喝酒，但他一打一拉，起到了和宋太祖一样的效果，可谓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方式不同，目的相同，达到目的的方式同样很艺术。从此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列车全速前进，直到坠入深渊。

评：二月逆流，中央文革的威势到了顶峰，也是下坡的开始。

九、武斗

（一）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支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月逆流，军队支左则引出了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七二零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签发支左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所谓军队支左，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支援有两层含义：增加力量和降低造反派的狂热性。文革初期的主力军，是由狂热的笔杆子挑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不论如何美化，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笔杆子文字犀利，注定缺少实干的本领。热血青年能冲敢干但过于幼稚。军人的风格是坚定且高效。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看似一步好棋，最后却落入劫难中。

红卫兵的成分原本就很复杂。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在运动的过程中，老红卫兵赖以存在的优势——长辈——均受到冲击，《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一直没有成为气候。整个红卫兵只

剩下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干事比较果敢、行动比较坚决的人，敢于把理想当面包，为了把理想变成面包，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就是五大领袖。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能吃到嘴的面包，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大家的旗帜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行为方式都很像，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下面要批斗一个人，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要批；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要保。即使军队涉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面对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口号，而背后却有不同目的，两派看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帮助谁？谁是左派？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则是左派遭殃，原因有几点。

第一，关系问题。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来到社会中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多半都是军人出身，革命时代缺人手，都扛过枪上过战场，是战友。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还可能是搭档。比方说阎红彦自杀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就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原则问题。造反派造反时，那是无所顾忌，到处横冲直撞，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都被他们烦得不行。军人最讲究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以牙还牙。你敢扇老子巴掌，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即使军人比较听话，既往不咎。军委八条之后，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的地盘，那军人就无须再忍了。

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造反派的数量。真正铁了心、不计成本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其实很少。能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二十八天的，也就韩爱晶一个；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也就一个王大宾；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也就蒯大富最有种，后面的都是等而下之。造反派打掉一个就少一个，并无后续兵源——因为学校停止招生了。

因为这几条，军人支左之后不但没有减少纷乱，反而添乱。军队支左之前，纷乱多半是打砸抢闹得太过火。军队支左之后，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造反派力量减弱。因为保守派不会去挑衅军人，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只有真正的造反派才会和军人对着干。这样就闹出了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老战友时，青海就闹出了恶劣的二二三事件。军人向“八一八”造反派开火，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饥荒之后，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因为左倾蛮干下岗了，王昭是后来调去的，

任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的。文革中彭真、罗瑞卿都被打倒了，造反派认为王昭是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要打倒。

这事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但军人支左之后，青海省军区内部对是否打倒王昭的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应该打倒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永夫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刘贤权 vs 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西宁的八一八造反派也开始夺《青海日报》的权。刘贤权表态支持，造反派更神气了。但是在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加上和刘贤权不和，决定动手。他利用支左文件含糊不清的空间，仿效“八一八”造反派，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号称指挥部。指挥部宣称，省军区之前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是无效的，并且把刘贤权给软禁在家。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的武装力量，同时以顾问的身份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八一八”造反派不买赵永夫的账，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曰“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等。

赵永夫的人马以彼之道对之曰：“八一八”队伍不纯洁。“八一八”队伍是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造反可以，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是自己整风，把八一八战斗队几个成员定位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把“八一八”交出来的几个人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藉以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他们认为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小罗瑞卿”，一定要揪出来，矛头指向赵永夫。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只有造反派控制的《青海日报》还在出版，继续攻击赵永夫。赵永夫很生气，决定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号，就是大闹怀仁堂之前，军管小组到报社，遭到造反派的抵制。“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本只有二百人，增援到两千人守卫报社。一个小小的报社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十一月份的西宁已经相当冷了。但是大家相当有革命精神，很多人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赵永夫也没有蛮干，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军队许可人员

出入，不许运送物资进去。赵永夫是想让造反派知难而退。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不可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坚持很久。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就是中国人的坚韧。想当年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爬出来的，应该理解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造反派寸步不让，许多家属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由于煤炭送不过去，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强悍程度堪比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市民。

这件事闹出来之后，肯定是纸包不住火的，青海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领导给赵永夫指示，让部队撤。赵永夫当然知道撤退意味着什么。撤退之后，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批斗会，甚至还可能反党反革命，可能是生不如死。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兰州军区的命令后，更加坚定了保卫报社的决心。又经过一系列的折腾，赵永夫决定走绝路，即武力占领报社。二月二十三号之前，青海军区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均无回应。因为当时正在大闹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林彪不表态，周恩来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又不服，所以悲剧发生了。

三月二十三号，西宁军区实施全城戒严，通告要求取缔“八一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赵永夫动员部队：“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枪声响起，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的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人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四个军人系误伤。怎么说呢，首先这是一场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屠杀。文革中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平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干过很多不可容忍的事，搞了很多破坏，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应该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就是想自保。在刘贤权支持造反派，而他本人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如果退让，那就意味着落入造反派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所以他才软禁上司刘贤权，硬顶

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找中央政策漏洞。不管什么理由，赵永夫必须负责，必须付出代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哪怕人民正在闹事。可以关，可以处理，可以追究责任，但不可以屠杀，这是底线。赵永夫越过了底线，希望险中求胜。

然而诡异的是，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二月二十三号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给叶剑英，按照他自己的调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精神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云云。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了叶剑英的支持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的撑腰，赵永夫非常高兴，决定再接再厉，在青海继续评定叛乱：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造成监狱严重超载。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没多少人。赵永夫这么搞，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好事。

三月八号，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叫到北京，让他们谈谈“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当然赵永夫成了英雄，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他的冒险计划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北京的天色变了。虽然有叶剑英的支持，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志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刚刚同意军队支左，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然而赵永夫在青海一番蛮干抓人，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的火弄熄了，好啊，赵永夫，你太过分了。毛泽东动气，后果很严重。三月十一号，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三二三事件，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三月二十号，林彪表态曰：“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赵永夫的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曾经担心的劫难还是降临了，一点都没少。借着赵永夫的问题，顺便烧一烧叶剑英元帅。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已经请假检讨了，还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在工作。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好了，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请假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赵永夫之所以倒霉，主要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二月逆流的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想要借这事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澄清一下，有这个原因，但只是细节末梢。当时毛泽东要挪动徐向前和叶剑英那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把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不是三月二十三日那场屠杀，而是之后在整个青海抓人。当赵永夫把青海的造反派全部投入监狱的时候，意味着他在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他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啥？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事情也许真的就过了。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赵永夫在那场屠杀之后，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造反派会不停地造他的反，直到他彻底完蛋。他想要冒险取胜，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继续镇压造反派，就要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侥幸没有得逞，却落下屠夫的恶名。

——世间事，因果相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在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而死去。他们共同的死亡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局。

处理赵永夫，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于把文革之火再一次烧到军队，再一次在军队中打开一个缺口。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了下来。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类，杀了一个赵永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尽管如此，四个月之后，那个缺口最终在武汉导致更为严重的七二零事件。

（二）军委十条

之前的《军委八条》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军队过度冲击。毕竟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没了军队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牢牢控制了军队。要不然怎么能轮到红卫兵无法无天？

然而之前《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条的原则是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之前的规定是，军人面对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军人的处境确实不好，像许世友那样的毛泽东的铁杆嫡系都被造反派从南京追到北京，别人更不用说了。现在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咒给松一松，说现在被打可以还手了。不仅可以还手，军队还可以拉进来支左。军人强大的理论和无比的执行力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毛泽东看到《军委八条》和军人支左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因为双方理论完全不对等。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军队还是军队。军队反击一次，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四月六号，中央军委签发了一个《十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为啥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很简单嘛，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每个省出现一个赵永夫，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伤害将不可避免。

故事是这样的，文革冲击军队导致了《军委八条》，导致了青海事件，导致了军委十条，导致了武汉七二零事件。

（三）武汉七二零事件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华中地区的核心，在整个中国地图上，也处于中央南北冲要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经济活跃，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活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智力大爆发之际，楚国人围绕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创造了绮丽多姿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神秘而绚丽的变动。在楚文化千年以来的熏陶下，那一带的人血液里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经济上的优势，文化里面不安定因素，加上地处冲要地带，造成武汉历来是个多事之地。整个历史上都是多事地带，近代更是如此。

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革命，奔走呼喊，募捐很多钱、起义很多次之后，清政府终于垮台了。然而最后导致清政府垮台的那一下，和孙中山没有关系。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新军哗变，清政府完蛋，史称辛亥革命。

武汉，那是有斗争传统的。

随后军阀群起，天下大乱，武汉成了北洋军阀和革命家争夺的最前线。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政府离开南方，从鸡裤裆（广州）迁到鸡心（武汉）。武汉工人也是有闹事传统的，靠工运起家的刘少奇，就曾在武汉大显身手。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武汉一带也是大打特打，没完没了。

有了如此“光辉”的传统，如此特别的经济文化地理优势，文革之中，武汉当然不会消停下来。不仅不消停，而且闹出很大动静，大到影响了文革的走势。

中共将帅之中，湖北将星闪耀，林彪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当然林彪是唯一的，在林彪的下属中，王树声和徐海东大将也是大名鼎鼎的。这里要说的就是一个湖北将军的故事。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八年入党。

和第一代将领一样，陈再道出身贫寒，别人念书时他给别人放牛。放牛途中常常跑到私塾外面的窗子下面偷听一阵子，然后斗大的字认识了一箩筐。最底层的人，总是备受磨难，陈再道选择抗

争。一九二七年，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侥幸不死升为班长，又侥幸不死荣升排长，后来一直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侥幸下去，破刀换大刀，大刀换破枪，破枪换好枪，最后成为高级将领。陈再道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争，解放后搞定大别山的土匪。

性格：强悍，机智。

陈再道是大别山资格最老的老战士之一，在他升为营长的时候，带领全营向敌人冲锋，左臂被子弹打中，鲜血直流。他让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挖出来。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干了一件比兰博还兰博的事：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反身再次冲上了战场。身经百战而不死，足够强悍。

当时生活艰苦，全军经费只有几百银元。那时候保护军费是个大问题。林彪就曾在这事上栽过跟头。军长吴把保护银元的任务交给陈再道。一旦行军打仗，陈再道就要背着一袋银元屁颠屁颠跑。某日吃了败仗，被敌人追赶。别人腿脚麻利都溜了。陈再道感受到银元的压力，眼看就要连人带钱落入敌手。陈再道发挥了放牛娃的机灵，跑到一个水塘边故意摔一跤，顺便把银元丢到水塘里。然后爬起来脚底抹油，一溜烟不见了。晚上又和战友一起回来打捞银元。银元又解决了同志们的生活问题，机灵啊。

陈再道就是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强悍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一九五五年赢得一个至高荣誉：解放军上将。他有一个绰号，叫陈大麻子。也可以多少体现一点他的性格。据说风靡一时的《亮剑》男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是陈再道。

从资历上看，陈再道出身红四方面军，随后跟着刘伯承统帅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方山头之中，不管是之前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上将，不是嫡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注定要接受考验。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躲过了第一波冲击。并不是陈再道多么神通广大，而是第一波冲击主要发生在京沪地带。华中地区其实也冲击到了，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华中地区的头头，王任重，就被冲击了。第一波冲击中，海军和空军冲击较大。陆军过于庞大了，不可能辐射到下面每一个地方。

心惊胆颤的陈再道终于等来《军委八条》，刚刚松了一口气，结果在青海就发生了屠杀事件。中央处理了赵永夫，陈再道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因为西宁的情况，武汉也有。武汉虽然没有屠杀事件，造反派依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各派势力和火爆程度比青海可能更厉害。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军委又弄一个《军委十条》出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啊。

《军委十条》都是堵漏洞的。可是不行啊，军队已经陷进去了，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陈再道

同志在心中慢慢祈祷：马克思保佑，千万不要在武汉出事啊。

可以说怕鬼就有鬼。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武斗，斗得很凶。武汉本是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惹得很多人不爽。毛泽东军队支左，作为武汉军区的负责人，陈再道执行指示，搞出来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叫百万雄师。两边都扛着拥护毛泽东的大旗，行为对立，称自己为左派，视对方为右派。

武汉本就是火炉子，两派对立起来，相当于在火炉子上面放一个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一旦引爆，威力绝对胜过青海惨剧。

两派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鉴于之前青海发生的惨剧，毛泽东决定解决问题。原本是要让陈再道去北京的，后来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解决一下武汉的矛盾，顺便再游长江，有机会的话写点诗，放松放松。青海惨剧中，最主要的部分表明，必须对军队加以约束。不然的话，军队会很快摆平周围的造反派（如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投入监狱），让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是，把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争取他们，但在操作上要讲究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只要略施手段即可。

七月十三号，周恩来让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也不知道去武汉干啥，估计是和文革有关，就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拉上了。一行人身穿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上路了。十四号早晨，周恩来到了武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东湖宾馆给换一批服务员。因为东湖宾馆是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的人警卫的。既然按照决策，把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毛泽东要住东湖宾馆，让百万雄师的人搞警卫工作显然不合适。周恩来把警卫工作交给空军去搞。毛泽东在十四号晚到武汉，入住东湖宾馆。这时谢富治才知道他的紧急任务是参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让谢富治来，并非因为他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在军队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因为谢富治也是出身红四方面军，也是成长在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曾经在那一带纵横驰骋。武汉军区的人主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后来第二野战军的人员。谢富治曾经指挥过驻守武汉的军队，比较熟。而且之前谢富治是干政委的，善于搞人际关系。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决策，虽然说得比较婉转，意思还是明确的，即定位军人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现场的陈再道一听就来火了，当场顶撞周恩来曰：“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周恩来在井冈山留有浓密的胡子，大家称他为周大胡子。建国之后就很少有人称他为周大胡子了。陈再道是个急性子，着急之下就喊出来了，那一声周大胡子，蕴含着不满和愤怒。

陈再道为啥不满呢，周恩来传达的决定，意味着军人继续退让。造反派本来就已经很猖狂了，到处瞎折腾。还让军人退让，往哪退？难不成退回文革初期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沓兑里？要

知道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不是基督徒。现在军人已经参与了，如果退回去，那么岂不是要面临无休止的冲击、甚至侮辱？不是陈再道不尊重周恩来，实在是这个决策让人难以接受。然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

又过两天，十七号，王力找到陈再道，陈再道屈服了。不是王力比周恩来牛叉，而是王力背后那个人。王力告诉陈再道，指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解决问题。陈再道一听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表示立刻接受中央的意见，并表示军区将做深刻检讨。像陈再道这种关键时刻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人，在军队一大把，像许世友，像陈锡联，像韩先楚。这也是毛泽东面临一波波挑战，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原因之所在。十八号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把方针宣布一下，大家表示同意，随后军区做了检讨。

剧本到这里还是一帆风顺的：伟大领袖再一次展示魅力和意志，把所有不同派系都搞定了。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了。接下来如果没啥事，毛泽东估计要去长江游泳了。然而事情到此发生了逆转，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周恩来特意交代过王力和谢富治，局势复杂，不要抛头露面，以免惹了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两位大爷可没有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以为政策执行了，一切就完事了。

两人闲着无聊到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被认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比较狂热，中央的人到地方上通常会享有两种待遇：要么被骂挨批，如同过街老鼠；要么人人追捧，如同超级明星。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长，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首长，都是红级一时的人物，自然受到热捧。

一种罕见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共同拉着条幅，欢迎中央的人到来，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使者。那场景简直要把王力和谢富治当成钦差大人出巡。王力也有了钦差的感觉，忘记危急关头保存自身的必杀技：和稀泥才是王道。

于是王力和谢富治去了一个造反派的据点，水运学院，发表了一通把他自己推向茅坑的谈话。在介绍王力的谈话之前，先看看王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王力，一九二一年生于江苏淮安。早早入党，早早干革命。别人扛枪干革命，王力是属于笔杆子战线的。战争年代还有时间写小说，据说还不错，现在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后来江湖人称大笔杆子。在中苏论战那会，王大笔杆子是出了不少力的。

在中央文革内部，王力虽然出门号称首长，实际角色还是书生、笔杆子、理论家。他熟悉的世界就是以毛泽东或江青的意图写文章，然后给大家讨论，然后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然后大家学习，享受那种幕后参与的快感。至于决策，或者台前执行，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以为顶着中央的名头就可以在下面大杀四方。所谓书生误事，就这意思。

王力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对三钢造反派代表表态：“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在王力看来，自己不过是把中央决策给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把是中央决策，大家只有接受。在王力的意识中，连元帅们都不敢对中央决策对着干，下面这群丘八又能如何？他不明白：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政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虽然传达中央决策但不是中央决策者，一言九鼎还轮不到他王力；中央决策是要传达但传达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方式可以成事，有的方式只能坏事，哪种能成事，哪种会坏事他是不知道的。

此时此刻的王钦差已经忘记了周恩来的交代。在他看来，他的表态没有超过中央决策的范围，说出来也无妨。但是作为理论家、书生、兼笔杆子的王力同志不明白，政治本身没啥秘密，关键在于它是一种谋略运作。同一个决策，让军方领导，层层下达，慢慢消化，就能执行。在军区还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作为中央大员直接支持一派、贬低一派，后果是很严重的。

后果是啥呢？后果就是：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

这下彻底惹恼了百万雄师：好哇你这个王大胖子，这不是打我们的脸么？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要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如此说也就罢了，你王力哪根葱？打过仗吗？被批斗过吗？知道我们实际情况么？竟然企图骑在老子的脖子上拉屎！在你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拉屎之前，我们要把你踩在脚下！

百万雄师发力了，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大小几百个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右派广播才停下，左派广播台又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晚上王力和谢富治乘车进入军区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团级以上军官都到了，大家要开会。直到此时王力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来听自己的教诲的，带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之后，重提给左派翻案，还说军队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狼穴。

司令陈再道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划脚，乱放臭屁。”钟汉华小声回应：“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这时有位牛师长高举起手要求发言。王钦差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然后再次强调道歉之类的玩意，就像中学生打架一样，一点不懂得变通。当然王钦差如此强悍，不是因为他本人强悍，而是他代表强悍的毛主席、林副主席。

牛师长也是有备而来，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可以想象，王钦差很生气，但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能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站住，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同为将军出身的谢富治理解军人，上前和稀泥。人家根本就不领情，还大叫：“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一般情况下，地方军官敢在中央大员面前如此叫嚣，就表示要豁出去了。谢富治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脸色变了。王力仍然浑然不觉。

等到王力气派十足地回到招待所时，发现住所已经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着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他们都是“百万雄师”的人！

直到此时王钦差才明白咋回事。此时钦差大人才显露并不强悍的本质。气派没有了，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想跑，已经太晚了。

谢富治还想和稀泥（硬顶只能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谢富治手握小红宝书，笑咪咪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谢富治军衔是上将，公安部长，和陈再道一个级别。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差点把他推倒。

要知道谢富治可是解放军上将，跟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同一个级别。当年陈谢兵团纵横四海时，那也是响当当的名号。如今即使转业到公安系统，也是公安部长，江青都得给三分面子。下级军官敢如此对他，表示已经豁出去了。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的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钦差瘫坐在椅上！他的警卫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对钦差大人说：“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面对众人的怒吼，王力胆战心惊，赶紧抓住救命稻草——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又威严地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陈再道许下安全保证之后。在牛师长的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小汽车。

第二天，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钦差大人的辩论大会。这场辩论大会很有趣：王钦差被七手八脚地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和造反派骨干，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艺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

钦差大人当然没有啥好说的。他虽然搞理论有一手，代表中央时也是滔滔不绝，似乎能言善辩。但是他面对的是军人，才终于晓得老祖宗留下的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接下来的辩论就很俗套了，就像中央文革的手段一样，王力同志享受了一番在北京多次强加于别人的待遇。一群“造反派”上阳台，给钦差大人一顿强劲的拳脚；阳台下的人群则在一旁愤怒地配音：“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等等。

王钦差鼻子流血了，眼睛青肿了，头发被揪掉了；他能做的也就是杀猪般叫：“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王力同志，此刻你感受到那些曾经被你批判的人的痛苦了吗？如果把中央文革那帮人都这么批斗几场，或许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干得很解气，却害苦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中央大员在他的地盘被批斗、被暴打，与暴乱何异？在留守北京的那些人眼中，这就是兵变。当然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武汉。一旦真的兵变，那将是西安事变的重演。演员由蒋介石和张学良，换成毛泽东和陈再道。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汉扣押蒋介石，南京乱作一团。一九六七年，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深陷武汉，局势不明，北京同样乱作一团。

中南海紫光阁。

风云人物们正在紧急开会，连向来怕见光、见风、怕声音的林彪都参加了。

会上，那位眼高于顶的江女士放下了一贯的骄傲，眼含泪花，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怎么办？江女士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知道怎么办，就不会最后落到自杀的结局。就像所有的妇人一样，失去主心骨（毛泽东）时扮演一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从这点上看，她还不如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好歹懂得坚持和谈，好歹敢于去西安犯险。

江青手忙脚乱，那么她的助手呢？张春桥跟着毛泽东，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是呀，我早就预感到七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啰啰嗦嗦讲半天，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怪林彪说，陈伯达是一书生。何止陈伯达是书生，那帮人都是书生，事到临头除了啰嗦还是啰嗦。

至于天才的林副主席，反应一点都不天才，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提议比何应钦当年提出处理西安事的方案高明一点点。当年何应钦是决定蛮干，直接轰炸西安。现在林彪的方案是武力压迫，政治攻心。但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担心如果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人身安全。

最后还是失去主心骨的叶群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当然咯，如果发生意外，最好连周恩来一起陷进去，那样大局就在林副主席的控制下了。叶群这一招，牛！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到武汉，先见毛泽东，两人作了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的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调节，一路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部队官兵们的阻挡。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八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在天边，终于长出一口气。

自从五八年之后，毛泽东就不再坐飞机了，这一次破例坐飞机离开，可见形势之紧迫。

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着手处理七二零事件。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分析、忽悠、利益转化之后，陈再道同志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北京，享受一系列的批评教育，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再次上岗，九三年离世。

陈再道将军虽然没有行张学良之实，还不如张学良。张学良被软禁，好歹有吃有喝有女人陪着。在中央文革的宣传中，陈再道同志从来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调戏良家妇女无数……总之是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因为这些特点，陈再道同志得以享受和彭德怀在一起接受批斗的高等待遇！

当然，这事中最搞笑的就是王力了。深陷粗暴大兵蹂躏之中的王秀才体验一番中下层军民文革斗争的滋味，原本心灰意冷，回到北京之后再次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在机场，王力同志见到了革命战友兼靠山江青女士。她穿着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

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此刻的江青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演她自己，演得不错，只是离一流政治家的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是王钦差，京城当王英雄。王力同志抚摸自己青肿的脸，发现挨了那些拳脚还是值得的，毕竟自己成了“大英雄”！一时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啊。得意之下，不停挥动小红书给江青同志壮势。当然他有得意的理由——人生高潮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王力光荣受伤的大幅照片。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京城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王力、谢富治“胜利归来”。在京城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怕声音的林副主席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

王大英雄拖着伤腿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这是故意安排，和武汉军区大院那个小阳台形成鲜明对照。真是受宠若惊啊！这一刻，王秀才达到了人生光辉的顶点。天安门的欢呼让王秀才忘了武汉阳台下面战士的咆哮。

（四）火烧外交部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圆则亏。人生也是一样，顶点之后就是下坡。四个月之前，赵永夫在青海屠杀了两百人之后，跑到北京去当了三天的英雄。三天之后沦为阶下囚。王力比赵永夫走运一点，多当了几天的英雄。

英雄如同一杯兴奋剂，喝下之后增加当英雄的冲动。赵永夫如是，王力亦如是。

成为英雄的王力，只能在英雄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冲，直到撞到南墙。

秀才遇到兵当然是有理说不清，但是秀才成了英雄，那就更无厘头了。王力同志成了英雄之后，脑袋逐渐发烫，烫到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国内已经容纳不了他了，要折腾到国际去——要去管外交。外交是周恩来的地盘，把外交拿下来，就可以送周恩来和陈毅喝西北风了。在中央文革集体智慧的指挥下，王力趁自己人气正高，充分利用自己的煽动力，鼓动红卫兵去外交部夺权。外交部经常被冲击。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摇摇欲坠了，再加把劲，揣一脚或许就倒了。所以造反派很高兴，后果很严重：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外交事件。

所谓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内政，跟外人没有关系。

给英国办事处来把火，相当于外事，外事无小事。

王力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他为啥要这么干？或者说，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也绝不会鼓动大家去英国办事处放火。火是意外么？可以理解为意外。因为造反派搞起来，啥意外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意外会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有人故意搞破坏；另一种还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搞破坏的人要趁乱搞点事，那是易如反掌。他们是谁呢，可以理解为敌对势力，比方说敌国特工。如果不是敌对势力，那就是自己人搞的。那么谁会搞这么大的事，动机何在呢？回答这问题需要一点波折。

北京的中央文革则陷入狂欢之中，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眼中看到的全是胜利。特别是江青同志，她认为自己的演出很成功，成绩很大。因为她看到的，是上海夺权成功，是全国夺权成功，是成功取代中央政治局。高层所有的反对力量，要么已经被打倒，如刘、邓、陶；要么正在被打倒，如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至于地方上的反对力量，赵永夫和陈再道已经在北京开喷气式飞机了，不是么？所以在中央文革看来，形势一片大好，非常的好——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

最好的结果是啥呢？那就是反对者最好全部趴下。虽然很多人都倒了，还有一个人挺立着。只要那个人还挺立着，就谈不上最后的胜利。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好像没有威胁，他全心全意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央文革的行动相当配合，从不和江青甚至中央文革的人争风头。在中央文革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去抓革命，周恩来只是默默地搞生产，不动声色。尽管他小心翼翼，周旋于“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在那个狭小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个庞然大物。

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看周恩来也就是一个干活的，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没有加班工资。辛辛苦苦不算，还要对各路人马笑脸相迎。中央文革那帮人呢，到处煽风点火，咋咋呼呼，吸引眼球，聚敛人气，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情况。所谓政治舞台，所谓各种表演，说到底都是在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归根结底也就两个字，干活。

假如身在社会底层，可能白费力气，累死累活，功劳都是别人的。然而在政治舞台的最中央，干活多，意味着权力大。周恩来恰好就在政治舞台的正中央。各级政府，各个部委，所有关于生产运作的事，都由周恩来说了算，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都在他手里。

中央文革那帮人到处煽风点火，闹夺权、闹革命，说到底也就是想上位。他们煽动红卫兵去打去闹去夺去抢，以革命的名义夺权。打倒各个组织的人，从各个地方夺权。

然而夺到权力之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夺权之后，如果稳定下来搞生产建设，那么权力将汇入国家机器，从各级政府开始，一步步向上，最后又汇到周恩来手中。如果继续折腾，那么相当于

自己折腾自己，啥时候是个头？看不到尽头。不论怎么搞革命，终究有个尽头。如果革命尽头之后，权力还在周恩来手中，那么相当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白干了。

如果不想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夺权）被人摘去，只有一个办法：除去周恩来。

要想除去周恩来很难。因为周恩来的角色是合作者。和刘少奇、邓小平要修正毛泽东路线不同，周恩来从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对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笑脸相迎。中央文革四处煽动造反派冲击政府部门，基本上把国务院管辖下的各个部委，上上下下都冲击得七零八落。换成一般人当总理，早就干不下去了。想一下嘛，今天外交部长跑来找你诉苦，明天煤炭部长过来找你理论，后天农业部长说我没法干了，如果你是总理能架得住么？把那个位置上换上江青，估计每天要哭好几遍（详情参照被陶铸说几句就大哭大闹）。

中央文革曾经以为这样就能把周恩来整垮，可是他们太低估周恩来了。在王明时代周恩来就在中央干活了，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那时候张春桥还希望国民党带来光明，那时候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还穿开裆裤。周恩来历经党内所有领导人的更换，历尽所有的艰难残酷的日子，走的路比中央文革那帮人过的桥还多，韬略和涵养远非那群理论家能比。在中央文革看起来搞不定的事，周恩来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中央文革不是要冲击各级政府部门么，让你去冲击。周恩来还配合中央文革，去搞劝说工作，让大家跟着毛泽东走，听党组织的话等等。如此一番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些被冲击的人，倒了，就躲在周恩来的周围，周恩来尽量去保护；没倒的，依然在周恩来周围，因为周恩来在抓生产，搞建设啊。

就是这样，任凭中央文革风吹浪打，周恩来在风浪上闲庭信步，左推右挡，前摇后晃，就是不倒。后人因此说周恩来是政坛不倒翁，说他精明滑头，就说好了。说这些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的前提：周恩来参与过各个时代的中央，党内各个时期的人才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第一代将帅中，所有人都跟周恩来的关系不赖；各级政府之中的官吏，被打倒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保护伞，想干活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干活的机会；另外，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容易吗？敢问如此不倒翁，有几个人能胜任？不信可以试一试，有几个人能让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主意？

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给推倒。周恩来不倒，实权就落不到他们手中。他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没有权力相当于白干。为了不白干，就要去推周恩来。如何去推周恩来呢，党内干革命、冲击政府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要不制造点外交事件试试？你周恩来能摆平党内所有人，不见得能搞定全世界吧，看你如何向英国人解释！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江青和康生找到红得发紫的王大英雄，让他出面搞一搞外交部。他们认为，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组织上千人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揪斗陈毅。八月七号，王力会见造反派的代表们，发表了一通鼓

动演说。

王力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的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

王力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这些话是对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说的。这些人平时在外交部底层，负责端茶倒水拍马屁等工作。趁文革的东风，决定夺权翻身当老大，享受别人端茶来，享受别人来拍马屁。现在王力告诉他们，你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手段是合理的，干吧。

对本来信心不是很足的造反派而言，王力同志本身就是榜样。革命时期没有战功，凭借文革青云直上，成为中央首长。到武汉捅出一个大篓子，回到北京却成了英雄，人气指数还在直线上升中，还有啥好犹豫呢，干吧。

一直闹腾到八月二十二号，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冲击外交部，事情闹大之后，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给周恩来出难题；二，冲垮摇摇欲坠、正在家里写检讨的陈毅。陈毅、周恩来的屏障，就好像彭真是刘少奇的屏障。彭真垮掉之后，就可以利用彭真的事直接冲击刘少奇。陈毅垮掉之后，可以利用陈毅的事冲击周恩来。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

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文革开始之后，陈毅就受到冲击，是周恩来和陈毅机智，利用毛泽东说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给挡了。二月份，陈毅那番高谈论阔彻底激怒了毛泽东，陈毅被迫检讨。中央文革决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机会选择得是不错，结果闹大了。

之所以说办事处失火案，如果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敌人搞破坏的话，一定是中央文革中的某个人下的手。放火不见得是王力交代的，但王力鼓励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是事实。如果闹出严重后果，一定得有人负责。王力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中央文革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但是他们忘了，这样的难题是难不倒周恩来的。因为在敏感时期，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向来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而非自己拿主意。周恩来对眼前的局势，中央文革的良苦用心可谓一清二楚。换成一般人估计要去领导毛泽东那里反映，中央文革的人处处跟我作对，这活没法干了云云。周恩来的反击非常艺术：找到杨成武将军，让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材料两条：王力的讲话，和冲击外交部的事实，以及当时因为陈再道再次引发的批斗“军队一小撮”；

二，周恩来的个人观点：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去了上海，把材料交给毛泽东。

（五）另一条线

看看周恩来的两个观点，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不然。

一个中央的领导不动摇，就没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中央文革也就折腾不出来啥花样来。唯一能让中央动摇的前提就是军队动摇。只有军队动摇，政府才会动摇，所以才重复说军队的威望不能动摇。谁都知道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的威信有动摇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在动摇。

文革开始，军方受到冲击，批判军内一小撮，和地方上没有两样，很多中高层军官叫苦连天，连毛泽东最铁的铁杆粉丝许世友都被冲进大别山了。后来为了稳住军队，搞出《军委八条》，算是在军区大院前面竖一堵墙。接下来又搞军队支左。支左在青海除了乱子，又出台《军委十条》，把军区大院门前的那堵墙打一个窟窿，结果惹出武汉的事。

陈再道到北京之后，毫无悬念地享受到批判。林彪发话，全国大军区就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不听话，然后掀起一阵批判热潮，名曰，批判带刀的刘邓路线。周恩来是想把情况稳定下来，然而搞笑的是，批判陈再道的理由是“顶撞总理”。没办法，兵变材料没有找到，只找到陈再道在武汉顶撞周恩来的证据。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中，受益者有两帮。一帮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几个人从没有公务员编制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另一帮以林彪为首。林彪本人就不说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大金刚军衔都不高，竟然都在短时间内成了三军大红人。吴法宪成了空军总司令。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打倒一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基础上的。打倒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四野之外（比如军委的贺龙元帅，比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比如地方上的陈再道上将），要么是四野出身却不怎么听话的（如罗瑞卿大将）。打倒这些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军内动乱。

周恩来提出解放军威信不能动，实际上也是要一个政府领导不能动，都是一个意思。两条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也就意味着给中央文革降火。

这一列过程中，中央文革的关锋比较活跃。

关锋，山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三年，十四岁的关锋成为党员，可以算天生的革命者。四年之后，十八岁的关锋成为县委书记。和王力一样，关锋是靠笔战斗的，属于革命书生、笔杆子、理论家。如果说他有啥不同，那就是和老乡康生认识得比较早，并且得到康生的赏识。那个时代，

关锋那种人最好的位置是中央研究室。

中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下面的智囊机构，和大人物们关系亲密，是笔杆子们镀金的好地方。毛泽东的几个有名的秘书均在那里干过。大名鼎鼎的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并由此走向人生的巅峰或低谷。在康生的推荐下，关锋也进入那么一个前途光明、暗礁密布、随时可能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的机构里。当年反右派斗争，作为红色笔杆子，关锋就非常活跃，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大作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比方说文革宣言《五一六通知》，关锋就是起草人之一。正因如此，关锋才有机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

在关锋的大作中，战斗力最强的便是那个——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战斗口号。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上海风暴刚刚刮起来，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夺权。林彪为了表示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合作，让关锋在军内喉舌刊物《解放军报》上亮出那个响亮的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由于那个口号过于响亮，关锋作为发明者，也将永载史册。那个口号杀伤力极大，把光荣的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办到了蒋介石和美国大兵都没能完成的任务。关锋不仅仅发明了那个口号，还将其推广。

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和林彪以为领袖这一次肯定要大发雷霆，加大批判力度了，就以陈再道为突破口，批判带刀枪的刘邓路线。为了配合老大的行动，红色笔杆子、书生、理论家的关锋自然要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很简单嘛，再写一篇大作，再次吹出——批斗军内一小撮——嘹亮的号角。文章在八月一号发表的，是建军节，离八一南昌起义刚好四十周年。在那样一个重大日子弄出那么一篇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各路造反派人马闻风而动，南下北上，到处串联，冲击军事机构，抢夺弹药，去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区大院再次鸡飞狗跳，比方说南京的许世友，又被赶入大别山了。

然而这一次，江青和林彪都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图。离开武汉之后的毛泽东直接去了上海，没有回北京。江青和林彪在北京折腾老半天，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身影，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去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结果南辕北辙，弄反了。其实也不能怪江青和林彪，他们在北京城里，对武汉发生的一切不是很清楚。江青不用说了，让她在旁边也不会明白七二零事件到底意味着啥。至于林彪，每天只是听半个小时的“报告精选”，也不会明白究竟是咋回事，或者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让杨成武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关锋的新出炉的大作也带上了。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你也累了，休息休息吧，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六）毛泽东再次选择

七月二十一号，事变开始的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两人在谈话期间，基本上各种情况都做了预测，最坏的情况就是兵变。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毛泽东才速速离开，留下周恩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直接从武汉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如果说真的搞兵变，自己没有理由这样出来啊？陈再道等人实在不行扣押个总理也不错嘛。这种事不但没有发生，陈再道还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北京，听候中央发落。而在接下来的证据取证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再道搞兵变。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悬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事？

自从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核心之后，在任何时候，他的意志都会得到执行。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想要哪个完蛋哪个就得完蛋。即使文化大革命，在老干部一片反对声的情况下，依然展开了。可是这次武汉两帮人闹事，多大的事嘛，按惯例一行批示就搞定了，没想到亲自坐镇，加上周恩来布局，弄出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故来。

——这是毛泽东的意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障碍，第一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狼狈而归。之前大跃进也撞得头破血流，但那是败给了自然规律。这次不一样。

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从他们联手开始，所有敢于挡路的人通通靠边站了。

如果真的是陈再道搞兵变，那倒是好事，直接镇压也就完了。一个小小的陈再道带着武汉军区能玩出多大花样？让他出不了武汉三镇。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群众闹事，明知道王力代表中央的情况下还要抓过去痛殴，如果不是积怨太深，断不至于如此粗暴。

很明显，从西宁到武汉，以及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的事都表明一个事实：军队支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起了反作用。故事陷入了极端：放任军队不管，会扑灭文革的火种；对军队管太多，又会造成军队本身的混乱。七二零事件，就是军队本身出了乱子。

北京的喧嚣没能影响远在上海的毛泽东。他陷入了沉思，思考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接下来该如何落子。思考有两点核心思想：一，文革要继续；二，军队不能乱。

北京的事，军内再次揪人，外交部夺权，毛泽东都知道了。看见杨成武之后，他还是想了一个晚上。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关锋搞的社论旁边留下醒目的批语曰：“大，大毒草！”又曰：“还我长城！”

要知道之前吴晗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也才得到——大毒草——的待遇而已，还少一个“大”字。至于“还我长城”就更为悲壮了，好像之前只有悲愤不已的岳武穆手书过的“还我河山”可与

之相比。有了这样一个批注，关锋的美好生活是到头了。

八月二十六号，毛泽东派人把杨成武喊过来，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从此号称中央文革的“车”、“马”、“炮”的三大笔杆子、理论家、兼书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眼泪汪汪地走向监狱的大门，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得以重返自由世界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关于中央文革的精神和出牌套路，毛泽东看得很明白，他知道中央文革的人想攻下周恩来。但是他也知道，周恩来不能倒。周恩来倒了，就没人干活了。聚集在周恩来周围想干活的老干部，在失去周恩来的安慰之后，必然出乱子，而且军队会继续乱下去。那样的话，文革就将变成彻底的武革。

（七）周恩来火了一把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警告中央文革，安抚一下动乱的军队。中央文革的核心还在，但是手臂断了。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老滑头，才不会去冲锋陷阵哩——真正煽风点火的工作，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干。江青虽然战斗力十足，但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不是她的强项。张春桥非常有能力又肯干，毕竟精力有限。还剩下一个姚文元，还得兼顾上海那样一个烂摊子，斗呀斗呀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的功能保住了，制造纷乱的力量减小了。毛泽东如此选择虽然有无奈的成分，也不失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招好棋。

然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后果。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北京，周恩来开始行动了。周恩来办事可不像中央文革那班人，折腾半天也没有所以然。周恩来表示立刻喊人开会，召开一个小型中央碰头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王力和关锋。

为了达到目的，周恩来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步，开会之前，先跟陈伯达打招呼，放点风。因为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生了一场病治好，大权却落到江青的手中。陈伯达受不了江青，就倒向了林彪。周恩来选择和陈伯达通气，是免得闹起来形成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央文革喷口水的局面。虽然中央文革的那帮口水天王

不太敢怀疑毛泽东的指示，万事还是有个准备好。削弱中央文革，对林彪那帮人也有好处，加上此次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行事，争取陈伯达并不难。

第二步，安排警卫守在会场门口，一声令下进去抓人就是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听要开会，纷纷把口水制成弹药，准备在会议上继续给周恩来出难题，比方说陈毅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比方说徐向前是不是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啊，比方说那个外交事件究竟是咋回事啊、伤害了外国友人的感情怎么办啊等等。他们似乎看到了周恩来难以收场的样子，心里正在暗爽。

然而向来隐忍不发周恩来这次没有给他们机会。会议开始，周恩来就说，今天要宣布一个最高指示，依然是他那不紧不慢的绍兴腔调把杨成武的记录读一遍，做出结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其实就是隔离审查，怎么变成请假检讨了呢？只因为周恩来向来善于搞人际关系，说法委婉一点而已。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位大神踢出局。

当然，王力、关锋的心情立刻从夏日青葱的呼伦贝尔草原急转到秋天的沙哈拉大沙漠，被卫兵带走之后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从盛夏进入寒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推卸责任，和那几位仁兄划清界线。陈伯达也是脊背上冷飕飕的，庆幸被带走的不是自己。他们看着眼前的周恩来，顿觉世界不同了。

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还是那么一团和气，还是那么讲究分寸，还是那么给朋友和对手留足面子。然而这样一个周恩来，之前在中央文革的口水战大师眼中，是那样的软弱善良，如同羔羊一般。此刻的口水战大师们深刻感觉到，那善良的羊皮之下比狮子还要勇猛。

这是周恩来的高光时刻，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样的时刻非常的少，但总算有过。尽管有过这样的高光，周恩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他。当然，王力和关锋被带走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许多。当两人再次自由地享受到风吹日晒，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国人已经慢慢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想办法发财了。

（八）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中央文革的车、马、炮同时失去，损失不小。号称大笔杆子的王力是车，革命急先锋关锋是马，戚本禹就是炮。炮，威力大，火药味浓。戚本禹，脾气大。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在山东，在上海长大，是积极分子。十八年之后解放军进入上海，积极的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性格：耿直。

特点：脾气大。

绰号：戚大帅。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戚本禹的人生应该是最为顺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均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江青也经历过上海的是是非非，甚至被捕过。低一级的王力也经历过战场的考验。关锋虽然比戚本禹还年轻两岁，人家入党时，战争还在继续。唯有戚本禹，入党时全国正好解放。而别人打仗时，戚本禹在学文化，十八岁那年已经到了高中文化水平。当然十八岁的高中文化水平放现在不算啥，当时已经非常稀有了，直接去了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这样的就业机会，简直和天上掉下的馅饼差不多，而且是很多年才会掉下一个的那种。

中央机要处的戚本禹具备一系列的优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常常受到领导表扬。而戚本禹本人也是个人才，写字模仿毛泽东，写文章模仿鲁迅。毛泽东和鲁迅，是那个年代最有力的两个符号。如果一个人能用类似毛泽东的字体写出类似鲁迅的文章，即使山寨版也罢，想不走红都难，所以戚本禹走红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一连串的风波之后，戚本禹也写了一篇文章，写李秀成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写下自供状依然被杀。当时大家对李秀成的行为褒贬不一，褒的一方认为，李秀成已经为革命尽力了；贬的一方则曰，叛徒，不解释。戚本禹写文章曰，李秀成是叛徒，并且在大作中证明了一番。这事也没啥大不了，言论自由嘛，然而在那个文艺界即将整风的年代，就特别耀眼了。当然和所有时代一样，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会引来一大串板砖和口水。戚本禹面对四面而来的板砖毫无惧色，卷起袖子力战群雄，直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斗力之强悍，连号称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也要让其三分，连康生也对其另眼相看，风头丝毫不让后来的姚文元同志。

正因如此，在中央文革中，虽然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戚本禹却是相当活跃。田家英自杀之后，戚本禹填补了空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是江青的秘书。在那个年头，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意味着什么？大家（各地党政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闲着没事都主动和戚本禹同志沟通。

戚本禹同志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考验，十八岁便跻身中南海，然后是名扬天下，受到领袖及其粉丝们的夸奖，根本不知道含蓄谦让为何物。所以看起来派头很足、脾气很大。

由于派头大，脾气足，江湖人称：戚大帅。戚大帅开会时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大员，也是趾高气扬。连江青都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戚大帅当然会充分发扬自身的战斗力，除了干好写文章、扣帽子、喷口水这些基本工作之外，

还干了两件附加工作：煽动红卫兵造反和保护文物。从理论上讲，这两件事不冲突，然而那年代，这是两项完全矛盾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分，是全国大夺权的开始，也是运动的最高潮阶段，此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本应非常忙碌。然而他在百忙之中干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却应该鼓掌欢迎的事。一月二十七号下午，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谈论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许多红卫兵抄家之后就把人家的资料文献啥的放把火。许多书籍非常珍贵，然后就灰飞湮灭了。戚本禹决定改变这个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问：“为什么？”答曰：“怕。”

——好一个“怕”字啊！怕啥呢？怕自己和那些玩意沾上关系？

戚本禹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说：“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说：“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这些理由听起来极为不舒服。但在当时，在中央文革中，已经是非常理性的声音了。最重要的是结果。戚本禹给参加座谈的造反派代表们做出指示。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给

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如此等等。

最后来一个总指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弄出了几条紧急倡议：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评：那个座谈会才是戚本禹一生的闪光点。

戚本禹虽然保护了一批文物，但他的本质工作还是鼓动红卫兵闹事。

起草《五一六通知》有他。

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有他。

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有他。

鼓动造反派冲击朱德的住宅也有他。

如此等等，那是相当活跃，光辉业绩一串串的。不禁纳闷，戚本禹同志，就不能安分一下吗？当然不能。如果能安分，他就不是戚本禹，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就不是江青的秘书了，因为世事均有因果。戚本禹同志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不安分就是他的因。

一边是保护文物，一边煽动造反派造反，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至少不符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印象。那是一个人干的吗？当然是一个人。

首先戚本禹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地位重要，对文化至少了解不少。知道秦始皇焚书不稀奇，知道商鞅焚书的就不多，知道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已经可以算有头脑了。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戚本禹当然知道烧书是不对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戚本禹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进入中央，接触到的都是革命意识，认识到的全是革命行为。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脑袋里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旧文化导致了近代落后（基本上是这样），革命带来了国家浴火重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要继续革命，要扬弃旧文化。当他说出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时，也应该看到，他的首长同志们做得更加过分。

然而把这个理论放入实践中时，造成的结果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戚本禹的行为才那么怪异。评价戚本禹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有文化的革命者。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的行为看起来如此奇怪，就表示文化大革命本身出了问题。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待戚本禹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

（九）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王力和关锋的世界当时就步入了黑夜。一开始两人只是被软禁在钓鱼台二号楼，还是在中南海内部。吃好、喝好、睡好，生活待遇啥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只是不能随便出去带领大家喊口号，不能煽动人家去造反，不能卖帽子了。

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一项任务：写检讨。日子清闲得让人发狂，但比起街头武斗的广大炮灰要好多了。有一天，他们等来了领导陈伯达同志和张春桥。领导人当然还是那样的春风得意，还是那样的笑容可掬，只是不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告诉昔日部下曰，要好好地写检讨，深刻地写检讨，从骨头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天是十月十六号。

十六号之后，专人打扫卫生的生活没有了，定期检查身体的医生没有了，因为两人离开了中南海钓鱼台，被关押在北京西山，每人一栋别墅。在那里，日子更无聊了，待遇也不一样了。然而比起那些被他们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残酷斗争的老革命，他们还是在天堂一样的舒服。他们的任务还是老一套，写检讨，加深检讨。

检讨啥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必须得写。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写得好的话就可以继续出去吃香喝辣，继续当中央首长，继续煽动红卫兵去批斗人家。写得不好，就要完蛋，还可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批判对象，要开喷气式，要戴铁帽子（如张霖之），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要好好写，可是又写不好，那个惆怅啊，那个郁闷啊，那个心有不甘啊，那个无可奈何啊，就不说了。这样写了两个月，终于不用写了，因为他们去了秦城监狱。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的也很差。没有了服务人员的百般照顾，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既没有生病死掉，也没有上吊撞墙出意外。大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风光，多么不可一世，在秦城监狱的夹板上，他们和墙缝里的被遗忘的蟑螂没啥区别。尽管如此，这个待遇也比被打断肋骨的彭德怀，比被截断腿的罗瑞卿好多了。

其实王力和关锋被忽悠了，在他们住进秦城监狱之前，他们只是供昔日战友们泼脏水的粪坑而已。所谓写检讨，也就是让自己承认错误，替中央文革背黑锅。当然，他们干得很好，把所有的错误自己扛下了，光荣留给了战友们。

戚本禹是另外一个行情。在王力和关锋倒下时，戚本禹还没有彻底倒下。在警卫员把王力和关锋带走时，戚本禹还发言了。当然戚本禹也不想倒下，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倒下。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于是他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

戚本禹直接写材料揭发王力和关锋，所有脏水往昔日战友身上泼。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在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泼脏水。不同的是，那几位战友兼领导不仅把脏水泼向王力和关锋，同时泼向没有倒下的戚本禹，说戚本禹和王力、关锋是一路货色、坏人披了一张好人皮、挂羊头卖狗肉、扮演好人害好人，欺骗俺们这些无产阶级老实人。

一开始，毛泽东对戚本禹是有感情的，是保的，是欣赏的，所以才让周恩来争取一下戚本禹。然而戚本禹表现太差了，出了问题首先是推卸责任、是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泼脏水。这种人如何能重用？成大事者，没有不出错的。出了错而不敢承担，还能干啥？如此一个不敢承担的人，保下来何用？看看周恩来等老一辈，有了错，先自己扛下，然后再寻找要因。那才是老一代领导人的处事风格，也是他们干革命成功的原因。

所以戚本禹很简单，即没有在中南海钓鱼台过渡，也没有在北京西郊别墅被软禁，而是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了。他的待遇和曾经的战友王力、关锋一样：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的也很差。毛泽东不仅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失望，同时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也很失望，一看就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但是不用他们又能用谁呢？能独当一面的都到了资本主义阵营去了，死的死（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正在死去），贬的贬（如邓小平、陈云），伤的伤（如彭德怀），残的残（如罗瑞卿）。

然而，尽管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在后人看来没少惹事，本质上也就是书生而已，写写文章，煽动一下而已，不是决策者。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起多大作用，那是鬼也不信。但是站在文革的立场来看，他们又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的程度远胜过绝大多数人。写文章最起劲，搞煽动冲在前，可以说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理论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

时候，各自在秦城监狱挣得一个单人房间。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间，执行文化大革命最为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跌入谷底，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名义上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玩不下去了。

促使王力、关锋、戚本禹走向秦城的因素，不仅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失望，还有另外一件事，即武斗。

（十）最后一个选择

武汉闹事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意识到两件事：不能任凭中央文革无限制地闹了，要泼点冷水，于是就有了文革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中南海辛勤劳动到秦城吃免费皇粮的故事；第二，就是军队支左是个错误。如何错的，参照前文。

在中央文革战斗力下降、军队支左不成功，而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原本军队支左，目的也是增加红卫兵战斗力的，没想到起了反作用。那么如何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呢？自文革开始以来，在强大的宣传力度下，基本上所有在校的年轻人都发动了。红卫兵也是非常卖力，能冲击的都冲击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战斗力基本上到了极限，还如何增加呢？

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武器。

武汉事件之后，红卫兵有了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发放的，一部分是抢的。没想到武器一到手，不仅没有增加红卫兵的能量，更是起到反作用，造成彼此自己的更大规模武斗。伟大领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赶快在九月五号号召大家把武器上缴。然而正如红卫兵运动本身一样，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就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造反双方都有武器，谁愿意上缴？谁能保证自己缴枪之后对方也缴枪？谁能保证对方不私藏？所以很大一部分武器流落在红卫兵手中，武斗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到红卫兵进入历史。

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看，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惨烈的故事，故事本身浓缩着深深的悲痛。所有被牵涉进去的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加在一起促使文革走到尽头。

前面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许多党政要员付出了代价，社会精英付出了代价，军方统帅付出代价，中央文革小组本身也付出代价，最后连江青和张春桥付出了代价，走向监狱；毛泽东也付出了代价，如今被非议。

在这一连串的代价之中，现在说一说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付出的代价。

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红卫兵去干人家，拉着高干开喷气式飞机，去社会精英

家里去抄家，去挖墓、砸文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对之后的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是红卫兵。

社会影响暂且不谈，谈谈付出的代价吧。代价就是大武斗。

（十一）大武斗

从红卫兵诞生的那天起，不合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在大饥荒的篇章里，描述了一个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张三。现在描述一个走向大武斗的红卫兵，叫红小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红小鬼在上学，不管是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建国之后，在豪迈、阳刚的红色思想下教育出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要理解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红小鬼的童年或少年，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那十个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十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从英国鬼子到俄国长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磨砺；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人物，北洋军阀前后各种各样的垃圾军阀，如热衷于盗墓的孙殿英，如火焚少林寺的石友三；中国人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耻辱，比方说各种租界内的歧视。

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不一样，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耶稣基督、释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财神土地，中国人都相信，但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多数中国人相信。唯一能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政治。

其它地方常常为宗教打仗，你死我活，看看《圣经》，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国人只会为政治打仗。

在中国分分和和的历史上，凡是和的时代，是以一个政治家为首的时代；分的时代，就是那种有一大串政治家的时代。远的不说，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失败，就因为他们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各自盘踞一方。共产党胜利，只因为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百年积弱之后，再一次重新聚拢在一起，在同一种思想下，以一个人为首，骄傲地挺起胸膛。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民族意志和热情空前高涨，豪迈的英雄主义笼罩华夏大地。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红小鬼，他爸有权也好、有钱也好、修地球也好，受到的教育统统是一样的：你们是红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五九年之后，社会出了大问题，各种矛盾激化。在今天，一点小事可以引来一大堆口水，一个项目就能引来群众事件（如什坊事件），那个时代可是全国性的饥荒。

今天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有麻将可以玩，有比赛可以看，有各种风花雪月的场所可以去，有各种奇闻八卦可以唠嗑，依然会为了一个项目走上街头，而这个行为还是遭到政府反对的。当时那些人，啥消遣都没有，整天关心政治，谈论英雄，幻想有一天成为英雄，吃不饱饭饿肚子，要不要去闹？当然要去闹。而且他们还有最高领袖的支持。支持他们的那个领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排得上号的政治强人。

有了这个背景，红小鬼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走上街头去闹事。闹事的前半年，当然是很爽的。把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拉到某个地方批评教训，那一瞬间还真有当英雄的幻觉，真有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幻觉，真有拯救天下的幻觉。然后在那强悍且稚嫩的心里就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在咱们中国，凡事都不是孤立的，除了高端科研（很少）和创造（稀有），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都会有一大堆抄袭的、模仿的、跟风的，闹革命也是一样。红小鬼很快就发现，周围出现了很多同样的组织，但是却在干不同的事。红小鬼及其同伴们要打倒的人，其它组织却在保，在对着干。他们也和红小鬼一样有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这样一些人碰到一起，就好比火焰和炉子同出一个房间，迟早要擦出火花的。

一开始大家自诩为革命接班人，还是讲点文明的。首先是贴大字报辩论，不过瘾，就约架，搞辩论，搞文斗。换成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辩论谩骂，谩骂不过瘾，通过网路相约，出来搞辩论。辩论不成就动手。只不过现代人相对文弱，缺乏血性，即使冲突了，也就是踹几脚，然后回到网路上继续骂。那时候的人比较强悍，动起手来是成群结队，菜刀、钢钎、枪炮应有尽有，而且没有警察抓人。如果当年有新浪、天涯什么的，口水战肯定相当壮观。

军队支左之前，红卫兵也有内斗，但还是以竞争为主。大家高喊诸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投入打砸抢事业中。因为夺权刚刚开始，观点不同不要紧，各干各的嘛，一方去冲击外交部，另一方可以冲击农业部，共同建功立业，积攒吹牛资本。国家机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机关部门虽多，却也禁不起造反派连续不停的冲击。一段时间之后，能冲击的地方都冲得差不多了，能夺的权力也夺了，大家又见面了。

红小鬼及其同伴们又看见讨厌的敌人。怎么办呢，文斗辩论都搞了，唾沫也吐得差不多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吧，那就武力见高低吧。其实红小鬼讨厌的那些人看红小鬼也是一样，讨厌着呢。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场景。

场景之一：红小鬼和某个讨厌的敌人相约于某时某地辩论搞文斗，去了一看，对方带了一群人，

大爷的，是个陷阱。红小鬼一看，要么拔腿就跑装孬种，要么硬着头皮当好汉，结果可能被揍得头青眼肿。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红小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属于某一个战斗集体，他的脸面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整个战斗集体。面子被人家泼了屎尿，怎么办呢，自然要捞回来。于是红小鬼和一帮战友，在某个角落抓住一个或几个敌人。其实那根本不是敌人，还可能是同学或者老乡，因为站在不同的战斗集体里而成了敌人。对待敌人是要残酷的。个别敌人就要丧命了：有人不堪侮辱，会从楼上跳下去，寻找生机，在落地摔成肉饼之前高喊口号，如战斗到底！毛主席万岁！

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楼，或者跳悬崖。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是被扔下去的。当然跳下去或者被扔下去摔成肉饼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小鬼。但是为了借用红小鬼的绰号，假设他没死，死的是别人。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二：凡是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必然卷入武斗。红小鬼也一样，要和战友们一起于敌人相约比武，时间是某时某地。原先说好是六对六，或者十对十，而对方不守（也可能是己方）诺言，战场四周设下埋伏。

结果就相当于一群人包围一队人。这个时候，一群人心里充满喜悦，好像要抓住老鼠的猫；一队人心中自然是恐惧，如同看见陷入猫的包围圈之中的老鼠。然而喜悦也好，悲伤也罢，都是前戏，都是铺垫。喜悦者是否能喜悦到最后还要经过残酷的考验。战斗一开始，就没有喜悦或悲伤，只有生和死。在生死之间，人就会变成凶猛的野兽。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被包围的人，都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战斗。

战斗中的野兽是凶猛的，残忍的，没有情义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尽管他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但是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手中的菜刀或者钢钎会毫不犹豫地招呼对方。如果有炸弹，也会毫不犹豫地拉开导火索。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小鬼可能拿刀砍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砍死。为了红小鬼这个绰号，现在假设死的是别人，红小鬼依然毫发无损。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三：最为残酷的斗争方式当然是枪战。用刀砍棍打的方式固然热闹，杀伤力毕竟有限。就算一伙人围住一个，也不见得非得把对方打死，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枪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打中要害铁定完蛋，即使打不中要害，医疗跟不上，流血也会死掉的。

枪战一开，必然是大规模的，是一派对另一派。两派人马可能占据一个学校当战场，再看看如何解决对方。也可能从城市混战到郊区。交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场面，比方说可能有人不小心单枪匹马误入敌阵，然后就会小命不保。

枪战一开，就再也没有朋友之情，再也没有同窗之谊，只有枪支弹药、准星、目标、敌人，只有生和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四：武斗过程中，战友的死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哀悼战友也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死人盖着红布，爹娘亲朋都成了过去式，活人戴着黑纱，还要继续战斗；死人平躺，旁边放在陪伴他去另一个世界的红宝书，活人直立，手中拿着这个世界的宝贝——红宝书。然后在墓碑上写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或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某某某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怒吼；或者，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这个仪式的功用很简单，一边为死去的战友哀伤，一边聚集怒气继续战斗，去杀伤，去制造更多的死亡。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爹疼娘生天地养，就这样死了，却不去反思死亡，而是追求更多的争斗，可以说是疯了。

如果有俘虏，还会虐待俘虏。俘虏全部光着上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俘虏全身有可能被涂抹已成黑黑的锅灰，鲜红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恐怖状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追悼仪式，可能会散布一种恐怖因子。俘虏起到一种鼓励作用，伤痛的刺激加上虐待俘虏的鼓励，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经历这一系列遭遇之后，红小鬼没还活着，那么好吧，到今天已经是老人，终于可以回忆反思过去。

要想全景式描述红卫兵的武斗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太复杂，太乱了。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战例讲一讲武斗对红卫兵运动的走势和结局的影响。

（十二）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的三天之前，地处遥远的大西南的重庆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等人，他们组织了各种战斗团体。后来为了方便宣传，全部称为“八一五”派。

这个派别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足。男女老少一大堆，大杂烩，意见不合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大家共同的事业——“打砸抢”方面的看法不同。偏偏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意见不同怎么办？

分裂。最后分裂出一个超强的战斗集体，叫“反到底”派。这个名字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很唬人，战斗力肯定不弱；二，没前途，何时才能反到底？

等武斗来临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八一五 VS 反到底。

双方成员的组成大致相当，都是学生和工人混编。所以武斗地点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根据业余的军事常识对战。比方说占领战场的制高点，就是抢先占领战场上的厂房，学校宿舍大楼什么的。进攻或者反制，就是争夺厂房、宿舍楼什么的。

重庆武斗的特点是斗争程度激烈、持续时间长、伤亡大。很大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重庆地处西南腹地，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战争，很多军工企业迁移到大西南。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军工企业在重庆。比方说现在建设的摩托生产基地，当时就是军工企业，有一个连的军队守卫。大量的军工企业自造大量武器，大量生产军火的工人卷入武斗。加上中央在武汉事件后允许持枪，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武斗战场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号，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重庆武斗开始了。夜里，“八一五”偷偷占领了建设机床厂旁边山顶的两栋小楼（占领制高点）。建设机床厂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旁边山顶小楼却被对手“八一五”占领，“反到底”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定夺回那个制高点。上午八点，“反到底”集结人马进攻山顶小楼。一番喊话、谈判、警告、威胁无效之后，进攻！“反到底”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小楼，投掷燃烧瓶。

“八一五”的人则凭险据守。双方就这样展开攻防拉锯战，均有伤亡。两个小时之后，“反到底”的人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来点真格的，于是就出动了他们的攻坚力量，一个叫红大刀的战斗小组。红大刀的成员以建厂年轻工人为骨干，各个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牛劲十足。他们的常规武器全部自己手工生产：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如果不动用枪支弹药等热兵器，在常规冲突中，那玩意在对战中的杀伤力即使比不上关二哥的青龙偃月刀或张三哥的丈八蛇矛，对付肉体凡胎也是绰绰有余了。他们找来梯子，手持武器，在燃烧瓶的掩护下开始攀爬攻坚，上演真人版战争电影。

与此同时，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发现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兵团。这个兵团也是战斗力超强强。在武斗之前，他们在空压厂制造了两栖坦克车。现在他们离开空压厂，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口号冲向战场。

援兵赶到，内外夹攻，“反到底”支持不住了，承认暂时失败，开始撤退。“八一五”则乘胜追击。一个“八一五”的人看见一个“反到底”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红卫兵同志潜力迸发，硬是从垃圾山跳

将下去，追赶者把手中的钢钎当标枪，奋力朝那个红卫兵掷去！幸好那个红卫兵是体育健将，差点入选空军飞行员，凭借矫健的身手躲过一劫，后来还是死在武斗中。另外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小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宋正言是一个高中生，跟随本方人马在撤退过程中，很不行落单，陷入包围圈中。“八一五”的人一看抓住一个活的，便好好发泄了一把被武斗激发出来的兽性，他们用钢钎招待宋正言，捅了又戳，戳了又捅。一群如狼似虎的兽性大发的人把宋正言弄得全身都是窟窿，喷泉一样地冒血。宋正言不过十几岁，小草一样的年华。

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凝成厚厚的一层。

战斗结束之后，双方撤离战场，宋正言被战友们抬了下来，全身二十多个伤口，于下午一点钟死掉。宋正言是这次武斗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成为烈士。他的死彻底激怒了“反到底”派。他们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布置战场：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大幕拉开之前，武斗还是冷兵器，杀伤力不大。四天之后，七月二十九号，终于发生了枪战。武斗立即开始升级，从步枪发展到机枪，从机枪发展到动枪动炮、坦克、军舰。除了原子弹和飞机，中国军工厂生产的兵器被搬到中国大地上进行演示。

属于“反到底”势力范围内部的建设厂，主要以生产轻型武器，如枪炮为主。宋言正的死亡加上枪战的发生，使得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准备释放大招：立即发枪！七月三十号，也就是枪战发生的第二天，“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示威；再拉开枪机，刺刀撬开一箱箱的子弹，分发下去。各路人马开始汇集，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的情形也差不多，都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图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八月一号，建军节，建军四十周年。那一天，中央文革的关锋在报刊上重提批斗军内一小撮。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副武装“反到底”向“八一五”发动进攻。他们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开道，用炸药爆破。一时间“八一五”占据的地盘火光冲天。

在冲锋与反冲锋的拉锯中，喊杀声不绝于耳，夹杂着惨叫声、呻吟声，构成一曲恐怖的乐章。在那恐怖的乐章下面，是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是兽性大发的人们，是伤痕累累的人们。

狂野的枪炮声昼夜不熄，惨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八月三号早晨，“八一五”支持不住了，全线溃逃——带着战友们的尸体。“反到底”的人马则在后面追击。一路上枪战连连，打死打伤不少人。这个回合，“反到底”胜。

八月五号，“八一五”的人马为了占领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的人抬肩扛，将两台大口径四枪管的重机枪推到半山腰架上。“八一五”的人携带轻武器仰攻冲锋。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八一五”死伤惨重，死伤者漫山遍野。八月天，尸体很快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他们都有父母，很多人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不死，他们可能成为各个行业里的精英。

这些只是武斗的一角。武斗中死掉的一部分“八一五”成员埋葬在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地方，称“八一五”公墓，依山傍水，鸟鸣清幽，曾是解放军烈士墓。那些生前热血满怀的冲动派，终于在幽静的环境中长眠了。他们曾经有最热的血浇灌纯粹的理想，最终从后人那里得到的只是质疑的目光。现在的人看见红卫兵墓，感情总是复杂的；对待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是困惑的。一方公墓留下一个巨大的课题。

重庆乃至全国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夏。武斗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那段时间，中央给了造反派武器，允许武斗，因此斗争极为凶狠，完全超出了预期。九月五号，中央下命令鼓励大家把武器上交。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没有上交。比方说“八一五”和“反到底”就没有缴枪，或者说缴枪也没用，人家自己生产枪支弹药的。要么文化大革命结束，要么另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介入。

双方你来我往，明争暗斗，一直斗到一九六八年建军节，来一次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八一五”依靠人多势众，精心布置，打散了“反到底”。

这一战之后，双方尘归尘、土归土，死的死了，没死的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擦干身上的血迹，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乡下，他们荒废了人生的黄金岁月。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开始，文革之火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双方大武斗，直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空架子，直接导致文革在基层的运动的破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多表现在概念和象征意义上。

压垮基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是另一个故事。

（十三）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该干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该打倒的人打倒了（如刘、邓、贺、彭、罗），该夺的权也夺了，该裁员的裁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了，军队也出动了，武器发放了，武斗也斗了大半年了，改出的招数也都出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思

考。

高层正在考虑召开九大，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次回顾总结，展望一下未来。在普通人的身上，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也就是给自己鼓鼓劲之类的。中央不一样，需要权力的重新组合分配。被打倒的那些人形成一个个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在基层，骚乱还在继续，武斗的枪声时不时从不同的地方传来。

在骚乱的过程中，许多红卫兵组织分裂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最著名的领袖蒯大富亲手创立的、亲自领导的、一手指挥的，依然没有躲过命运的侵袭，走进不可挽回的结局——分裂。

井冈山兵团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在蒯大富的领导下，从骗斗王光美的一鸣惊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时不时把中央大员（如彭真、罗瑞卿等人）拉过来批斗一番。

关于夺权，蒯大富认为：“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蒯大富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由于战绩过于辉煌，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称霸清华园，不够；名扬北京城，不够，还要继续，把手伸向全国。在夺权的黄金岁月里，井冈山兵团以联络站、记者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派遣近千号人马，直接干预当地的文革斗争，武斗文斗都有，全方位服务。

蒯大富带着他的井冈山兵团把手伸向军方，甚至把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的家给抄了，还想绑架徐向前，好在没有得逞，不然又多一冤案。揪斗军中一小撮有他们，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背后有他们。他们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乱一点。

然而一切辉煌和风光都是表面的，兵团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蕴含着很多不确定的成分。

当年清华内部大大小小的派系一大堆。为了寻找存在感，各派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书生嘛，观点、话题自然不难找。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下之后，有人渴望继续建功立业，结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有人贴康生和江青的大字报，还有人想挠一挠毛泽东和林彪的虎威，自然都是不了了之。因为造反工作要靠中央文革的支持。没了中央文革，他们就是秋后蚂蚱——没啥可蹦跶的。

井冈山兵团是靠大棒和帽子起家的。大棒和帽子不仅在高干和社会精英中推销，还在造反派中推销。井冈山兵团要当老大，成为一哥，对其它红卫兵组织只能分化瓦解，招数如下：一，兵团内部，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意见向左的人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再通过各种帽子压住；二，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归结起来就一条：听话是战友，不听话是对手。

这一系列折腾之下，不满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大，分歧越来越大。大家同样是造反，凭啥一切都是你蒯大富和你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说了算？凭什么你们就是真理？真理是你们表叔二大爷不成？！既然权威算不了什么，既然夺权就是一切。那么你蒯大富可以去打倒权威，可以通过打倒权威而成为权威，可以通过夺权而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倒你蒯权威不是？

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号那天，井冈山兵团分裂了，分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团派归蒯大富领导指挥，四派是他的敌人。

四派发表文章质疑蒯大富的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过来就是，为啥老是我们清华当出头鸟，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蒯大富同学利用咱们清华的热血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比方说进中央（当时有传言）？

为什么，夺权呗，运动呗。大家都是一个样，只是主张不一样而已。四派要求给老干部平反，说团派干部也有缺点，总之是要另起炉灶和团派对着干。如此这般的结果只能是没有结果：在唾沫星为常规兵器的战场上永远不会有胜负。

双方开始用嘴辩论，你来我往，不亦乐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弄到最后，两派人完全对立起来，一派说应该往西，另一派也不管对不对，本着为反对而反对的思路，一定说往东；一派说咱们红卫兵今天应该出门打狗了，另一派则说应该去捉鸡。

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〇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

四派则针锋相对：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给团派那套理论贴上标签，美其名曰“大翻个理论”，即反动理论。

原来战斗力强大的井冈山兵团，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严重影响了造反的宏图大业。一开始开会只是喷口水，升级到会场拳头。紧接着会场拳头升级为会场暴力。解释一下会场拳头和会

会场暴力的不同：会场拳头，是指与会者双方看对方不爽，亲自上阵挥动手臂、扔破鞋、青菜、臭鸡蛋，详情参照台湾两党开会。会场暴力则是外界力量的干扰。比方说团派开会时，四派人马去冲击会场，扔破鞋、青菜、臭鸡蛋之余，还会加上配音：团派龟孙子王八蛋等无休止的口号。

这样一来形势发生了转变：继续造反之前，要摆平内部的斗争。

既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既然唾沫星无法消灭对手的反对精神，那就用武力消灭对手的身体。双方在清华园内部拉开战场，好吧，你们占领图书馆，俺们占领科技楼，对战！开火！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七号，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们用拳头代替舌头战斗、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无数个回合，依然没有分出胜负。斗争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方式，绑架：这是黑社会流氓团求财的手段么，不错。黑社会绑架勒索，那都是小儿科，和当年的红卫兵比起来，他们只是一根冒险。当年的红卫兵，那可是连大元帅和中央大员都敢绑架（参照彭德怀和彭真待遇），绑架了部长给批斗死的案例（张霖之）都有。团派和四派的内斗也不会放弃这么有效的手段。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侦查、追踪、引诱、突袭等方式把对方的重要人物控制起来。这是连锁效应，团派绑架四派的人。四派的人也不甘落后，会报复，反过来绑架团派的人。那种绑架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绑架一个人，只为点钱财。红卫兵则不同，为了所谓的理念。绑架一个人，目的是策划对方反水，从敌对阵营投入我方，弃暗投明。如何让对方弃暗投明呢，首先像唐僧一样唠叨，诸如我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啊等等。当然唐僧咒不管用时，他们会挥动孙悟空的金箍棒，砸丫的，具体就是对待社会精英的那一套，如喷气式。总之是不惜代价让反水，正如黑社会不惜代价要钱。

第二种方式，群殴：每个人想必都见识过群殴场面，某一天放学路上，某个城市角落，都会有群殴事件发生：一帮人叽叽喳喳，跟唱戏一样叫个不停。然而大学群殴有几人看见过？休说群殴，斗殴都不多。毕竟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墨水也喝了不少，自尊心、自主意识、是非观基本上都形成了，懂得用脑子解决问题。要说全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还是顶尖的学生群殴，那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了。没办法，大家都要革命，脑袋瓜子都不错，嘴皮子也不错，谁也不服谁却要说服对方，要啥办法呢，只有动拳头了。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弓箭、钢钎啥的应有尽有，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形容书生战斗力差的。然而逼急了，战斗力差也得去战斗。而且只要去战斗，就会打死打伤打残。

如果有人不幸被绑票或被俘，将遭受如下待遇：捆绑，用电线或细绳五花大绑，结果是关节肿胀；被关押在几个一百瓦的灯泡房间里，四周门窗全部钉死，日夜不熄等，墙壁或者房顶上有一个小孔，充当摄像头，有人监视（监视者也辛苦啊）；皮鞭、棍棒、拳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时候还

能品尝到别样花招，如罚站，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腿脚肿胀、汗流浹背、头昏眼花。当时七八月天，空调电风扇啥的就不要想了，蚊香蚊帐也没有，光蚊虫就够喝一壶的。

第三种方式，武力威慑：眼看前面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升级，威慑。威慑不等于威胁。个人角度上讲，老子要拿刀砍你，那叫威胁；在人家家门口加上枪炮，叫威慑。从国家角度上讲，不要再占领俺们领土，不然俺们开炮了，那叫威胁；把原子弹放好，那叫威慑。按道理说清华园的高材生们都有发达的脑袋，不会搞武斗的。既然要搞武斗，那也是非常有特色。别的地方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实干。清华园的武斗不同，他们是有清华特色的武斗。他们手中也有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很少摆开战场大干一番，而是在清华园内修筑工事，拉铁丝网等等，建造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威慑对手。四派不敢轻易进攻团派的同时，团派也不敢轻易进攻四派，达到一种武力上的平衡。相当于一个山寨版的冷战格局。各自躲在自己的据点里侮辱攻击对方，也有对战，但基本上不是生死肉搏。

这就是双方在清华大学大战一百天，仅仅只有十一人死亡（被长矛刺死、被毒打致死、跳楼摔死等等，只有四个学生中弹而死），三十余人残废，伤亡率颇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头脑的不是？所以嘛，把枪弹当成核弹来用，搞武力威慑嘛，挺好。要是像重庆那个搞法，估计双方都别想离开清华园了。

那场武斗除了时间持续长，规模并不大（放在当时的背景看），残酷程度上讲也不算啥。因为是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清华井冈山，所以影响很坏。

不仅是社会影响，还影响到高层的决策，即毛泽东的决策。闹到最后，四派撑不住了，开始求援。

十、无奈的结局

（一）工宣队进清华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巨人手腕搞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巨人的两只手，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武汉七二零事件导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岗吃皇粮，导致了中央文革煽风点火的能量大幅度下降。除了老滑头康生之外，仅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上海一个烂摊子要管。中央文革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武斗事件造成红卫兵的内斗，再也没有力量去管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早期那种强悍的冲击力消失在内斗之中。可以说红卫兵武斗，就是中国内斗传统的山寨版。

其实毛泽东对清华园，乃至全国的武斗非常清楚。七二零事件之后，也正是他同意给造反派发枪才导致武斗升级的。一年之后，武斗如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进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让红卫兵走入历史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号清晨。北京市数十家单位的三万多工人打着另一个旗号进入清华园，即“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大名鼎鼎的工宣队。这三万人干嘛呢，维和的，调节武斗双方的，通俗点说也就是劝架的。

当时清华园里对战双方加在一起不到一千人，维和部队一下子来了三万人，斗争的双方都傻眼了。尤其是蒯大富同学，一心想消灭四派，眼看把四派逼到墙角了，一看黑压压的几万人（讹传为十万人），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心房差点硬化为玻璃了。

冷静下来一想，部队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中央还有什么人有如此大的能量呢？如果是中央整出来的，以自己 and 中央文革的关系，那一定会得到通知的，事实上啥消息也没有。蒯大富同学再一次迷茫了。迷茫之中的蒯大富灵光一现：一定有黑手，对，是黑手。蒯大富跑到北京文革委转了一圈，讨说话，结果啥也没有捞到。这是蒯大富第二次迷茫了，第一次迷茫是两年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进清华，把蒯大富同学关进黑屋子。

是否有黑手，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阵地不当孬种，等待中央救援。于是团派组织人马抵抗，打伤了一部分工人。但是双方差别是在是太大了，人员对比大概五十比一。而且工人天天干活，全身肌肉肯定比满脑子理论的学生发达。毕竟满脑子的马恩列斯毛或者牛顿伽利略不能转化为拳头。拿五十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对付一个穷酸书生，一点悬念也没有。而且工宣队的领导人还有一些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军代表，非常善于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宣队逐步推进，稳扎稳打，

拿着大喇叭喊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放下武器、不要反抗等等；行动上一点也不慢，迅速完成分割包围，把一群要肌肉没肌肉、要战斗力没战斗力的学生给团团围住，集中起来宣传教育。实际上和扣押差不多。清华大学那帮秀才，平时也都是喷口水教育别人的主，自以为理论造诣颇高，现在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老实巴交的工人教育，那个憋屈啊，莫提了。但是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理名言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团派英勇抵抗过，还打死了几个工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八点钟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达成协议之前，蒯大富和他们的战友们开会，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然而那些高智商的才子们似乎打红了眼，多数人选择留在清华继续打。这个时候，能折腾的蒯大富却展示了难得的冷静，继续分析：“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被王洪文带着工人消灭的）的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分析：“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不得不说，蒯大富同学如果早生四十年，说不定是打游击的好手。

随后，蒯大富和一帮人从清华撤到北航，寻找机会反击。暂时脱困的蒯大富发电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的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封电报明显夸赞，把三万人夸大为十一万，还说幕后有黑手。也许不是蒯大富的真实感受。知识分子嘛，常常被感觉欺骗，对有利或不利的事夸大。蒯大富刚发完电报，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人要接见，他不敢去，担心遭“黑手”暗算，后来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敢去人民大会堂。去了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准备告一状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等他找到工宣队的“幕后黑手”

时，只有在那人面前嚎啕大哭的份，因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或许早在文革之前和工作组对抗时就挂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也没有人生中两年多的风光和之后十几年的牢狱之灾。毛泽东不仅是蒯大富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精神支柱、以及红卫兵存在还是消失的决定性因素。

武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毛泽东刚刚上床休息，周恩来打电话过来了，说工宣队进入清华过程中流血（有人死亡），毛泽东非常来火，冲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很少发火，发火意味着雷霆之怒，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来过火。清华大学这点事怎么会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来火呢？

原因有二：一个是刚刚睡下，被吵了，烦。毛泽东的一生，习惯在晚上思考、工作，而且他很难睡着。所以他很不喜欢有人吵醒他，人之常情。

另一个原因才是主要的：恨铁没成钢。

毛泽东搞文革，红卫兵是急先锋。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热血和勇气去冲击逐渐固化的官僚制度。为了鼓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他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去抄家、开批斗会、去修理高干们。那些高干都是他当年的战友。他们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把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去冲击千年以来的官僚积习，给社会注入新的元素。然而两年过去了，他失望地发现，红卫兵不仅啥都没干成（除了破坏），而且陷入内斗无法自拔。

把毛泽东看成铁匠，把文革看成铁炉。铁匠希望用铁炉把生铁锻炼成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发现，铁还是铁，终究没有成钢。

后来有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决定派遣工宣队到下达任务前后仅十几个小时，好像工宣队的事情非常仓促。实际是瞎扯。毛泽东啥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仓促过？

毛泽东一辈子，要干的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但是唯一在红卫兵这事上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正如当年的大跃进。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红卫兵不能成事，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号，枪支发放两个月后，就要求缴枪。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放手去造反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一直在拖着，一直拖到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终于压断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华园的井冈山兵团是所有红卫兵组织中最为核心的组织之一，如果连蒯大富的人都陷入内斗无法继续干事，那么也就意味着红卫兵的使命结束了。如果放任不管，让清华园的武斗继续下去。最终的最终，蒯大富或许可以指挥团派消灭四派，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到时候清华园或许不存在了。又或者，只剩下团派的一帮人。那时候团派还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一派消灭另一派。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继续分裂。如此循环，无穷无尽，最后剩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蒯大富么，或许

是，或许不是。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因为都得完蛋了。

（二）决定红卫兵命运的那个晚上

那是一个死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只有一种办法，用强力把死局推倒打散，彻底送入历史胡同。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解决红卫兵问题了。所以在七月二十八号早晨，蒯大富还在想办法挽回局势时，毛泽东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开会。那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五大领袖开会。那场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红卫兵——整个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

凌晨三点半，周恩来给的电话叫醒毛泽东之后两个小时，除了蒯大富之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几个人到了中南海。对普通人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睡觉的黄金时间。风光无限的红卫兵领袖却因为武斗的事焦头烂额。尽管他们习惯了黑夜工作或者战斗，依然对那一次深更半夜的会议惊讶不已。当然他们渴望中央的指示，如同干裂的大地渴望降雨。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想到，他们将面对当时最为强大的权力阵容：伟大领袖毛泽东，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有中央警卫团的老大汪东兴、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

——当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负责人。

看看如此强大的阵容，深更半夜就为了召见几个毛头小年轻是不是太隆重了？几个人只有聂元梓稍微年长一点，四十四岁，相对召见者也是非常年轻。谭厚兰梳着两条小辫子，加上个头瘦小，像小姑娘。韩爱晶更老土，穿着土布衣服，裤腿卷到膝盖之上，到乡下放牛都不用打扮。而故事的主角蒯大富还没到。然而历史证明，那天的事非常重要。

据韩爱晶回忆，那日凌晨，毛泽东脸上的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神圣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不见了之前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的火气。他将在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红卫兵的命运——他已经习惯了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

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首先亮出态度：并非和清华过不去，实在是清华那帮家伙闹得不像话了，逼得我老人家动一动手指头。谈话就这么开始的。

谈话的目的：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过程：极为温和的，或者说是家庭式的。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去时就嚎啕大哭。韩爱晶回忆，当时的蒯大富如同一个在外面挨打的孩子回家告状。毛泽东看见蒯大富起身迎上两步，在座的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边哭边啰嗦：“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等等等等”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一边韩爱晶流着眼泪劝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傻眼了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毛泽东一听，立马让谢富治和温玉成放人。

韩爱晶如此回忆现场情形：“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江青重复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过程就是这样，富有感情味。这么说或者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残酷的年代，怎么能说现场有感情味呢，应该是铁血冷酷的命令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首先毛泽东的政策都在谈笑间落实的。其次毛泽东当年是全民偶像，粉丝对偶像当然是柔情的。最后，毛泽东对几个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

谈话从凌晨三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半，主要是毛泽东在讲，其他人一旁帮腔。一共讲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状。

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就是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问题，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

林彪则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这些话从正副统帅口中说出来，分量可见一斑。红卫兵运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建设一面，即文斗方面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陷入内乱；破坏一面，即武力打砸抢过头了。这一正一反之间就让文化大革命陷入深渊。不仅如此，派工宣队解救，蒯大富同学反而被战斗欲望冲昏了头脑，和工人开战，白白让另一路人马捡了便宜。想想都是郁闷啊。

但是政治家不能讲郁闷。政治上的事，可以有现实手段，不讲精神感觉。所有的负面情绪，只因为手段失误而已。从武斗这一块来讲，彻底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红卫兵不足以继续支持文革了，而五大领袖也不是成事的主。也搞了一两年了，连自己手底下那帮人都搞不定还不如去乡下种地呢。除了韩爱晶的北航稍微好点，其他地方乱得不成样子。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临时方案，即眼前方案。另一个是长远方案。

关于临时方案。毛泽东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

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这是临时性办法，即解决武斗的办法。但是解决武斗只是暂时的。武斗之所以是武斗，除了文革初期的政策鼓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事干，闲着无聊。该毕业的没地方工作，比如王大宾同学，本来应该去搞野外勘探去了，结果没单位接收，就干革命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在学校念书的，但是停课了。那些领导啊、教授啊什么的，都拉出去游街了、搞喷气式了、扫大街去了，精神被摧残成为乞丐了。没有成为乞丐的就自杀了。而且他们的家被抄了，读书馆被砸了，公共资源被封了，自然就没得教。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怎么办呢，那么多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青春热血，都是不安定的主。本来管还不好管呢，看看校园黑社会，看看那些聚众斗殴的少爷小姐们。没有工作去消耗血管里滚烫的热血，没有学习任务去中和不确定的因子，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没有鸡鱼肉蛋，窝窝头和咸菜那点能量就足够他们惹是生非了。只要文革继续，年轻人就没法安排。

那就去农村吧，那里有着广袤的大地，有几亿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柱，都需要帮助。年轻人，去农村吧，那里不仅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老人家当初都是在那里冲出来的，现在你们将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范围转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代，千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去炼钢。刘少奇调整经济时，城市人口直接砍掉千万回农村。第二次，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可以理解为农民返乡。第二次则是知识青年穿越回原始世界。

七月二十六号凌晨，讲到了下乡问题。讲下乡问题之前，谈到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

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这段话透漏出教育在毛泽东心中的样子，应该说对教育界看得还是很到位的。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还是：教育时间太长，灌输理论太多，而实践不够，各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差不多。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的话，那些年轻人就没地去，没法和社会接轨。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现在教育不好，无法和社会接轨。要想搞好教育，必须搞好实践。古人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因为按照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差一点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建国之后的教育也是铺张浪费多。既然如此，那就打散重新来过。

——应该说毛泽东对待教育的思考方式和对待官场是一样的，搞不好就打散重新搞，搞不好再打散，直到搞好为止（如果寿命足够长的话）。

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做事找不到模板可循时，就会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找不到出路时，就想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教育

下一代，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因此才有这么一番对话。

毛泽东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帮腔：“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证实：“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谈话过程中，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个人前途：“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才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三）最痛

红卫兵们去上山下乡了，离开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们可以说是史上最为暴力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自由度超过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最活跃的群体。从春秋时代设计社会制度，到之后的两千年修补社会制度，再到近代冲击社会制度，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或愚蠢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站在现代的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春秋，那是一个发扬智慧和热心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也不错，不少人也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论如何，他们拥有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太远的就不说了，也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口饭吃。即使放眼今天的世界，知识分子们拥有的自由度也还是不错的，闲着没事可以骂骂政府，对某项政策不满可以喷喷口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还可以搞点谣言什么的。如果生活在欧美，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可以往领导扔点鸡蛋或者高跟鞋什么的，也不错。

但也仅此而已。就算知识分子看某位领导再不爽，也没有机会把他抓过来捶一顿。就算对某项政策不满，更改决策的机会也不大。

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像红卫兵一样肆无忌惮地冲击高干，可以对创建国家的功臣宿将们抄家、辱骂、开喷气式、体罚、侮辱。即使被尊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一帮年轻人砸了几个老官僚的家，如此而已。但是在文革之中，身为知识分子的红卫兵们的自由度趋向于无限。除了一小部分人不能批斗，一小部分人的家不能抄，一小部分机关单位不能冲击，那是爱咋折腾就咋折腾，想去搞谁就去搞谁。

正是这种趋向于无限的自由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仅仅念过几年书，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愣头青们，以自身那点狭隘的观点去解构现实社会，挥舞道德大棒去解决所谓的社会矛盾，杀伤一大片，血流成河，惹得天怒人怨。他们把老一辈将帅名流搞得差不多之后，又掉头对准自己的战友们，拉出枪炮，战斗不息。

之前已经描述过不少红卫兵的破坏活动。比方说社会搞乱了，很多人搞死了，很多人死得很冤很可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最大的恰好是红卫兵本身。

下面这一段也可能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是从大一点的角度讲的。

这么说吧，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因为有很多原因阻碍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拥有恒心和勇气、讲立场有原则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成功者。

每一个成功者都是特殊的。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能干一些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在某些指标上超出一般人。文革就摧毁了那样子的一帮人，分成两类：即已经证明自己是精英和没有证明的。

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那些政治家啊（如刘少奇、彭真、陶铸）、军人啊（如彭德怀、贺龙）、老一代知识分子（如老舍），这些都是为后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反思基本上都是围绕他们进行的。要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好像只需要把他们的遭遇摆出来就行了。确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文革最主要的牺牲品。为什么呢，还有其他牺牲者比刘少奇的地位更高、比彭德怀、贺龙的战功更大、比老舍在社会上更有名气么？当然不是。他们的悲哀、痛苦后人基本可以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基于他们的生命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人生使命已经完成。

以刘少奇为例，文革时，已经六十八岁，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的理论，他的斗争，他的治国策略都得到了展示。后人已经知道刘少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彭德怀、贺龙也是一样，他们的绚丽人生在战场上已经充分展示。同理也适用于老舍等人，思想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中。如果他们在二十岁遭受创伤，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有多少能量。

红卫兵恰好是一群人生没来得及展示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遭难了。而且他们不是一两个人遭难，而是整整一代人都遭难了。在每一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骚动不安，会流很多血。不管如何动乱，不管流多少血，只是一部分人，总有另一部分人通过信念与能力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成功展示自己，成为英雄。革命先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红卫兵不一样，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一部分死于武斗，一部分困死在北大荒。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武斗之中，冲在最前面的死亡概率最大，叽叽喳喳卖弄嘴皮的懦弱之辈落在后面。是他们不知道危险么？当然不是。他们恰好是思想最坚定、最血性的人，为了某一个认定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看起来好像一根筋。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想想：如果他们在其它行业，例如跑业务怎么样，肯定不会磨磨唧唧，唧唧歪歪找一大堆借口说不行的人；如果是创业，他们可能也是工作狂人级别的，会不辞劳苦地工作；如果是科研，会坚定地呆在实验室。一句话，在其它行业，他们会成为那种埋头苦干或者拼命硬干的那类人。然而他们没有去跑业务，也没有去创业，更没有呆在实验室里，而是全部跑到大街上武斗。

上山下乡也是一样。那些年头，最困惑的是谁？还是那些精英。他们在穷乡僻壤对着蓝天白云想啊想，怎么也想不清楚一切是咋回事：怎么革命变成了劳动呢？笨重的体力劳动真的能够磨练心智？工农兵再教育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想不到答案。不仅想不到答案，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需要，要么就苦等海枯石烂、黄瓜变烂菜，要么就

随便找一个凑合一下。

那种郁闷、无奈、失落、愤恨实非文字能形容。当然他们有理由郁闷、无奈、失落、愤恨。他们本来应该进入各行各业想各种技术问题的，衣冠楚楚地以光鲜的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而非蓬头垢面地浪费时光。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好几年，而且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是知识积累、是思想成熟的最佳时候，就在郁结之中度过了。若干年之后，即使钢铁意志也被消磨了，当初的血性稀释为淡淡的冷水。生命虽然还在，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诸如信念、理想、血性等等都没有了，或者说很淡薄了。

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像聂元梓那般讲原则的工作作风，像韩爱晶静坐的恒心，像王大宾数次勇闯地质部的勇气，像蒯大富那股不服输的折腾劲，都会有一番作为，而不是在监狱或者穷乡僻壤里浪费时间。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那一代人中的豪杰，也具备成为豪杰的条件，然后就不明不白地掉入历史的深渊，还得背上骂名。

等到文革结束，剩下的那部分人从农村出来、从山上下来，再分配工作，再稳定下来，已经人到中年了。从事科研的话，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代（三十岁左右）。搞艺术创作，也错过了原始的积累。正因如此，后来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艺术创造领域，顶尖人物都极为匮乏。而且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都深深地烙下政治的烙印，干什么都政治挂帅。即使是经商，也是政治先行。

不是那一代人不行，而是那一代人浪费了太多的青春，接受了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接受的东西。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因为自身的遭遇而影响下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影响了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等到他们接过担子，掌控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把某些不利因素惨杂进来。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文革造成的影响没有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国家的角度上看，红卫兵的遭遇才是最痛。

所以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反思透彻。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强行推广三面红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错，第二件错事则是拿红卫兵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举措相当于压上国家的未来。就伟大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举动。毛泽东之所以会这么干，是因为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期吧——正如当年大跃进超出了他的预期一样。

（四）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央领导层基本稳定下来。建国之后，也就是高岗闹事之后，才把高岗和饶

漱石踢出局。又过五年，庐山事件，彭德怀和张闻天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在文革之前，虽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领导层还是稳固的。文革开始，领导层则出现天崩地裂一样的转变。转变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九大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文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召开的。在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报告，对之前自己的报告归纳总结，并且对高校派遣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

在大会期间，会场之外则是另外一个景象。八月二号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到那张大字报，所有人都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已经划出一条线，线的另一边是敌人。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必须站在线的另一边之外，其他人可以暂时选择站在哪一边。半个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了一件事：做毛泽东的敌人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选择很容易做，所有人都做了当时看似正确的选择，日后后悔不已的事。

于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七号，政治局成员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刘少奇的根基从此动摇，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深渊。

批判刘少奇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有了这个决定，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中央行动。正是有了这个法理依据，此后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接受教育。

大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

谢觉哉、叶飞为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个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布局完成。

会议结束之后的第六天，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倒下。

二月逆流之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受到冲击。

朱德、陈云、董必武时不时挨批，已经靠边站；本来就靠边站的刘伯承病休。

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铁三角。毛泽东负责决策，林彪一边紧跟一边扩充实力，周恩来则是一边落实毛泽东的决策一边降低决策的损失。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喻成一堆火，那么毛泽东负责火怎么烧，林彪则是靠着火堆取暖。周恩来呢，是一边给火堆加柴一边浇水。其他人等，要么努力煽风（中央文革小组），要么被火烧得不行。

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没人了，出来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哪些人召开碰头会呢？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加周恩来。咋一看，是中央文革控制了实权，其实不然，这些人只是在党政部门折腾，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军。军方的人马以林彪为首，但是林彪不参加，由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级别大致相当于之前的中央候补委员。一看这这格局就知道此后的政策走向了。

在那个格局中，周恩来虽然孤身一人，却是老干部的总代表。所有被批倒的、即将被批倒的、不会被批倒的老干部都站在周恩来的周围。此时的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就是她的翅膀，陈伯达和康生之外都是她的羽毛。陈伯达原本是中央文革小组长，而在江青同志面前却只是空架子。康生是个精于投机的老狐狸。江青嚣张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帮助江青嚣张。如果形势有所转变，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叛江青。

列席人物之中，有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谢富治和汪东兴，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南海警卫老大。从严格意义上讲，谢富治和汪东兴并不是林彪的人。当然他们见了林彪要恭恭敬敬的，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应承话。实际上他们是毛泽东的耳目，是林彪和江青也得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这些人之所以能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方式取代中央政治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造反。当红卫兵解散，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的社会行动已经破产。没了红卫兵造反，中央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就成了一出无聊的

戏。接下来怎么办？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之前那个政府机构被打散了，负责政府机构的老干部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未来怎么样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把已经混乱的局势稳一稳，把打乱的权利重新组合一下。

好吧，那就祭出老法宝，开会。

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在两年前就应该召开了。文革打乱了一切，一直推迟到一九六九年，推迟到造反的基本力量——红卫兵——进入历史之后。

中共九大一共有两个主题：一，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如何进行下去，后面再说。二，权力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权力之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还是至高无上的，还是一言九鼎的，还是没有什么约束的。

林彪作为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写入了党章。其实林彪的地位也是相当于没变。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成为二把手，九大之后还是二把手。接班人的地位没有写入党章之前是二把手，写入党章之后还是二把手。林副主席还是林副主席，并没有把副字去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仿佛看见了天堂，事实上咫尺和天涯之间有一条永恒的鸿沟。

关键是其他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小组一样，是怪物。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存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存在。从长久之计打算，要想恢复平静，还是要重新回归中央政治局。于是重新有了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比起两年前的那份常委名单，精简了很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不见了。这大概是建国之后中政治局精简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政治局委员，林彪的粉丝（如四大金刚）和江青的粉丝（张春桥、姚文元）统统加入，如同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各归各位。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九大的两大主题是彼此矛盾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兼容的。

江青及其粉丝看来，权力重新分配之后，还要继续革命的。林彪及其粉丝则另有看法。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权力重新分配之日，也就是林彪及其粉丝和江青及其粉丝死磕之时。不是林彪想要和江青斗，或者江青想和林彪斗，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江青和林彪置身其中，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要不然

只有死路一条。

（五）死角

要想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还是先要从红卫兵武斗说起。

红卫兵为啥要武斗呢。前面已经描述了不少，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红卫兵夺权的过程中也夺了不少权力，为啥不去好好利用夺到手的权柄？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看，很多事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规模夺权（一月上旬）开始到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中间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是红卫兵夺权的黄金时期。只要是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搞批判之后宣布夺权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半年的时间里都夺得不少权力。

那些权力足够把造反派安顿下来。牛叉一点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当省部级领导，身边的战友可以组成领导班子。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可以成为市委领导，然后组建市委领导班子。以此类推，他们可以去接管大学、工厂、医院、报社等等一大堆机构。小喽罗可以跑到街上当巡警啥的，保证牛鬼蛇神不敢出头。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期望的，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呢？为什么造反派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大规模的武斗呢？

武斗恰好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穴。

在很多人眼中，有权力是很风光的一件事。大印拿在手，嗓子吼一吼，好事自己上，坏事下面上，想要干嘛就干嘛。当年红卫兵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把前辈老人家打倒在地，自己拿到了各种公章。

把红卫兵在夺权过程中夺的公章摆在一起，应该有一车吧？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运转，就是依靠掌权者对公章的使用。公章使用得好，就能办好事。反之，亦反之。红卫兵夺得那些公章之后却没有利用。于是，公章成了一堆废物，就好比摆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些古代皇帝的玉玺。如此太浪费了，不是么？浪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能力不行；另一个是胆量不够。

权力那玩意是需要经营的。啥意思呢？很简单，你是一个厂长，就要保证工厂的正确运转；同理，市长、省长、部长也是一样，需要保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运转正常。所谓正常，也就是正常生产、销售、收支平衡、账目清晰啥的一大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看起来不风光，干起来可不容易，得了解很多人，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技术生产，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做销售耍嘴皮子，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财政，这些都需要有知人之明。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后天实践的，需要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慢慢积累。

夺权的学生或者工人虽然热情不缺，也许能力也不差，但实践经验就跟不上了。因为红卫兵虽然受过教育，有知识，但太年轻，担子挑不起来。工人的年龄够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不在行。他们恰好是夺权的主力，权力夺到手之后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于是那一枚枚象征权力的公章就成了破烂废铁。

能力只是夺权者没有经营权力的一个原因。没有能力可以培养嘛，就算从零开始学习也成啊。文化大革命搞了差不多十年，红卫兵也折腾了两三年，社会怎么就没有回归正常呢？参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一帮没有掌权经验的人去掌权，从零开始，也搞得不错嘛。怎么在文革十年就不行了？

第二个原因：不敢。也就是说那些夺权者不敢尝试着去经营权力。这么说是不是很搞笑？造反夺权都敢，怎么就不敢去经营权力？答案很简单：他们夺取的权力，就是从当初权力经营者手中夺来的，如果他们转头经营权力的话，立刻就会成为被夺权的对象。红卫兵内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夺得权力的使用问题上各有一张嘴。

既然无法经营权力，如果继续夺权的话，何时是个头，那是遥遥无期啊！

红卫兵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冲击力不够，也不是因为夺权成果不够，而是因为进入了——权力经营——的死角。那个死角不仅困住了红卫兵，也把文化大革命拉入了困局，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正因如此，才会导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江青的粉丝和林彪的粉丝的对决大戏，才会有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才会有林彪事件。

（六）劲敌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进入另一个章节了，因为事情进行到这里，必须要说林彪了。林彪的命运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所以必须另辟一篇。

在说林彪之前，再回顾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绩。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诞生，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的九大完成使命，战绩相当可观。

在中央文革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系统内部：第一代领导人中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合作者邓小平跟着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人坠入深渊，另有地方上调中央的陶铸等人坠入深渊，其它省部级高干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军方系统内：共和国元帅贺龙坠入深渊，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许光达坠入深渊，上将中将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些名单中，有些是中央文革的人干的，有的不是。但是打倒这些人之后，中央文革获利多多。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共和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虽然解散了，但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没有职位的第一夫人江青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原本只是柯庆施的秘书的张春桥也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建国仅仅二十年，绝大多数在战争年代独挡一面的人物还在。比方说十大元帅，只有罗荣桓去世了。比方说十大将军，只有陈赓去世了。除此之外，邓小平、彭真、陈云、薄一波等人还是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江青、张春桥还是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资历或能力上都显得难以服人。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不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还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中继续干老本行，也就是继续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为了伟大的文革事业，他们即将结成四人帮继续战斗。

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就需要继续革命的对象。对象是谁呢？

九大之后，老干部基本上被打倒得差不多了。虽然还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政治局，但生病的生病、该靠边的靠边、要检讨的检讨。他们已经离开了权力的核心。一个是失去了打倒的意义，第二个是毛泽东也不允许再去动他们。

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政坛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铁三角，一个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形成的铁三角。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江青等人看来，矛头当然要指向周恩来。然而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依然没能动得了周恩来。

当然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和林彪干。但是如果要继续战斗，那只能和权力新贵们作战。权力新贵们基本上都是林彪的粉丝，都是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爬上来的，比如四大金刚。

林彪的粉丝主要集中在军方，按道理说双方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井水也好，河水也罢，都是党的地盘，都是党的水。涉及到诸如国家主席这样的重要职位时，斗争将不可避免。

在文革之中，林彪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同学在现实中不爽，觉得领导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冰淇淋吃，就带了一批人去找领导算账。正常情况下，门前的保安会阻拦。就算保安的实力不够，可以叫人民警察。人民警察是谢富治管的，支持那位同学找领导讨要冰淇淋。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责全国的公共安全。但是还有比谢富治更牛叉的人，那就是军方。军方的代言人恰好就是林彪。林彪代言的军队保持了沉默，任凭同学们找各位领导要冰淇淋吃。有时候见同学们比较累了，还让军方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泄气。

要知道领导的家可能就在中南海，也可能在军区大院，没有军方点头，再多的同学们也不可能见到领导的。那么林彪怎么就那么牛，可以代言军方呢。平时生活中，代言一个广告都不容易啊，需要经纪人等一系列人物的配合运作。代言整个军方需要多少资源？需要成为多牛的人？好吧，就看看林彪凭什么这么牛，凭什么代言军方。